

吳玉章回憶錄

中國青年出版社



目 次

| | |
|---------------------|-----|
|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 | 1 |
| 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 | 103 |
| 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 | 122 |
| 忆杨闇公同志····· | 155 |
| 回忆赵世炎同志····· | 172 |
| 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 | 176 |
| 回忆林伯渠同志····· | 186 |
| 南泥湾休养追记····· | 193 |
| 关于《新华日报》的回忆····· | 205 |
| 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 | 214 |
| 附录：吴玉章七十年谱····· | 240 |
| 后 记····· | 250 |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

一 甲午战败，震动人心

自从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腐朽的中国封建社会即逐渐解体而沦为半殖民地。中国再也不能闭关自守了。对于这种情况，我家乡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洋人打掉了我们五个梅花桩（大概是指五口通商吧），就闯进中国来了。就连中国封建主义的卫道者、屠杀太平天国的刽子手如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之流，也感到中国必须有所改变，才能适应世界局势。当胡林翼亲眼看到了外国兵船在大江中来去如飞的时候，他在惊羨之余，也不能不喟然兴叹，说中国的武器太不行了，应该学习洋人的船坚炮利。于是便出现了李鸿章等封建官僚所办的“洋务”。这种“洋务”开办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比日本维新还稍早一点。但是它与日本维新不同。日本经过维新运动便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并不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只不过是借西方的武器来保护中国的封建统治而已。正因为这样，日本已渐趋富强而中国却依然落后，日本才敢于在1894（甲午）年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这次战争中，虽然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很坚决，士兵作战也很英勇，但由于统治者的腐败

无能和投降派的从中破坏，结果中国还是失败得极其悲惨。清朝政府被迫派头号卖国外交家李鸿章到日本去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不但友好的邻邦——朝鲜被牺牲了，而且中国自己的领土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也被宰割而去，甚至还要割让东北的辽东半岛；不但开放了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而且还允许日本人得在中国所有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至于赔款之重——库平银二万万两，也极为惊人。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了，李鸿章的卖国贼面目彻底暴露了。广大人民都反对投降派，反对李鸿章，欲食其肉而后快。当时正在北京会试的各省举子也纷纷集会、请愿，康有为即曾联络其中的一千余人，举行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图强。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锷）曾经痛哭不止。那时我的母亲刚死去不久，我的二哥正和我一起在家守孝。家庭的不幸使我们对国家的危亡更具敏感，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对华投资急剧地增加了，这对中国的民族资本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而“洋务”事业的破产，也迫使清朝政府对民族资本作了若干让步；于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初步的发展。就在这个基础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才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在甲午战后渐趋活跃，孙中山等人也在甲午战后开始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活动。我自己的思想也是随着时代思潮的激荡而前

进的。

甲午之前，在我的头脑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传统的忠孝节义的思想。1892年初，我刚满十三岁以后，便随我的二哥到成都进了“尊经书院”，这使我的眼界扩大了许多。我们的同伴中有一个名叫黄芝的，他和我二哥是同榜的秀才，因为他父亲是个“刻字匠”，当时人们都看不起他，但我们却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比我年长，读书很多，对文字学、汉学颇有研究。我们时常一起去游览武侯祠、草堂寺等名胜古迹。每当傍晚我们在城墙上散步的时候，他总要指点胜迹，为我讲诸葛亮和杜甫等人的故事，有时还联系到当前国家的危机，大发感慨之词。这样，我从小便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在“尊经书院”的时候，学长们还不断给我讲述前辈同学们的斗争故事。有一个同满人藩台斗争的故事，我现在还记得。大致是书院刚成立不久，学生们即爱议论时政，臧否人物。那时有一个贪婪昏庸、横行无忌的满人作藩台，便成了大家攻击的对象。一天总督考课，省城官员循例奉陪。这天，藩台到得特别早，他坐着八人大轿，一直闯到书院的二堂才下轿。学生们见他这样抖威风，都非常气愤，便设法捉弄他。他们派人到书院门口迎接钦差学政张之洞，张于是即在书院门口下轿。张当时在四川颇有声望，而且又是钦差，其余的官员见他的轿子放在书院门口，也都在书院门口下轿。等考课完毕，所有官员的轿子都从书院门口进来，惟独这位藩台的轿子从二堂抬出，而且上面的玻璃早被学生们打碎了，使他感到十分尴尬。这位藩台因此怀恨在心，便想到“尊经书院”抓人报复。那时主管书院的王壬秋（闾运）很爱护学生，他估计到藩台不肯罢休，当晚即去信请张之洞翌晨便衣简从来院议事。第二天，张来到书院，却无人接他。他正在客厅里徘徊的时候，藩

台派来的人便把他当作学生抓去了。藩台一看抓来的是钦差，吓得连忙赔罪。从此以后，他的恶行也就收敛了一些。这个故事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在“尊经书院”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极其深刻。

这年夏天，我和我二哥奔母丧回家。我二哥是一位服膺宋明理学、极讲孝道的人，每晚必去屋旁的田间为母守殡，实行所谓“庐墓三年”。当我送他出门以前，我们总要挑灯读书。那时我们读的是《通鉴辑览》、《天(启)崇(祯)百篇》等书文。每读到岳武穆、文天祥等人的忠勇事迹时，我们都极为感动，甚至潸然泪下。我们尤其喜爱的是明末烈士黄淳耀。他在清兵攻破嘉定之际，首先叫妻子和弟弟上吊，并说：“弟弟，你们先走吧！我随后就来。”然后自己也从容自缢以殉国。在明末的许多“名士”中，一方面有黄淳耀这样的烈士；另一方面也有吴梅村那样的懦夫。吴投降了清朝，后来因怕被列入“贰臣传”而感到悔恨，他临死前在一首《贺新郎》的词中写道：“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完全道出了一个软骨头的民族叛徒的痛苦心情。象吴梅村与黄淳耀这两种人，真可谓“一则放之须臾，而已与草木同腐矣；一则忍之须臾，而已与日月争光矣”。他们之所以得到两种迥然不同的结果，全在乎关键时刻是否受得住严峻的考验。在甲午战前，我读的就是这类书。而这类书对于培养我的民族气节和革命气节，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那时四川还很闭塞，新书还未流行，因此我还没有接触到什么“新学”。不过，我对当时国家危亡的大势是了解的，我正在为祖国的前途而忧心如焚。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激发了我的救国热忱，我需要找寻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我知道当时政治的腐败和官场的黑暗，因此，对“洋务”运动

的失败并不感到惊奇。但是，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呢？我有些茫然。正当我在政治上十分苦闷的时候，传来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我于是热烈地接受了它。

二 变法维新，昙花一现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更为加深了。“三国还辽”的结果，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招来了无穷的后患。什么是“三国还辽”？原来《马关条约》已规定中国把辽东半岛割与日本，这引起了沙俄帝国主义的嫉恨。于是它便联合法、德帝国主义一起，由三国同时出来强迫日本帝国主义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法国是沙俄的盟国，自然乐意参加；德国当时正想插足中国，因此也很积极。英国和沙俄虽然有着深刻的矛盾，但对日本发展的过于迅速也深感不安，因而对三国的干涉采取了“中立”的态度。这样，日本势孤了，不得不在三国的压力下屈服。日本是宁可对三国屈服也绝不肯对中国让步的，它硬要中国再拿出三千万两银才让把辽东半岛赎回来。这便是后来许多卖国外交家所津津乐道的“三国还辽”的故事。其实，这完全是帝国主义之间利害冲突的表现，并不是它们中间哪个对中国有什么好意。以后的事实马上证明了帝国主义险恶的居心。俄、德、法三个帝国主义都以“还辽”有“功”，争着向清朝政府要求“报偿”。于是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俄国强占了旅顺、大连；法国强租了广州湾。英国也不甘落后，趁机逼迫清朝政府把威海卫租了去。帝国主义强盗群起向中国劫夺，就象在死尸上窃取东西一样。它们把中国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各在其势力范围内以主人自居。长江流域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云南、两广（其

中一部分属英)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福建被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山东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东三省被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这时,中国大有被瓜分之势。美帝国主义来迟了一步,没有在中国取得势力范围,因此便提出了狡诈的“门户开放”政策,希图取得比其他帝国主义更多的权益。它一方面以“保持中国之领土主权完整”为名,来骗取中国人民的好感;一方面又要求“门户开放”好让它的势力渗入各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和全中国所有的地方;而最后的目的则是想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的险毒,以后越来越厉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又以“门户开放”为幌子召集了华盛顿会议,缔结了最有利于它的“九国公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更进一步,准备假手蒋介石,把中国囊括而去。美国的这一新殖民主义计划在中国实行了五十年,当它快要完成之日,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它彻底粉碎了。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甲午战争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得到了发展。变法维新的思想一时传布全国。上海、湖南和广东成了维新运动的三个中心。四川虽然僻处西南,但变法维新的思想也极为流行。当时四川有这样—个传说:乙未科殿试的时候,清帝光绪要大家不拘陈例,直言无讳。骆成骧就根据这个精神投机取巧,他写的殿试对策,不仅撷拾了一些变法维新的词句,而且还打破了以往对策文章的规格。光绪帝一看,认定是康有为写的,便把他点为状元。等到打开密封,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并不是广东的康有为而是四川的骆成骧。骆成骧中状元的传说,助长了“新学”在四川的流行。不但那些真正热心于维新的志士较前更为积极了,就是那般追逐利禄之徒从此也不得不学点新东西,以便猎取功名富贵。从

前的“尊经书院”是最尊崇汉学的，现在却大讲其“新学”了。以后在戊戌政变中牺牲的所谓“六君子”中，就有杨锐和刘光第两个四川人(虽然他们两个的思想在维新派中最为保守)，这并不是偶然的。

我开始接触“新学”，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二哥最喜欢买书，他于母丧服满之后，仍回成都“尊经书院”续读。那时成都有一“志古堂”书店，也趁时逐势，大卖新书。于是我二哥便成了它的好主顾。他曾经为买书而负债累累。我那时虽在乡下，但我二哥却能按时不误地把新书寄回来。当我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的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对于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的兴趣了。

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和斗争，至1898(戊戌)年1月，康有为又上“统筹全局”书，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纲领，要求：大誓群臣以定国是；设“上书所”以广言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各省设“民政局”实行地方自治。就是说，要让资产阶级参加政权，要在中国实行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的诏书，表示决心要实行变法，这样就开始了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从这时起，光绪帝又连续颁发了许多诏书，自上而下地预备实行一些资产阶级的改良。这些措施概括起来，约有如下数端：(1)兴办学堂，首先筹办京师大学堂(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2)变更科举办法，选拔新人才；(3)开放言路，鼓励上书；(4)发展实业，保护并奖励农工商业；(5)裁汰繁冗的机构，整顿腐败的军队。由于光绪帝当时只是表面上的皇帝，一切实权都操在顽固守旧派西太后及其亲信荣禄等人的手里，因此上述那些措施，并未认真地贯彻施行。当变

法维新日益威胁到顽固守旧派的切身利益时（例如裁汰机构就会夺去许多顽固守旧分子的饭碗），他们不但要起来扑灭维新派，而且还要干脆把光绪帝的帝位废掉。为此他们布置了天津阅兵的阴谋，准备于10月间清光绪帝同西太后一起去天津“阅兵”，乘机发动政变。光绪帝见情势紧急，乃密诏康有为等设法。康有为等有什么办法呢？康本人顶多算是一个皇帝的顾问，梁启超实际只管一点翻译的事情，至于四个“小军机”（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以四品京卿在军机处任职，时称“小军机”）也不过是四个小秘书而已，既无兵，又无权，怎么能干“勤王”的大事！不得已只好求救于握有兵权的袁世凯。但袁乃无耻小人，他立即向荣禄告密。9月21日，西太后于囚禁光绪帝之后，再度亲政。康梁被迫流亡，“六君子”（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惨遭杀害。这就是史称的“戊戌政变”。至此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局面完全结束了。

“百日维新”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从而促使许多知识分子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次变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戊戌变法”的那些措施，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却曾经震撼人心。我是亲身经历过的人，所以感受得特别深刻。那时我正在四川自流井（贡井）地方的“旭川书院”读书，由于热心于变法维新的宣传，人们给了我一个外号，把我叫做“时务大家”。当变法的诏书一道道地传来的时候，我们这些赞成变法的人，真是欢欣若狂。尤其是光绪帝三令五申地斥责守旧派阻挠上书言事，更使我们感到鼓舞，增长了我们的气势，迫使那些反对变法维新的守旧分子哑口无言。现在看来，我们那时对光绪帝的迷信，是何等的幼稚可笑，但在当时，尤其是在我的家乡，我们的思想要算是

最进步的了。我们在书院里占了上风就表明进步思想在那里占了上风。可惜好景不常，很快“戊戌政变”便发生了，“六君子”也被杀了。守旧分子立刻向我们反攻。他们嘲笑道：“早说不对吗，要杀头哩！”但我们并不气馁，我们引谭嗣同的英勇事迹来回击他们。谭在就捕之前，曾有日本人劝他去避难，但他谢绝了，并慷慨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的精神鼓舞了我们，使我们在守旧派的面前不肯屈服。但是中国的旧势力毕竟太强大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束缚着人们的头脑，窒息着人们的呼吸。变法维新的失败使守旧顽固势力更其嚣张。不但维新期间的一切措施很快被摧残净尽，就是任何一点小的改革也遭到顽强的抵抗。关于我侄女缠足的事情可为一例。在此之前，上海已成立了天足会，我和我的二哥便成为反对缠脚的激进分子，我的大哥（吴永柲）也同情我们，但是在维新派的失败声中和守旧势力的包围下，我的大嫂却无论如何也不听我们的话，竟自把她女儿脚给缠上了。唉！变什么法？维什么新？就在自己家里也行不通呵！这真使我感到痛心。其实，这不简单是一个家庭里的问题，也不简单是一个放脚的问题，这乃是一场严重的新旧的斗争。在当时新旧势力对比的条件下，要求象我大嫂那样的人也赞成放脚，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但是这种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是会改变的。1903年我到日本以后，我的女儿又届缠足的年龄了，我妻写信来说要给她缠脚，我立刻写信回去严厉地反对，于是我女儿那双刚刚缠上的小脚，居然得到了解放，她便成了我家乡第一个不缠脚的女人。这一行动在开始虽然也曾遭到亲友们的非笑，但因我坚决不动摇，随后也就有些人跟着来学了。这说明要移风易俗，既要具备先决的

客观社会条件，也要有人敢于出来带头，勇敢地向传统势力斗争，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 余栋臣起义。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它主要的锋芒是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者。中国人民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宗教，他们所反对的只是那帮假借上帝的名义来为非作歹的人。十九世纪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常常以传教士作为它们的先锋，以教堂作为它们的据点。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得势，许多不法的外国教士更是凶焰万丈，许多中国教徒也都仗势欺人，教堂的权势俨然凌驾于中国官府之上。一般群众与教徒发生争执，打官司没有不输的。外国教士可以自由出入官府，无耻的清朝官吏一见他们就卑躬屈节，视同上司。教堂本身往往也就是大地主和大债主，它对农民进行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其苛重程度更甚于中国的封建地主。由于这种种原因，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恨入骨髓。因此，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就常常以反教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从六十年代起，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的所谓“教案”，其实都是广大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这种斗争自1870年在天津遭到残酷镇压以后，曾一度稍为低落，但到九十年代，又复高涨起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更刺激了这种反帝斗争的发展。

四川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是有着长期的历史的。1863年，重庆人民首先掀起了反教斗争（即所谓第

一次“重庆教案”)。1868年,酉阳人民在反对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中,伤亡达千人以上,可见其规模之浩大(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酉阳教案”)。其后斗争仍时起时伏。至1890年以后,便爆发了著名的余栋臣起义。余栋臣是四川大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年青时气力过人,好打不平,人称“余蛮子”。在1890年8月的一次灵官会上,因教堂无理捕人,引起了群众的公愤,他便率众起事。后来他虽曾被官兵捉住,但起义群众却把他从荣昌县的监狱中救了出来,并趁势抓了一个法国教士。从此起义更形扩大,不但屡次打败了清朝军队的围攻,而且一再击破了敌人诱降的诡计。起义军到处受到人民的欢迎,川东南数十县乃至湖北边境都曾受到它的影响。但是,由于没有正确思想的指导,起义领袖——那些从前的哥老会头目逐渐趋于腐化。不用说地主出身的人现出了原形,就是贫农出身的余栋臣,后来也蜕化变质。这样,他们就脱离了广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了依靠的力量。因此,至1899年初,起义终于被清朝的反动军队所击败,余栋臣亦被生擒。

和四川一样,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山东、江苏等省人民的反帝斗争,在甲午战争以后,也日趋高涨。义和团运动正是在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基础上爆发起来的。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一种民间的秘密结社,具有浓厚的神教迷信色彩。因为当时德国对山东的侵略格外凶残,而且1898年至1900年山东又连续遭到水旱灾荒,所以义和团运动首先在山东爆发。那时它的领袖叫朱红灯,它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和“仇洋灭教”。山东巡抚毓贤,本是一个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他当曹州知府的时候,曾经在一年中屠杀了两千多名大刀会众。但结果他不仅没有把大刀会杀绝,反而差一点被大刀会杀死。义和团初起的时候,他坚决

镇压；镇压不成，便转而利用。后来清朝统治者终于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作为官办的团练，又把义和拳“反清灭洋”的宗旨改为“扶清灭洋”，想借排外以转移人民革命斗争的目标。当时中国人的排外思想是相当普遍的，人们只知道外国人可恶，也分不清到底谁可恶、谁不可恶，以为排走了外国人，中国就安静了。西太后是这种见识，她手下的许多官员是这种见识，老百姓也是这种见识，只是西太后和她的官员们不敢出头，想让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去出头罢了。所以义和团能够被利用，并不是难于理解的。毓贤利用义和团的作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不满。帝国主义强迫清朝政府把他撤职。清朝政府顺从了帝国主义的意旨，把他调往山西，改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义和团在山东虽因袁世凯的残酷镇压而遭到挫折，领袖朱红灯也被杀死；但到1900年，它却由山东向河北发展，并且很快便发展到天津、保定、乃至北京附近。义和团在反动统治的中心京、津、保地区，到处袭击教士，焚烧教堂，吓得清朝政府和帝国主义都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阴险的清朝统治者西太后，便一面听从毓贤等的计谋，向各国“宣战”，让手执戈矛的义和团去抵挡帝国主义的枪炮；另一面又暗中向帝国主义疏通，说“宣战”完全出于“匪徒”的逼迫，请求它们谅解。于是，帝国主义便组织了“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和代清朝政府“剿匪”为名，对义和团直接进行镇压。帝国主义的进攻，遭到义和团的坚决抵抗。无论在天津、在杨村、在廊坊、在张家口，侵略军都曾受到严重的打击。八个帝国主义集合了四万人以上的现代化军队，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也不过才攻占了东至山海关、西至张家口和南至正定的几条交通线。它们慑于义和团的声势，虽然杀到了山西边境，却始终不敢进入太行山。但是，无耻的清朝统治者西太后，当帝国主义打到北京的时候，即

仓皇地逃往西安,并派大汉奸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向帝国主义屈膝求和。这样,帝国主义和中国一切封建势力集团又重新结合起来。在它们的联合进攻下,义和团终于遭到失败。李鸿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洋奴买办,他本来就不赞成西太后、毓贤等利用义和团来反对他的外国主子。当义和团运动在北方盛极一时的时候,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重要督抚,却与帝国主义勾结,拒不执行清朝政府对外“宣战”的命令,而在东南各省和山东实行“中立”以“自保”。帝国主义组织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本想实现它们瓜分中国的阴谋,义和团的坚决抵抗,使它们看到由帝国主义来直接统治中国,绝不可能,因而认为“瓜分一事,实为下策”,“治中国须以华人,无他术也”。同时帝国主义之间也充满了矛盾,它们为抢夺中国的权益,在占领北京的一年多时间内,有好几次都几乎火并起来。最后它们得到了共同的结论:还是让中国在形式上保持独立,让清朝政府来替它们继续统治中国。就是这样,李鸿章等才得以和帝国主义举行谈判,并于1901(辛丑)年9月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这一条约,极为苛刻,它规定清朝政府要严惩那些敢于公然“排外”的官员;要严禁人民的“排外”活动,并让帝国主义军队驻守北京、天津、山海关之间的重要城镇;此外还要以四亿五千万两银子的巨款来赔偿它们的所谓“损失”,并以关税、盐税等作抵押。

“八国联军”的侵入北京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一切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感到非常耻辱和痛心。在蒋观云主办的《选报》上曾经登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沉痛的两句:“伤心又是榆关路,处处风翻五色旗(指帝国主义的旗帜)”,我读了极为悲愤。义和团运动在我的家乡也有影响,那时我家乡一带的红灯教也活跃起来了。我有一个侄子也曾经参加。他每天和他的同伴们

练刀练枪,说什么“红绫一闪,闪动天兵,神仙就要下凡了”。我当时已经受到“新学”的影响,多少有一点科学知识,因此对他们那种封建迷信的说法感到可笑;但是,对他们打教堂、反洋人的革命精神,却又异常钦佩。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思想,再加上我当时还处于四民之首的“士”的地位,所以,我对他们的运动采取了旁观的“中立”态度。我当时看到了义和团运动的落后方面,但却不了解产生它的原因和克服它的办法;更不了解义和团运动的形式虽然落后,而在这种广大农民群众的正义斗争里面,却蕴藏着极其深厚的革命力量。要完全明白这些道理,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义和团运动的深刻意义,我自然是无法理解的。不过,无论是余栋臣起义也好,或者是义和团运动也好,它对我以后的革命活动,都曾经发生过有益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前夕,我积极地参加联络会党、组织共进会的工作;在第一次大革命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比较注意农民土地问题的研究;都是和这种影响分不开的。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使我逐渐地懂得:一个革命者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哪怕它表现得极其幼稚乃至相当落后),必须象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那样,既不应加以阻挠;也不可站在旁边指手划脚地加以指责;只有抱着满腔的热忱,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的洪流中去,勇敢地用正确的思想引导群众前进,才能使革命斗争得到胜利。只有这样,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

四 浮槎东渡

戊戌政变以后,我对于“新学”的兴趣不仅毫未降低,反而更为浓厚了。除继续阅读新的报刊外,并开始读《天演论》之类的

著作。《天演论》所宣扬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思想，深刻地刺激了我们当时不少的知识分子，它好似替我们敲起了警钟，使我们惊忧于亡国的危险，不得不奋起图存。当然，《天演论》用生物界的进化原理来解释社会现象，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它的这种思想后来被帝国主义利用和发展，作为侵略弱小民族的理论根据。可是，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天演论》的思想，的确曾起过一时的积极作用。某一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作用，对于这一点，研究历史的人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1900年和1901年，我在本县县城的一家大地主家里教书。1902年，我又到威远继续求学。这时，《新民丛报》、《新小说》等都已出版，我非常爱读它们。在当时，读书人总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我虽然对科举考试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也不得不参加。不过这时的考试办法已经有些改变。从1901年起，开始废除八股，改考策论。于是，我便把学到的“新学”，尽量地塞进考试的文章中。那时要考取一个秀才，必须经过县考、府考和院考。县府两考每次考五场，差不多要半个月的时间。这对童生们说来，简直是一场灾难性的折磨。1902年，我去参加考试，县考和府考的成绩都很好。有一场府考还得了第一，阅卷的人在我的文章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最后两句是：“此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也。”过院考的时候，因为我是府考最后一场的第二名，被列为“堂号”（前十名称堂号，是学政必看的卷子），但我的文章写得太长，到交卷的时候还没有写完，因此便落第了。我的亲戚朋友都为我叹息不止，而我自己却并不感到多么难受。现在看来，这恰是一件好事，它促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有一个好朋友，名叫周先登（克群），他本来对“新学”也很热心，在当时也是先进人物，就是因为他原是一个秀才，第二年（癸卯）又考中了举人，

随后还到开封去参加了中国最后的一次会试（这次他虽没有考上，但以后也同那些举人、进士一样被送往日本留学），从此，他的思想就渐渐地走向反动（由于一味崇拜康梁的改良主义而反对革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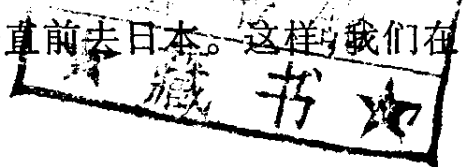
考试不中，我求新知识的心愈切。这年的12月，我便到泸州去考经纬学堂（后改为川南师范学校）。这个学堂是由周孝怀（善培）创办的。周是一个极善于投机取巧的官僚政客，他由清朝政府派到日本去学警察，回国以后，便替清朝政府在四川大办其所谓“新政”。这些“新政”，并不是兴利除弊，而是兴害作弊；四川人用“娼、场、厂、唱、察”（娼是“官娼”，场是“劝业场”，厂是“制革厂”，唱是“戏园”，察是“警察”）五个字就给他概括了。当时经纬学堂的校长是周的老师、我们荣县的一个翰林赵熙，赵虽负有诗名，但思想却非常顽固。在周善培的影响和赵熙的主持下，经纬学堂极其腐败，挂的是“新学”的羊头，卖的是“旧学”的狗肉。它竟把《仪礼》（西阶上，阼阶下等等）当作一门课程来教学，不惜繁琐地大讲其封建的礼教，真是无聊之至。为了装点门面，也教点英文，但一个星期才教六个字母，简直把人气坏了。看到这种情景，我只住了十多天便愤而弃学回家，从此再也不想上什么“新式学堂”了。

正当我在家里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候，1902年底，我二哥从成都回来了。这时他已与黄芝等人办好了自费到日本留学的手续。听到可以自费留学，我兴奋极了，也想跟着他们去。这时我刚结婚六年多，已有一个不到五岁的女儿和一个不到三岁的儿子，妻贤子幼，实在不忍分离。但是，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为了争取自己的前途，我没有因儿女私情动摇上进的决心。我大哥替我们筹措留学经费，费尽了心血。他为此不惜变卖田产，也只

凑到银子二百余两。但是，钱少也挡不住我们远行。我们于是这样计划：我第一步先随他们到上海，第二步再设法去日本。

1903年2月9日(夏历正月十二)，那时还是元宵期内，到处锣鼓喧天，当人们正在兴高采烈、欢度春节的时候，我们一行九人，好象唐僧取经一样，怀着圣洁而严肃的心情，静悄悄地离开故乡，挂帆而去。这时，重庆以下的兴隆滩，刚刚塌崖不久，川江航行还很危险，但我们却毫不在意。我们当时正是满怀壮志，一片雄心，不怕任何危险。结果一帆东去，首先顺利地到达了宜昌。当船过三峡的时候，看着祖国无限神奇美妙的江山，同舟的人都大发诗兴。于是便以“东游述志”为题，写诗以抒怀抱。记得我写的诗中有这么两句：“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我当时的思想，不仅没有阶级分析的观点，而且在康梁的影响下，总觉得中国应该学习日本，走明治维新那样的道路。不过，我对西方帝国主义却并不那么崇拜，而对中国的前途则充满了信心。到宜昌以后，我们改乘轮船。在轮船上我们结交了一位“同路人”——后来四川著名的立宪党人之一的邓孝可。邓本是重庆一家火柴公司的老板，这次是到日本去买机器的。既然“同舟共济”，彼此便慢慢地攀谈起来。由于思想上有许多相同之点，我们一路上倒也谈得颇为投契。他约我到日本以后，一定和他一起去横滨拜望梁启超，我也就答应了。但是，我们自从在上海分手之后，他一直沿着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下去，后来一到日本就拜在梁启超的门下，终于成了反对革命的立宪党人；而我却与他分道扬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此便结束了我们那段共同的路程。

我一到上海，便打听到留学日本，花费并不很多，因此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同我二哥他们一直前去日本。这样，我们在



上海没有停留多久，就换轮东渡。但是，就在这短短的十数天内，我却有很大的收获。在此以前，我还只知道康有为、梁启超他们那一套改良主义的思想；到上海以后，我即开始接触到孙中山、章太炎他们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虽然知而不详，但稍一比较，就觉得革命的道理更为充分。于是，我对康梁的信仰便一落千丈。

在从上海到日本的航程中，我又认识了一位福建的林宗素（女）。我们刚从闭塞的四川出来，看到女子出洋留学，本来就已觉得新奇，而她那滔滔不绝的言词，说的又全是些革命的道理，更使我感到佩服。这样，我无形中感受到了时代的脉搏，革命的思潮便把我头脑中原来那些改良主义的思想冲淡了。

1903年3月，我们到了日本。路过横滨时，看梁启超的念头早已没有了。我们一直到了东京。这时，中国革命的潮流又开始上涨，留日学生和全国人民一道，正在为反对沙俄帝国主义强占我国东北的领土主权而斗争，这就是著名的拒俄运动。我到东京后，立刻参加了这个斗争。从此，开始了我生活史中新的一章。

五 一九〇三年的拒俄运动

当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际，沙俄帝国主义乘机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直到1902年末与1903年初，它还不肯按照协议撤兵。这样便引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慨，拒俄运动于是兴起。在国内，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曾举行集会和上书请愿；上海各界人士也在张园开拒俄大会，并通电全国促请各界人民一致奋起。在国外则以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最为轰轰烈烈。

我于1903年3月到日本，正赶上这个运动的浪潮。记得在锦辉馆开留学生大会的时候，群情激昂，一致通过成立拒俄学生会，并推派汤尔和、钮永建(这两人后来都成为依附军阀的官僚政客，汤并且无耻地当了汉奸)回国向袁世凯请愿，希望他出兵拒俄。袁世凯这时刚刚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正秉承着清朝反动统治者西太后的意旨，倾心媚俄，天真的学生们竟去向他求助，何啻与虎谋皮？汤、钮回国后，袁世凯拒不见面。这更使留日学生们感到愤怒。于是便有拒俄义勇队的组织，随后又把它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请士官学校的学生蓝天蔚、方声涛二人来教练军事，想学点真实的本领，将来好直接去效命疆场。清朝政府的驻日公使馆对留学生的拒俄运动极力破坏，说它“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要求加以镇压。以此，蓝天蔚、方声涛后来还受到了清朝政府的处分(他们两人都是官费留学生)。这一运动，一直延续了很久。直到1904年2月日俄战争开始后，人们由于对沙俄的痛恨，还把同情寄予日本方面，听见日本打了胜仗，大家都很高兴。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幼稚可笑！两边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为什么还有厚薄之分？日本正是利用了中国人民仇恨沙俄的心理，才迅速地在中国东北境内取得很多胜利；而沙俄也正是由于在国内外都遭到人民的反对，所以才被一个比它后起的小国打得落花流水，承认失败。由此也可以看到人民的意志是绝不可轻侮的。我开始参加拒俄学生会，并不是基于高度的政治觉悟，只是看到大家都参加，自己也就随着大流参加了。以后参加军国民教育会也是如此。我虽然不是很自觉地参加了这一运动，但这一运动却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当锦辉馆的会上发出拒俄学生会的签名单时，我和我的二哥毫不犹豫地立刻签了名，但我们的那

位老友黄芝及随从他的几人却不肯签名，而且对我们的签名非常不满。他既比我们年长，又比我们有地位（他在1902年考上了“优贡”），而我们又几乎是由他带领出来的，因此他便俨然是我们的家长一样。这位“家长”当时很崇拜康梁（他因此以后也成了立宪派），只赞成作点“文明的改良”，怎么能允许他的“家人”去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呢？不过，我们既已参加，他也无可如何。于是他便写信回家，说我们不听从他的意见，参加了革命。这一下可了不起，我的亲友们听到这个消息，即大为惊扰，说什么参加了革命，纵不掉头，怕也永世回不了家。幸喜我的大哥同我的妻子一向认为我们弟兄二人忠诚老实，决不会作任何于国家人民不利的事情，因此还不算十分惊惶。当我大哥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我的时候，我气愤极了！黄芝这样的人，居然作出这样的事，我当时实在大惑不解。（现在看来，既然政治路线相反，他的作法虽然很不光彩，但却是毫不足怪的。）不过这样一来，倒真的把我逼上了“梁山”。我当时心想：“反正回不了家，干脆就在外边搞革命吧。”

我的走上革命道路，认真地分析起来，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时代思潮的发展对我所起的影响。在戊戌变法前后，特别是戊戌变法以前，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曾经风靡一时，而且确曾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但自义和团运动特别是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以后，康梁的思想影响随着他们政治威信的下降而逐渐削弱了。本来，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从保皇会直到兴中会各派都曾参加。但自起义失败后，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化即趋明显。而康有为由于私吞起义军费，受到革命派的指责，弄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章太炎等所倡导的反满复汉的民族革命思想日益盛行，慢慢地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1902年4月，章太炎等发起和举

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表示坚决反对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这时，《苏报》也开始了革命的宣传；随后，《浙江潮》、《江苏》等鼓吹革命的报刊也相继问世；至1903年夏，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革命的旗帜就更为鲜明了。邹容以无比的热情歌颂了革命，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时脍炙人口，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所宣扬的革命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一点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其中尚有不少狭隘与偏颇之处；今天看来，当然是早已过时的了；但在当时，他这本书的出版，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却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泯灭的。与此同时，章太炎除在《苏报》上介绍了《革命军》外，还发表了一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截了当地把康梁之流奉为神圣的光绪皇帝称为“载湉小丑”，也打击了改良主义，提高了革命思想。从此，改良派的思想阵地日益缩小，革命派的思想阵地日益扩大。我在去日本的途中，就已经呼吸到了革命的空气；到日本以后，又受到了更多的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参加了拒俄学生运动；这样，改良主义思想在我头脑中就逐渐丧失了地位。正因为如此，所以黄芝写信回家说我参加了革命，不但未能使我发生恐慌，反而更加坚定了我参加革命的意志。我一怒之下，马上将头上的辫子剪了，以示永不回头的决心。当时在留日学生中，剪了发的人固然很多，但留辫子的人也还不少。例如许多士官学校的学生，就留着半边头发，并用帽子把它盖着呢。由于经过了这许多的变化，所以当我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文章以后，我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了。

六 在成城学校

我们刚到日本的时候，中国留日的学生还不多，总共不过千人左右；四川人更少，在四川同学欢迎我们的会上，宾主合计也只有大约三十人而已。大家都感到有发动家乡人出来留学的必要，遂决定写一篇《劝游学书》。同时又向四川提学使方旭去信建议：每县以官费派一、二人到日本学速成师范，以便回国创建新式学校；并请各县酌量资助自费留学生。《劝游学书》和那封信都是黄芝起草的，信中有两句说：“庶几，东海渴鲋，得杯水而亦苏；万里飞鹏，遇雄风而愈奋。”意思是要方旭对自费留学生也给以经济上的援助。这两个文件对四川人到东洋留学，起了很大的作用。方旭为人还比较开明，鉴于大势所趋，对我们的建议表示赞成，于是即决定由各县出钱派遣一、二名学生到日本留学。四川地方很大，计有一百余县，每县都派留学生，而且还有自费生随之而来，这样，从1904年起，四川留日学生顿时大增，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我们劝游学的办法，其它各省也有不少仿效的。特别是1904年以后，科举停止，全国各地纷纷开办学校，急需教师，于是各省各县都派人到日本进速成师范，因此留日学生增加更多。至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达万人以上。

既到日本留学，进什么学校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二哥决定入六个月毕业的弘文师范，而我却想多用一些时间，从中学起读到大学，学习理工科。当时四川人在日本成城学校学理工科的只有毛沛霖、张师孔二人。他们对我说：“要学理工，必须先打好科学基础”，劝我千万别进一般的私立学校，因为日本有些

私立学校办得很不好，学不到什么东西。并说：“如果能进成城学校就好了”。在此以前，成城学校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只收很少的文科学生。这时日本已办了一个专收日本人的陆军幼年学校，作为进士官学校的预备；因此，成城学校就要改为五年制的中学并要停收中国学生了。他们两人认为成城学校纪律很严，学习又好，因此对它停收中国学生，非常惋惜；我听了也有同感。于是便请他们去和校长商量：请“成城”照以前一样继续为中国人开办二年半的速成中学班，专办文科。校长同意了。但至少要有二十人才能开班。我为组织这二十个人费了许多力气，有几次眼看就要成功又垮台了。但是，我并未因失败而灰心，结果还是找到了二十多个人，组成了一个班，使学校终于继续办了起来。这个学校的确办得很好。功课很严，学生全部寄宿，只有星期三、六的下午和星期日才许外出。教员很强，教学也很认真。记得有一个数学教员，是高师的研究生，教得很好。他使我感到有经验的老教师固然很宝贵，而既有热情又有学识的青年教师也同样可爱。在他的教导下，我的数学成绩很好，我做的题解，差不多和讲义一样。由于学校要求严格，日本中学五年的课程，我们以后用二年半的时间就学完了，而且还学得很实在。“成城”的某些有益的经验，我一直不曾忘记，我觉得它是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不严，师之惰。”中国自古以来就了解到必须先有“严师”然后才能出“高足”的道理，现在办教育的人也还是应该注意这一条的。“成城”的第一班办起来了，人们看见不错，跟着来的就多了。从此以后，“成城”经常有几百人。前前后后从这个学校出来的数以千计。

为了给中国人进士官学校作准备，日本政府专门办了一个振武学校，只收中国学生。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都是官费。与

此同时，日本的在野党又为中国自费学军事的学生办了一个私立的东斌学校。此外，当时东京还有一个法政大学，中国的留学生也很多。1904年在开封参加中国最后一次会试的举子，无论考上进士没有，由于在国内没有出路了，差不多都到日本来进了这个学校。所以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都是上层官僚的子弟。“五四”时代著名的亲日派章宗祥、曹汝霖等人都曾住过这个学校；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右派胡汉民以及抗战时期的头号汉奸汪精卫，这时也在这个学校里学习。

在“成城”上学期间，虽然功课很紧，但我并没有停止过革命活动。我既是成城学校第一班的班长，又是留学生会馆负责招待联络的干事，因此，无论校内校外，社会活动都是很多的。那时和我经常来往的人，如我二哥在“弘文”的同学——江苏的侯鸿鉴、浙江的经亨颐等，也都很关心国事。侯曾经写了一首词，其中有这样两句：“东亚风云，大陆沉沉。鹰瞵虎视梦魂惊。”我们大家都很欣赏。其实，这两句词的文采并不怎么样，我们之所以喜爱它，正表明我们当时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无穷的忧虑。1903年6月，“《苏报》案”发生，章太炎、邹容等在上海被捕。接着，爱国学社也遭解散，该社的余睡醒（遂辛）等人来日本入了成城学校。爱国学社设在上海，为蔡元培、章太炎等人所主办，是当时国内最重要的一个爱国团体，那里聚集了不少的革命青年。他们有的在学社解散后来到了日本，成了革命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余睡醒便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朝夕相处，一起进行革命工作，以后便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成城”上学时期，我的经济情况是很困难的。我们带出来的钱，经过1903年我和我二哥两人的花费，到1904年初我二哥回国的时候，已经差不多用完了。因此我常常拖欠学校的学

费。同学们看到这种情形，便要替我向县中去申请官费。以我当时的条件(到日本较早，又是“成城”第一班的班长；学习成绩也较好；而且家庭经济又确实困难)，如果大家替我一个人去申请官费，获得批准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从小就受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的教育，因此坚决地谢绝了同学们的好意，宁愿把官费让与别人。为了培养一名学军事的学生，我提议给我县的罗厚常一人去申请，大家一致同意，结果得到了批准。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同学们对我更加了解，我和大家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而且学校当局对我也很好，见我在同学中有威信，不但不来催我交学费，还照常按月地发给零用钱。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更加自觉，只要家里的钱一寄到，我便首先去交学费。这样时欠时交，在同学们的帮助和学校当局的照顾下，居然一直维持到毕业而未曾中辍过学习。由此可见，一人若能顾大家，大家也一定能顾这一人。相反，一切自私自利者，都常以损人始而以害己终。违背群众利益的人是永远不会有好下场的。

学校当局对我个人虽然很照顾，但我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了应该进行的斗争。记得是1904年的元旦，学校悬挂的万国旗中竟没有中国的国旗，中国同学一时大为愤慨，我便领导大家坚决斗争，向学校当局提出：若不道歉和纠正错误，我们便不上课、不吃饭。学校当局对我说：“我们对你这样好，你为什么领着大家来反对学校呢？”我说：“学校对我好，我很感谢，但是，对于国家荣辱的大事，我们是不能不誓死力争的呀！”学校当局无法，只得在我们团结一致的力量下屈服。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留日的学生，一向采取拉拢和收买的政策，而留日学生中也确有一些不肖之徒，见利忘义，以致被它软化，有的后来竟至当了卖国的汉奸。一个人是否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比个人的利益更为重

要，是决定这个人能否坚持民族气节的关键。我从来把民族大义看得至高无上，所以，一碰到日本帝国主义侮辱中国的事情，便马上抛弃了过去对它比较友好的感情，转而和它斗争。从这件事情以后，再经过1905年反对“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随着它对中国侵略的加紧而与日俱增。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在我以后的生活史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七 一九〇五年的反美运动

美国帝国主义虽然比其它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更加狡猾和阴险，但是，它的侵略政策还是到处遭到被侵略者的反抗。尽管中国人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才把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清楚；但中国人民一经觉醒以后，就发挥出无比巨大的力量，把它和它的走狗，象清除垃圾一样，彻底地扫出了中国大陆。现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也正在觉醒，尽管美国帝国主义还会继续耍许多花招，他们的斗争也还可能出现许多曲折，但是，毫无疑问，在有了中国的经验作借鉴以后，在当前更加有利的世界形势之下，他们的胜利是一定不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了。世界上最后的一个最强大的新殖民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现在正面临着它的由历史客观法则所决定的末日。

在中国人当中，曾经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和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有联系的人，或者是受过美国教育在思想上或生活方式上受它的影响较深的人，是长期受过美国帝国主义的欺蒙的。但是广大的人民，特别是那些直接受着美国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欺侮的劳动者，却一直在不屈不挠地进行着反美爱国的斗争。

中国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有着长期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例如1905年的反美运动，便是一次具有全国规模的声势非常浩大而情况又极其复杂的爱国斗争。

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是由于反对美国排斥和虐待华工、要求废止中美华工条约而引起的。本来，美国西部的许多金、银、煤、铁矿山和许多铁道、城市建筑，都是华工用血汗开辟出来和修建起来的，所以那里的华侨很多，例如旧金山就有著名的华侨聚居的唐人街。当美国资本家需要劳动力的时候，他们不惜用各种欺骗、利诱乃至拐带、绑架等无耻手段，把大批华工弄到美国去，为他们创造巨额的利润。这种情况，从1868年的中美条约中也可以看得出来。等到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资产阶级为了转移美国工人斗争的目标，便恶毒地说什么中国工人夺去了美国工人的饭碗，竟提出排斥华工的办法来欺骗美国工人，到处煽动排华事件。1894年的中美华工条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美国在和腐朽的清朝政府订立了具有排华性质的条约之后，更擅自曲解，利用它来加紧对华工的排斥和虐待，同时对一切到美国去的中国人也肆意侮辱。凡是到美国去的中国人，上岸后都得被关在木屋里，象囚徒一样地听候审问。而且常以检疫为名，用烈性药水往中国人的衣物乃至赤裸裸的身上乱浇。至于华侨被殴辱、房屋被烧毁等等，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平常事情。所有这些，对于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都是莫大的刺激。因此到了1904年华工条约期满的时候，全国各阶层的人民都要求废除旧约，并反对续订新约。

从1904年末起，各地报刊即开始讨论废止中美华工条约的问题；接着便有许多揭露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的文字出现，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仇恨逐渐增长；至1905年春，当美帝国主义准

备与清朝政府续订新约的消息传出后，反美爱国运动即渐趋高涨；5月，上海商会决议，如两月内美帝国主义仍不肯放弃其虐待华工、华侨的苛例，则将发起抵制美货的运动，各地反美运动亦相继而起；至7月，两月限期已满，而美帝国主义仍坚持原议，要续订新约，于是人心激愤，立即开始实行抵制美货，运动遂达到了高潮。这一运动以上海为中心，席卷全国，波及海外，规模之巨大前所未有。虽然美帝国主义唆使清朝卖国政府对运动频施压迫；虽然与美帝国主义有利害关系的买办资产阶级如以汪康年为代表的《中外日报》，一再对运动实行破坏；而以上海商会会长曾铸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发起运动之后又表现动摇，并中途退出了运动；但广大劳动人民，却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终于迫使清朝政府不敢公然和美帝国主义续订新约。中国工人阶级这时虽然还在幼年阶段，但在斗争中即已表现出高度的积极性和顽强性。除参加一般抵制美货的运动外，运输工人还拒运美货；邮政工人也不收美货标本；制造工人更拒用美国原料；而且当资产阶级已经退出运动之后，上海工界于10月底还在豫园开会，继续坚持斗争，从而使斗争获得一定程度的胜利。同时，在民族资产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坚决的分子，例如湖南的商会会长禹之谟，就可作为这些人的代表。由此可以看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只有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至于资产阶级，则极其软弱，而且一开始就存在着分化的迹象。

这次反美爱国运动，也曾影响到海外各地。留日学生也有许多人参加了这次运动，其中以四川人为最积极。东京的四川同乡会（主要是留学生），曾在上野公园专门开会，讨论抵制美货的办法，会上决定速与成都、重庆等地取得联络，以便在全川发动抵货运动。后来成都、重庆等地都卷入了这一斗争，这和留学

生的活动是有关系的。四川的留日学生为什么特别积极呢？这有它的历史原因。原来四川是很富庶的地方，但自清朝政府残酷地镇压了明末四川的农民起义以来，四川人口锐减，满目荒凉，天府之国成了人间地狱。从前四川的文化(封建文化)是很发达的，但入清以后二百余年，从未出过一个状元，仅此一端也可见其衰落之甚。可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叶，东南沿海一带，迭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相形之下，四川倒反而成了比较“安宁”的地方，又逐渐富庶起来。由于生产日益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日益增高，1873—1876年张之洞在四川任学政的时候，看到这种情况，便特地办了一座“尊经书院”，一面培养学生，一面刊行书籍，这样一来，四川的文风(封建主义的文风)因之渐盛。这个“尊经书院”的学生，一开始就有些人好为清议，抱打不平，常爱闹事。其后骆成骧中状元，杨锐入军机，都是由这个学院出身，并以高唱“新学”而取得高官厚禄的。于是“新学”遂一时风靡书院乃至全川。戊戌变法失败后，这群莘莘学子，长期苦无出路，及至科举废止，游学成风，他们便大批地来到日本。这批人虽然多数出身于封建家庭，有其落后和反动的一面，但他们与那些买办家庭出身的人不一样，和帝国主义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对反帝爱国斗争较为积极。加以他们来自边陲，乡谊特重，团结性很强；而且还有清议之风，对一切不平的事都爱过问，因此最易卷入各种斗争。这些人经过一些斗争提高了觉悟，以后纷纷加入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时期曾经起过相当的作用。不过，这些人的情况也极复杂；真心爱国者固然不少；但有的人却是利用群众运动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有的人则是想出出风头；而有的人干脆只是凑凑热闹而已。就是那些真心爱国的人，也多半只有“五分钟的热忱”，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热时冷、易于动摇妥

协的毛病。这种情况，不独四川留学生如此，其他各省的留学生乃至一切知识分子也都一样。现在屈指数来，当时闹得轰轰烈烈的人，真正坚持革命到底的却没有几个。这说明知识分子必须不断地改造和提高自己的思想，才能随着时代不断地前进。

八 同盟会的成立

1905年，不但中国革命运动高涨，整个东方，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都卷起了革命的浪潮。这种情况，对中国的革命非常有利。日益高涨的中国革命运动，迫切地需要一个比较集中统一的领导机关。在当时的中国，会党、教门之类的组织，显然已经过时，不能担负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责任；而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那时还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只有资产阶级政党的出现，才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且事实上，那些略具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革命小团体，如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等已先后存在，当时的问题，只是如何把它们联合起来，使其具有更为明确的纲领和更加统一的行动。同盟会的产生，恰好完成了这一历史的使命，因此，它可算得是应运而生的。

在那些革命小团体中，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成立得最早。孙中山先生，生长于广东香山(中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受到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他后来能提出平均地权的纲领，与此不无关系。稍长，他到檀香山他哥哥那里去读书，他哥哥的家庭是个资产阶级的家庭，他住的学校也是资产阶级的学校，这种环境，使他很容易地便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1894年，他曾写信给李鸿章，劝他作些改良政治的工作，但结果失败了。甲午战争爆发后，他愤恨清朝政府的腐败，便在檀香山

组织兴中会，并于 1895 年联络会党在广州举行起义，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而清朝反动政府，也对他严加迫害，在他的名字孙文的文字旁边加上三点水，改作“孙汶”，把他当作海寇来缉拿。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在人民中的影响，特别是在华侨和留学生中的影响，反而与日俱增。由于华侨资产阶级在国外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国内封建主义又较少联系，因此它是中国资产阶级中革命性较强的一个阶层，孙中山先生主要地正是代表着它的政治倾向。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更趋激烈。1904 年，他在制订致公堂章程时，首先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这说明他的思想又向前进了一步。

光复会是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于 1904 年所组成的一个革命小团体，它极力主张民族革命，代表了江南广大人民长期以来强烈的反满复汉要求。它的这种主张，不但符合广大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的民族愿望，而且也得到地主阶级中反满分子的赞成，因此它在长江下游和日本留学生中影响较大。华兴会也是在 1904 年成立的一个革命小团体，由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刘揆一等人所发起，它的成员主要是以留日学生为骨干的青年知识分子，并和会党有相当的联系。它以湖南为基地，代表了那一带开始兴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无论光复会也好，华兴会也好，都缺乏明确而完备的纲领，更没有严密的组织，而且都受地方性的局限，不足以领导全国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

1905 年 7 月，孙中山先生由欧洲重返日本。他坚决主张联合全国革命势力，统一所有革命团体，并积极地从同盟会的筹备工作。8 月 13 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富士见楼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集会来欢迎他，到会者一千余人，室内室外，阶上阶下，到处都

挤得水泄不通。他那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一再激起人们不绝的掌声，使人们更加明白改良主义的错误，更加相信革命道路的正确。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其后章程、组织，逐渐完备。至10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先生发表了一篇发刊词，同盟会的纲领和主张，就更加明确了。同盟会在它的章程中，以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孙中山先生又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三民主义的主张。这样，同盟会就有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它不仅明确地提出了要根本推翻清朝政府二百多年来的反动统治，从而和改良主义彻底地划清了界线；提出了要彻底推翻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这又比简单的反满复汉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而且它还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想以此来解决土地问题和预防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当然，预防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主观的幻想，没有科学的根据；但是，孙中山先生所以提出这种主张，是从关怀劳动者的痛苦生活和同情被剥削者的悲惨境遇出发的。他的这种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气魄和崇高的理想。总之，孙中山先生为同盟会所制订的纲领，虽然基本上还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这一纲领，给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犀利武器，使它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斗争中能够不断地取得胜利。

同盟会的各种组织，是渐次建立起来的。在当时清朝政府极端残暴的统治下，它的活动十分秘密，并且还采取了一些中国过去秘密结社的办法，例如它的一套秘密口号，虽然内容和会党的不同，但其形式就是从会党那里学来的。同时，它主要地还学

习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和政党的组织形式，例如它的总部，除总理之外，设有评议、执行、司法三部，这就是学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办法。正因为同盟会有了一套新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所以它就和中国过去的一切封建迷信团体——会门、道门之类大不相同，而成为中国最早的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政党组织。由于我当时在留日学生中，特别是在四川留日学生中，稍微有些资望，所以就被选为同盟会评议部的评议员。这评议部虽说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但它的活动却是很少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环境关系，秘密活动不可过于频繁；而更主要地还是由于同盟会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团体，其组织还是相当松懈的。当时，同盟会是以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成分极为复杂，其中包括工农分子（主要是会党中的人）、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地主阶级中的反满分子，它可算是各阶级联合反满的民族联盟，而以资产阶级居于领导地位，实际上是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且，它原来那几个小团体之间的畛域并未彻底消除，因此，内部的意见常不一致。例如秋瑾和徐锡麟都是光复会的人，但秋瑾参加了同盟会（她也是同盟会的评议员并兼浙江支部的负责人），而徐锡麟却坚决不肯参加，所以当他们后来共同举事时，秋瑾一方面要以光复会员的身分和徐锡麟等光复会系统的人联络，另一方面又要以同盟会员的身分和同盟会系统的人联络。又如章太炎和宋教仁等人，对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也都不很尊重。所有这些，不仅暴露了同盟会这种资产阶级组织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同时也预伏了后来辛亥革命终归失败的危机。

九 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

同盟会成立以后，清朝反动政府鉴于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日本，便要求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施以镇压。190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文部省发布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这样就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尖锐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常常采取两面乃至多面的手法：它一面支持反动政府，一面支持革命运动。在支持反动方面的时候，它又同时培养两个以上的走狗；在支持革命方面的时候，它又同时扶植几个不同的派别。它以为这样，就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当权，都可以通过它的代理人在中国扩张其侵略势力。在日俄战争以前和日俄战争期间，它对中国留日学生尽力拉拢，中国留日学生也确曾把同情寄托在日本方面。但自日俄战争结束后，它就翻脸无情，和清朝反动政府勾结起来，对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实行镇压。这样就不能不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反抗。而且这时的朝鲜，事实上已经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它在“取缔规则”中，竟把中国和朝鲜并列，这完全暴露了它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因而使中国留日学生感到无比的愤慨。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日本议员，公然大发谬论，说什么日本帝国的范围应以东京为中心，用三个不同的半径，划三个圆周，第一个圆周内包括了朝鲜等地，第二个圆周内包括了我国东北等地，第三个圆周则把我全中国都包括进去了。这一狂妄无耻的宣称，更加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愤怒。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就是在这一系列的刺激之下爆发起来的。

“取缔规则”颁布后，我留日学生悲愤填膺，决定全体罢学回国，不在日本求学受辱。这一决定，是在一时激愤和高度热情的支配下作出的，实行起来颇有困难。但既经决定，若不实行，必被日本帝国主义所耻笑。陈天华看到这点，特别是看到当时留日学生总会的领导人都不肯负责，便愤而蹈海，想以此来激励人们坚持斗争。陈天华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又是出色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他所写的《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通俗宣传品，曾经传诵一时，起过很大的鼓动作用。他临死前还写了一篇《绝命辞》，谆谆告诫留日学生必须奋起斗争；同时又给留日学生总会诸干事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闻诸君有辞职者，不解所谓。事实已如此，诸君不力为维持，徒引身而退，不重辱留学界耶？”这一封信，虽然感动了许多人，但却没有使留日学生总会那些冥顽不灵的最负责的领导者受到感动。当时留日学生总会的会长是杨度，他自己不肯负责，却把责任推给曾鲲化，而曾也一样不肯负责任。我这时仍是留日学生总会的一名干事，便勉力地出来积极活动。在一次留日学生的大会上，由于胡瑛的讲话很受欢迎，并且群众一问又知道他是《民报》社的人，便把他推为反对“取缔规则”组织的会长。当时同盟会是秘密的，只有《民报》社是公开的，《民报》社的人就等于公开的同盟会员，大家一听说是《民报》社的人就那样拥护，可以想见当时同盟会在群众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威信。

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组织虽然活动起来了，但要领导无数学校、一万多学生的罢课，并要组织他们分批回国，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时绝大多数的中国留日学生都罢了课，但个别的学校如东京法政大学的留日学生却不肯罢课。这些人中，有许多人都只知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对国家民族的荣辱

存亡置之不顾。大家见他们这样，都很生气，但又无可如何。当时范源濂在那里当翻译，也很气愤，他认为同是中国人就应该共同行动，因此便对法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说：“你们要上课，我就不给你们翻译了。”这样，法政大学的中国留日学生，也最后地参加了罢课。这么多的人，都罢了课，都要回国，船只怎么办？路费怎么办？特别是回国以后又怎么办呢？这一切都是问题。但是，大家凭着满腔热血，丝毫不顾地纷纷奔回祖国。记得秋瑾、刘道一等人都是这次回国的，四川的黄复生、熊克武、谢奉琦等人也是这次回国的。为了使回国的留日学生不致失学，湖南的姚宏业（洪业）、四川的孙镜清（当时他很好，后来当了贿选议员）等人便在上海的吴淞口办了一个中国公学。孙镜清的家里比较有钱，他一人就捐了二、三千元的办学经费，姚宏业则多负些办学的责任，就这样把学校办起来了。那时这些人的爱国精神都是很感人的。不久姚宏业因学校经费竭绝，竟投黄浦江而死，人们闻悉都非常感叹，为之悲悼不已。从陈天华的蹈海到姚宏业的投江，一时自杀成为风气，这固然表现了他们富有爱国热忱，轻于牺牲自己，但同时也说明了他们由于没有更高的革命理论和更好的革命方法，只得以自己的生命来激励人民。其志可嘉，其行可悯，但不可为训。清朝政府对留日学生的回国，采取镇压与利诱兼施的政策。它一面到处缉拿革命分子，一面却专为归国的留日学生开特科考试，企图用爵禄来引诱他们。不少的人果然上钩，章宗祥、曹汝霖等就是参加了这种考试，取得了一官半职，从而完全投入了清朝反动政府的怀抱的。

当大批中国留日学生已经陆续回国的时候，在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中忽然出现了一个维持会的组织，说是愿意回国的仍可继续回国，不愿意回国的可以留在日本。这一组织是由法政

大学的中国留日学生发起的，上面不但有江庸等人的签名，而且还有汪精卫的签名。大家一看，都感到惊奇，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原来是孙中山先生打来了一个电报，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怕同盟会员大批回国后，有被清朝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它使人感到那个全体回国的决定，虽然出于义愤，却很不合乎策略，应该适时地加以改变。不过汪精卫接到这个正确的指示后，不和大家商量，不经过一番酝酿，就冒然地组织起维持会来，则是十分错误的。也许他正是从怯懦的心情出发来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亦未可知。汪精卫是个毫无骨气的人，感情用事，意志不坚，时冷时热，变化无常，他的这些劣性，在当时就已经露出了一些端倪。然而他那时的“声望”毕竟还是很高的，他以其三寸不烂的舌头，一张动人的面孔，再加上还会写点煽动性的文章，曾使不少的人都受到他的迷惑。这时他既出来维持，而且又有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人们便很自然地听从了。

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正当同情，因而使日本政界也发生了很大的波澜。日本政府的反对派曾借此向执政党大肆攻击，日本执政党为了缓和国际舆论、对付反对派的攻击，以巩固它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对中国留日学生表示让步，并派人来和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商洽条件。但这时留日学生总会的负责人都已星散，会馆里虽然还有少数人在办公，但满口尽是埋怨之词。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必须把责任担负起来。我很小的时候，祖母就告诉我：“设筵席容易，收拾碗盏难。”她教我作事必须有始有终，并说：“有头无尾的人，是没有出息的。”这个教训，我一生铭记不忘。所以对于收拾残局，我是很乐意的。有人说我“命苦”，我倒很高兴；一个人正是要敢于

去和“苦命”作斗争，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家乡有一种说法：吃甘蔗要从尾吃到头，那样便越吃越甜；反之，从头吃到尾，便越吃越没有味道了。我认为这其中颇有些哲理，先苦而后甘，恐怕是人生最幸福的道路。正因为我有这种思想，所以当我看到留日学生总会陷于瘫痪状态时，我毫不气馁，反而更加振作，每个星期总要到会馆去一两次，鼓励那里的办公人员坚持到底。后来终于又拖住了一个胡瑛。记得是12月30日的晚上，我和胡瑛两人冒着大雪和严寒，坐火车到乡下去找范源濂。范也很热心，认为应该趁日本政府让步的时候，把留日学生会馆恢复起来，并愿意代我们交涉。后来经过他到使馆活动，再与日本政府反复交涉，日本政府终于被迫答应了十多项条件，使日本政府拖延几年不肯承认的中国留日学生会馆，获得了合法存在的权利。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就这样在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后，适时地结束了。

十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

同盟会是在革命运动逐渐高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同盟会的建立又推动了革命运动进一步的高涨。

几乎各阶层的人民，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这次革命运动或受到了它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这时虽然还很幼稚，也展开了许多自发的斗争。1905年，上海工人为反对裁减工人和克扣工资等切身问题，曾发生过几次罢工斗争。1906年，上海的工人斗争仍继续不断；杭州的机织工人也曾发生罢工。这时工人斗争的形式还很原始，例如1905年4月上海杨树浦工人罢工的时候，即采取了捣毁机器的办法，这说明他们还没有真正的阶级觉

悟。但是，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和工人斗争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是必然要逐渐地觉悟起来而担负和完成其伟大的历史使命的。

1906年，长江流域有许多地方发生了灾荒，因此这一带的农民斗争极为高涨。从长江上游的四川、贵州，中游的湖南、江西，直到下游的安徽、江苏，到处都曾爆发过农民起义。此外，如华北的河南，华南的广西，农民斗争仍继续不断。自义和团起义失败后稍微沉寂一阵的反洋教斗争，这时又活跃起来了。1906年初的南昌教案，就曾经轰动一时。由于帝国主义分子、法国教士王安之蛮横地残杀了清朝官吏中比较主持公道的南昌知县江召棠，南昌人民激于义愤，群起将帝国主义分子王安之打死，并将他的巢穴法国教堂焚毁。法、英、美等帝国主义蛮不讲理，竟把兵舰开入鄱阳湖示威，对中国人民进行恫吓。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当时正在长沙教书的徐特立同志，闻悉之后，立即向同学们演说，他愈说愈恨，随取菜刀砍去一指，誓与众同报此仇。谁知彭国钧却用这血指写了“请开国会”等几个大字，竟以革命者的鲜血去作改良主义者升官发财的工具。与南昌教案同时，江西其他地方乃至全国各地如安徽、福建、浙江、四川等省人民都曾经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

在工农群众广泛斗争的基础上，各省人民争取路矿权利的斗争也开展起来了。它的锋芒主要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是一种爱国主义性质的斗争，所以参加的阶层极其广泛，不仅有广大的劳动人民，而且以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最活跃，同时还影响了一部分上层统治阶级中的人物。经过长期复杂的斗争，粤汉铁路的主权终于从美国人手中夺回来了；苏杭甬铁路也拒绝了英国的借款；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山西、河南、四

川等省都争回和保住了一些路矿的权利。川汉铁路也是这时改为商办的。本来，四川人民为了抵制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很早就有自办铁路的愿望；而四川留日学生，深感出入四川的不便，对自修铁路的要求更为迫切。1903年锡良督川时，为买好川人，曾奏请修川汉铁路。1904年四川留日学生致电锡良，提出集股修筑川汉铁路的具体办法，并自认股款三十余万两，以为先导。同时又发表《敬告全蜀父老》书，力陈帝国主义以铁路亡人国家的可怕，呼吁自力更生，齐心修路。至1905年，川汉铁路集股章程公布，规定不招外股，不借外债，按租出谷，百分取三。至于官股则由川省当局加收厘金筹措，实际上亦取之于四川人民。这样就使全川人民都和川汉铁路发生了切身利害关系。谁知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后，一切由官方把持，不仅官股全属空名，而私股亦渐被吞蚀。因此到1906年末，四川留日学生又联名指责官府把持铁路公司，要求把川汉铁路完全归为商办。从此以后，铁路公司的实权落入立宪派士绅手中。所以后来清朝政府要把铁路收归国有时，不仅遭到全川人民的反对，而立宪派士绅由于利害关系，也被卷入斗争，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革命前夕四川铁路风潮能够成为全民性运动的原因。

以同盟会的成立为标志而兴起的革命高潮，使清朝政府对它的生存感到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它被迫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想以欺骗手段来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这时，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也空前地激烈起来了，而这正是阶级斗争趋于尖锐化的必然反映。革命派的《民报》和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新民丛报》假借爱国以宣传其保皇主义；又说什么革命必生内乱，必招瓜分；中国只能实行立宪，而且还须以清朝政府实行所谓开明专制为过渡。此外，更诬蔑“平均地

权”全系为乞丐流氓着想，实行起来，必致破坏社会秩序。针对着这些谬论，《民报》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它充分地宣传了推倒清朝政府的必要，并指出清朝政府是卖国的政府，真正爱国的人，必须起来推翻它；而且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才有出路；什么开明专制、君主立宪之类的滥调，都是替清朝政府帮凶的。同时还指出必须实行“土地国有”，以矫正贫富不均的现象。在《民报》坚决有力的进攻下，《新民丛报》终于弃甲曳兵，完全失败，最后不得不宣告停刊。《民报》在它的宣传中，把同盟会的纲领更加具体化了，但也有着严重的缺点：它把一切仇恨都集中到满族统治者身上，而把真正的民族敌人——帝国主义轻轻地放过了，我们从它宣布的六大宗旨^①中就可以看出它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存有多么严重的幻想；同时，它只注意对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大力宣扬，而没有集中力量去反对中国人民在国内的真正敌人——封建主义。正因为这样，它对《新民丛报》所提出的革命必引起内乱和招致瓜分的问题就不能提出完满的答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是无力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的。这一光荣任务，只好遗留给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去完成。

当《民报》和《新民丛报》笔战方酣的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论战。记得1906年的冬天，一群四川留日学生在宿舍里展开了争论。绝大多数的人都赞成革命，惟独周先登拥护立宪。这位“可勒哇先生”（周说话时有“这个”“这

^① 《民报》的六大宗旨是：（一）颠覆现今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

个”……的语病，被人用日语称为“可勒哇”先生)理屈词穷，犹不认输，还是在那里这个这个地纠缠不已，刘回子(庆恩)一怒之下，用火钵向他击去，登时满屋尘土飞扬，真象战场一般，周先登吓得抱头鼠窜而去。这刘回子是四川成都的一个回民，原在汉阳兵工厂作技工，是由张之洞派到日本去学习兵工技术的。其人身材魁梧，性情直朴，虽说话粗鲁，不如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却主张正义，敢于斗争，人们都很喜欢他，把他唤作刘回子，而不叫他的真实名字。刘的痛击周先登，曾经在留日学生中博得一致的好评，从这件小事情上也反映了改良派在政治上的破产。

但是，康梁等人并不甘心于失败。当清朝政府假意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他们欣喜若狂，积极组织立宪政党，准备回国去做清朝的立宪功臣。于是，革命派与立宪派(改良派)的斗争便由以理论为主而转为以行动为主了。1907年7月，梁启超的政闻社在东京锦辉馆开成立大会，同盟会员当场痛打了梁启超，四川会员并把梁的走卒白坚(四川人)打得头破血流。对这一暴力行动，人们皆大为称快，可见立宪派是何等的不得人心。从此以后，立宪派只有在上层的士绅中去罗致它的党羽，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则完全失去了同情。

十一 武装起义的失败

当全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同盟会没有对各阶层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行有效的领导，尤其是对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更少过问，却把它的主要精力放到组织武装起义方面，希图用单纯的军事斗争，一举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自1906年至1908年，它连续不断地举行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

由于反对“取缔规则”而归国的同盟会员，成为在各地组织武装起义的积极分子。湖南的刘道一自从回国后，即联络会党在湘赣边境展开活动。至1906年末，著名的萍乡、醴陵、浏阳起义爆发了。在这次起义中，有安源矿工六千余人参加，他们参加起义虽然还是自发的，并没有阶级的自觉，但却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史揭开了光荣的首页。

1907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应清朝政府的请求，驱逐革命党人，孙中山先生被迫离开日本，至安(越)南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策划军事。于是便爆发了潮州、惠州、钦州、廉州等地的起义。这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又和黄兴计划从安(越)南袭取镇南(友谊)关，进攻广西，于是又在中越边界的镇南(友谊)关发动了起义。

当孙中山先生在两广组织起义的时候，独树一帜的光复会员徐锡麟，于1907年夏在安庆刺杀了清朝政府的安徽巡抚恩铭，举行起义。秋瑾也在浙江绍兴响应徐锡麟。徐锡麟以起义失败死难，秋瑾也于被缚后慷慨就义。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她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事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而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

孙中山先生和黄兴于镇南(友谊)关起义失败后，又转而谋在云南边境举行起义。由于英帝国主义侵略片马的事件，同盟会对云南边境早已注意，曾不断派人前去工作，其中尤以川、滇两省的同盟会员去得最多。1907年，川籍同盟会员王仰思、秦彝鼎等应云南干崖土司刁安仁(同盟会员)的约请，前往干崖(现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发动革命。王仰思、秦彝鼎等启程之前，我们四川的一些革命同志曾在东京的锦江春饭店为他们饯行。大家在席间畅谈国事，放怀畅饮，一时酒酣耳热，情绪渐趋

激昂。我县的同盟会员龙鸣剑(骨珊)于兴奋之际,忽而引吭高歌,他那悲壮的歌声,震动了每个人的心弦,使举座为之感动。这次午宴一直延续到黄昏时候方才散去。王仰思在路上还给我来了一封信说:“锦江春之宴,大有‘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振’之概,毕生难忘。”自此以后,他们即再没有信来了。正因为同盟会在云南有一些工作基础,所以孙中山先生和黄兴才决定在那里举事。1908年3月,河口起义爆发了。当起义军占领河口的胜利消息传来时,我们在东京的同盟会员无不兴高采烈,当即决定派一批人前去支援。但他们刚到安(越)南河内,即闻起义失败,因此又折返东京。只有喻华伟(喻云纪之弟)绕道缅甸,去到干崖与王仰思、秦彝鼎会合。后来喻华伟因病离开了干崖,而王仰思、秦彝鼎等则一直在那里从事革命工作,以至于死。他们为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团结的伟大事业贡献了自己光荣的一生。据1959年德宏自治州州长刀京版对我说:王仰思、秦彝鼎都是他的老师,现在自治州还有他们的坟墓,那里的各族人民至今仍在纪念他们。可见一个革命志士,无论死在哪里,他的革命精神都会永远受到人们的崇敬。河口起义失败后,龙鸣剑还曾到云南去从事过一段革命活动。龙鸣剑有一个叔父龙沛然,曾在云南昭通署理过知府,因此龙鸣剑到云南去工作也较为方便。龙鸣剑在云南工作了一个时期以后,又回到四川。他在四川被选为谘议局的议员,又在成都办了一所法政学堂,他就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地进行着革命工作。

四川的同盟会员谢奉琦、熊克武等自反对“取缔规则”运动回国后,也会同余英等积极筹划武装起义。1907年的成都起义,还没有发动起来就被破坏了。王树槐、张治祥、黎庆瀛、江永成、黄方、杨维等“六君子”被捕下狱,这一事件曾经震动全川。接

着，谢奉琦谋在叙府起义，事泄被捕牺牲。谢被捕后的英勇表现，使当时四川的臬台赵藩，深受感动。他为救谢不果，竟至辞官不做，足见清朝官府中的个别开明人士也已经感到革命潮流是不可阻遏的了。1908年，熊克武等再来日本，我们为了帮助他进行起义，替他购买了一批军火。这些军火，运至四川忠州起岸后，送到同盟会员吴鸿恩（恩洪）家里收藏。后来因官府有所觉察，吴怕累及家庭，竟把它抛入江中，实为可惜。1909年春，熊克武等在广安的起义也失败了，以后他逃至上海。1910年春，黄复生、汪精卫谋炸摄政王被捕。是年秋，我从日本回北京营救黄复生、汪精卫未能成功，也来到上海。于是我同熊克武、但懋辛、井勿幕去香港，同黄兴等共同筹划规模更大的广州起义。这一次起义，虽然集中了同盟会大部分的精英，也终于以无比惨重的损失而失败。

同盟会所组织的这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都在清朝反动政府严厉的镇压下失败了。它说明要举行武装起义，必须首先作好艰苦的群众工作。只有当群众革命高潮达于顶点的时候，才可因势转入武装起义。而且在起义之前，还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只有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都充分具备的时候，才可发动起义，起义才有获得胜利的可能。反之，任何脱离群众革命斗争的武装起义，都是军事投机，任何缺乏周密准备的军事斗争，都是冒险行动，而一切军事投机和冒险行动总是要遭到失败的。同盟会所领导的这许多次武装起义虽然都遭到了失败，但它却严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吸引和鼓舞了相当广大的人民起来坚决地参加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斗争，并且用事实向广大群众证明：只有实行武装革命才能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至于在起义中的无数英雄、志士

和先烈，他们为争取祖国的光明前途，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个人的一切，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写下了光荣的篇章，而且永远值得天下后世的人们歌颂和学习。

十二 办《四川》杂志

清朝反动政府除对各地的革命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之外，同时对一切的革命宣传也加以严厉的禁止和破坏。1906年以后，《民报》运进国内就较前更加困难了。为此，留日学生中各省的革命同志，又纷纷以本省的名义创办和继续出版报刊，分散地运进国内，进行革命宣传。例如《云南》杂志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当时全国人民正在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云南边疆（片马事件），因此，《云南》着重地反对外国侵略，这样就使它得以比较容易地运进国内，并且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四川》杂志也是在这种情形下决定创刊的。

先是，四川留日学生雷铁崖、邓絜等人曾经出版了一个《鹃声》杂志，它对四川屏山县内官府的黑暗腐败揭露得淋漓尽致，而对全省全国的事情虽也慷慨陈词，却说得不够一些。雷铁崖的文章畅达锋利，很受时人赞赏，陈璧君（后来在抗战时期堕落为最大的女汉奸）就是在南洋读到雷在《鹃声》上的文章，由于仰慕他而来日本的。1907年下半年，四川留日学生决定以《鹃声》为基础创办一个《四川》杂志，并推我来负责主持。1906年我在成城学校毕业后，考入了日本国立的大学预科——岗山第六高等学校工科，并循例补为官费留学生，这样我的学费问题便解决了。这时我已经上课一年。从岗山到东京，坐火车也得半天的路程，要办杂志，不脱离学习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便称病请假一

年,专门从事革命工作。为了革命活动的方便,我特地给《四川》杂志社租了一处比较宽大的房子,它后来不仅用作了出版机关,同时也用作了革命机关。由于有《鹃声》的基础,并且雷、邓也继续参加编写工作,经过不久的筹备,在1907年末,《四川》即以其鲜明的革命姿态与世人见面了。它一出世,即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销路很广,每期出版后不久都又再版发行。《四川》的特点是:对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坚决反对清朝反动统治,主张革命。它虽然只出了三期,即遭封闭(第四期被没收),但通观全部内容,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云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我国东北的文章即占了很大的分量;而揭露清朝反动政府卖国残民的罪恶、鼓励人民起来争取铁路主权、进行革命斗争的文章又占了很大的分量;此外,即使是诗词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忧时爱国之声,而绝少无聊的吟风弄月之作。它的思想大抵是爱国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同时并有若干无政府主义的成分。当然,那时的爱国主义思想还是比较简单和笼统的。那时的民主主义思想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而无政府主义思想,谁都知道,对共产主义思想说来乃是一种反动的思潮,但在当时,它却鼓舞着人们去进行冒险的革命斗争,主要的作用还是积极的;不过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崇拜英雄、轻视群众的消极作用。总之,《四川》杂志在当时的中国要算是最进步和最革命的刊物之一。

当我们在顺利地创办《四川》杂志的时候,《民报》正遭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经费不继,章太炎等人几乎有断炊之虞。他派陶成章到南洋去募捐,也无结果,因南洋华侨与兴中会关系较深而与光复会素少联系。因此,章大骂孙中山先生不支持他办《民报》。其实,孙中山先生这时到处搞武装起义都遭失败,也很

困难。章的埋怨徒然暴露了同盟会内部派系之间的裂痕。看到这种情形，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既无过错，而章太炎也可以原谅，于是便极力设法弥补。当时四川留日学生很多，并且很多人都已参加了同盟会，我便为《民报》向他们募捐，他们都很踊跃地捐输，家境富裕的固然捐得不少，就是家境困难的也是尽力而为，有的官费生为了捐钱，竟至把官费折子拿去当了（当时的官费折子是可以拿到小当铺里当钱的），可见人们的一片爱国热心。我把捐到的钱交与章太炎去维持生活，他很感动地说：“同盟会中只有四川人才是好的，才靠得住。”他这话虽是对四川同盟会员的夸奖，并且出自衷心，但却是错误的。章太炎的门户之见过深了，所以到处都流露出来，无怪其后来走向分裂革命的道路。

1906年至1908年，同盟会在国内组织的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有些不坚定的分子因此表现消极。有一次我去约吴鼎昌为《四川》杂志写文章，吴本是同盟会员，但这时他却说：“我看现在还是不要再搞了吧！”坚决地拒绝了我的约请。这可算得是革命投机分子的一个典型。这时日本的同盟会组织也很涣散，孙中山、黄兴等领导人都不常在日本，宋教仁又没有威信，真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我于是便和四川的张懋隆、李肇甫，湖南的欧阳振声、彭允彝、刘彦，广东的何天炯、熊越山，广西的覃超，江西的王有兰，江苏的陈剑虹，安徽的常恒芳、陈策（不是后来国民党政府里搞海军的那个陈策），福建的林时爽、李恢、郑烈，云南的吕天民、张大义，贵州的平刚，山西的景定成，陕西的井勿幕、赵世钰，山东的丁维汾等人经常联系，不断集会，这样差不多每省都有人参加，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各省同盟会负责人员的联席会议，维系着同盟会的组织于不散，坚持着革命工作的进行。这时，由于国内环境更加险恶，许多会党中的革命分子纷纷

逃亡日本，我的大哥也于这时来到东京，和我同住在《四川》杂志社内。我于是又和同盟会中的一些同志如焦达峰等人研究：最近一个时期，同盟会只顾去搞武装起义，差不多把会党工作忘记了，现在何不趁各省会党都有人在日本，把全国所有的会党通通联合起来。这个主张，凡是过去和会党有联系的同盟会员，都很赞成，因为他们知道下层社会有着巨大的革命潜力。我的大哥在四川哥老会中有相当地位，这时已由我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他很同意我的意见，对我说道：“你要作会党工作必须参加进去，且先补个‘老幺’吧，然后一升‘老五’，就能在实际上管事了。”通过他的介绍，我就算入了袍哥。我首先在一些“大爷”当中进行联络。那时四川的“大爷”有张百祥、唐洁和我大哥三人；而湖南的焦达峰，湖北的孙武、居正，江西的邓文辉，广东的熊越山等人，他们或是“大爷”，或是会党中较有地位和较为积极的人物；经他们一起商量，召开了共进会的筹备会，我大哥以年长被推为临时主席——“坐堂大爷”，而我则升为“管事”，实际负责组织联络等筹备工作。经过我们这些同盟会员的积极活动，各地哥老会、孝友会、三合会、三点会等会党在日本的首领，终于在1907年的下半年结成了一个统一的组织——共进会。由于四川孝友会的首领张百祥在下川东一带拥有相当多的会党群众，而且在会党中的资格最高，对各地码头最熟，所以被推为共进会的共同领袖。共进会以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而特别着重于反满的宣传。因为会党中的上层分子有不少是地主阶级出身或与地主阶级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所以共进会把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以便他们容易接受。尽管后来共进会的某些首领极力辩解，说什么“平均人权”比“平均地权”更有意义，更便于向会党群众宣传，但以后的事实证明：共进会放弃了“平均地权”的

主张，终于使它无力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实际上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虽然共进会的纲领有严重的缺点，它的组织也很散漫，各派会党仍按原来的系统和各自的堂口去进行活动，并无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自有共进会以后，中国南方各省绝大部分的会党都在反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了，这就使同盟会增加了一个群众基础较为广泛的外围组织，从而有利于促进革命运动的高涨。

共进会成立后，我仍集中力量回来做同盟会和《四川》杂志的工作。由于《四川》杂志不仅进行着革命的宣传活动，而且进行着革命的组织工作，所以它和《民报》一样遭到清朝反动政府的迫害。1908年秋后，唐绍仪被清朝政府派为专使访问美国。他路过日本的时候，秉承着清朝政府的意旨，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和《四川》杂志。我和章太炎为此都吃了官司。《民报》被控为“激扬暗杀、破坏治安”，除罚金外，并禁止发行。至于《四川》杂志，日本帝国主义故意把问题搞得更严重，不但罚金更多，而且还判处了我半年的徒刑。本来，自1908年暑假以后，我请假的限期已满，不得不回岗山继续上课。经过大家同意，我把《四川》杂志的责任交给了当时四川留日学生同乡会长、同盟会员廖希贤，由他继我为《四川》杂志的编辑兼发行人。因此，《四川》被控，按理应由他去出庭受审。但廖却不肯去，把责任推在我的身上。当时人们都很不平，一个叫童慎如的坚决不让我去。我想：“‘见义勇为，无勇也’。到法庭有什么可怕呢？”于是毅然要去受审。大家都很感动，特地为我请了一个出名的日本律师樱井来替我辩护。到开庭那天，我泰然地去出席了，不少人要跟着去旁听，但法庭宣布案情严重，禁止旁听。人们非常愤怒，并为我担心，但又无可如何，只好在外边等候消息。一会开庭了，

检查官提出了四大“罪状”：(1) 鼓吹革命；(2) 激扬暗杀；(3) 煽动日本殖民地反对帝国；(4) 反对天皇^①。当说到天皇的时候，还装模作样地致敬一番。接着，我的律师替我辩护，那天樱井没来，我的律师是由他请来的。律师说：“鼓吹革命，在异国不能构成罪案；登了无政府党的文章，并不能就说是激扬暗杀；只有第三、第四两条确是不对，但都系转载不慎，只能算是过失，不能定罪。”经过一番辩论以后，问官暂时休息。大约等了半个钟头，又重新开庭了。这时法官出来宣判：说什么根据“罪证”，决定查禁杂志，并科罚金一百元，处编辑发行人有期徒刑半年。又说什么姑念该编辑发行人尚在求学，准予“犹豫（缓期）执行”。一场风波，就这样结束了。当我一走出法庭，等候的人们都为我欢呼；等我把全部经过告诉了大家以后，大家才了解到日本帝国主义原来和清朝政府串通一气，对中国革命施行压迫，所谓“审判”、“辩护”、“判决”等等，都不过是骗人的把戏而已。

十三 暗杀活动的风行

当俄国 1905 年的革命失败以后，有许多无政府党人逃亡到日本。当时我们在日本的一些中国革命者，从他们那里不仅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学到了许多从事恐怖活动特别是制造炸弹的技术。于是，与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组织对

^① 《四川》杂志第四期登了一则“赤旗事件”的消息，因此被控为反对天皇。按“赤旗事件”发生于 1908 年 6 月 22 日。日本各派社会党人、无政府党人于是日在东京锦辉馆开会，因争夺赤旗与警察冲突，致被捕多人。随后在拘留所又发现颂扬法国大革命时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诗句，日本政府认为是侮辱天皇，遂以不敬罪判处作者惩役三年之重刑。

清朝政府官员的暗杀，一时成为风气。本来，任侠仗义的刺客行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人们的赞扬。而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革命活动中，也把组织暗杀作为重要的革命手段之一。例如他在1900年所领导的广东起义，即由史坚如到广州去进行暗杀，以响应郑士良在惠州发动起义。史坚如就是在这次暗杀活动中被捕牺牲的。至1905年后，这种暗杀活动更为扩大了，同盟会特地组织了一个专司暗杀的部门，由方君瑛(女)负责主持，我和黄复生、喻云纪、黎仲实、曾醒(女)等也参与其事。那时我们最爱读《铁假面》之类的惊险小说，经常仿照书中的人物研究进行暗杀的技术。我们怀着满腔的热忱，不惜牺牲个人的性命去惩罚那些昏庸残暴的清朝官吏，哪里知道暗杀了统治阶级的个别人物并不能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治统治、尤其是不能动摇它的社会基础呢？这些道理，是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后才能理解的。

在当时从事暗杀活动的积极分子中，有一个值得我们特别纪念的英雄人物，那便是四川的同盟会员喻云纪(培伦)。喻云纪初到日本的时候，是个风流倜傥的翩翩少年，他当时在千叶医学校读书，成天注意的还是些弹琴、照像之类的玩艺，对革命并无多大兴趣。1908年夏天，他与我大哥等同住在《四川》杂志社内。其时河口起义失败，他的弟弟喻华伟去到干崖，在那里染上恶性疟疾，回到新加坡医治，急需费用。我接到喻华伟求助的信后，立即在四川的革命同志中为他筹借，不几天即凑足三百元寄去了。喻云纪看到这种情形，深受感动，觉得革命既是大仁大义的崇高事业，而革命同志又复亲如手足，因此便要求加入同盟会。我在介绍他入会的时候，又向他说明了一个革命者必须竭尽全力以奉行革命的道理。果然从此以后，他便舍豪华而尚质

朴，与前判若两人。他赋性聪敏，无论什么技艺，一学就会。他对小型机件（如钟、表之类），素来装拆自如，更兼他学过一些化学，所以后来在研究炸弹制造方面，有重要的创造发明。1908年秋，我回岗山复学后，他与我大哥等人另外租了一处房屋，专门在那里试验炸药。一日正换药瓶，一触炸裂，他被炸伤了手脸，所幸伤势不重，警察赶来时，他们装作做化学试验的样子，也就掩盖过去了。从此，他越发精心研究，终于制造出一种威力强大的炸弹。由于改进了发火机关，只要收藏得当，它平时绝不致有发生爆炸的危险。而且他还把炸药的外形，作得与朝鲜特产的麻糖极其相象，这样就便于往来携带，不易被检查发觉。

至1909年，同盟会所组织的许多次武装起义都遭到失败后，许多革命党人愤不欲生，亟谋刺杀清朝官吏，以为报复。这时把守长江口的两江总督端方和把守珠江口的水师提督李准，成为革命党人仇恨集中的焦点。是年夏，端方被调为北洋大臣，我们估计他会从汉口经过（当时没有津浦铁路，由江苏到北京以溯江至汉口转京汉铁路为最便当），决定由喻云纪同另外几个同志去汉口察看形势，布置一切；我们在日本购置器材和筹措经费。喻到汉口后住在孙武那里，孙也协助他进行工作。他亲自到汉口北面的刘家庙车站附近去勘察了地形。哪里布雷、哪里藏人以及如何引线拉火，他都作了周密的计划。当他把那份布置详图送来日本的时候，我们看了都很兴奋，立刻把准备好的东西派人送去。一切都准备妥当了，专等那万恶的端方前去送死，谁知端方却狡猾得很，他表面装作取道汉口，但到镇江后诡称要上焦山一游，即偷偷地转回上海乘轮船北上了。于是我们的一场心血归于白费。

随后，汪精卫居然也想去炸李准。这位貌若处子的书生，手

无搏鸡之力，而且对爆炸技术也一窍不通。他之所以要从事暗杀活动，完全是因为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欲作孤注一掷，妄想借此以博取壮烈的美名。那时他正在香港，一天，突然来信向我索寄炸弹。我这时对暗杀活动的兴趣已不如前，而对他的从事暗杀更抱疑虑。因此，我在回信中说：“征诸历史，各国革命失败时，则暗杀之风必盛。诚以志士仁人，见大势已去，惟有一死以报国。其志可嘉，其行亦可悯矣。今我革命非无希望，敌人正造谣说革命必归失败，以图涣散我革命之人心。……如果兄也随吾党勇壮之士去实行暗杀，即令有成，也徒使敌人造谣，志士灰心，党也受莫大损失。弟不赞成此举，故不能寄药品来。”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我不赞成他去实行暗杀，也还只是从各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并不是对暗杀活动的错误，有了真正的认识，所以对以后的暗杀活动，我仍然继续参加。汪接到我的回信后，又来信说什么“……革命之事譬如煮饭。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为德，在一恒字。水不能蚀，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党人，百折不挠，再接再厉。薪之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万丈，顾体质虽毁，借其余热，可以熟饭。此正如我革命党人，一往独前，舍生取义。……弟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兄如爱我，望即赐寄各物。”汪精卫这一封信，虽然说得天花乱坠，却无意中暴露了他那卑劣的本质。试问一个素鲜恒德的人，怎么能够成为烈士呢？汪精卫后来被清朝政府软化、被袁世凯软化、被蒋介石软化、以至被日本帝国主义软化而当了头号大汉奸，绝不是偶然的。但我当时并没有看出他的本质，反而觉得他很坚决，便给他寄了些炸弹去。可是他接到炸弹后却又动摇起来了，终于没有勇气独自去进行暗杀。

当汪精卫回到日本的时候，喻云纪等人也都回来了。于是

我们大家计议，决定集中力量去刺杀当时清朝政府的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根据决定，喻云纪、黄复生于1909年秋后赴北京组织机关，我仍在日本负责准备一切。喻云纪、黄复生到北京后，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守真照像馆，随即回日本来取炸药。这时，汪精卫与陈璧君正在恋爱，也常常说他们要亲自去炸摄政王，待喻、黄准备好了才去。对于汪精卫的参加这次暗杀活动，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几次起义失败后，“汪精卫颇为失望，遂约集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拚命。”孙中山先生算是把汪精卫看透了，汪的确是出于失望才想去拚命的，并不象其他的志士那样满怀壮志和雄心。孙中山先生因为不了解详情，以为谋刺摄政王是由汪精卫“约集同志”进行的，其实，这次行动主要地应归功于喻云纪和黄复生，汪精卫只是后来才同陈璧君一道去参加的，而且他自始至终并没有作多少事情。喻云纪、黄复生在北京找到一个西瓜般大的铁罐，就把它拿到一家铁工厂去造了一个炸弹壳，然后把从日本带来的炸药安装进去，制成了一个大型的特别有效的炸弹。当时摄政王府在什刹海的西北，门外不远有一条水沟，沟上有一石桥，附近还有一个井形的石坑。这桥下正好埋炸弹，石坑正好躲人，而水沟又便于安设拉火的电线。只要布置得好，当摄政王经过桥上的时候，人在石坑里一拉电线，就会立即把他炸死，而拉线的人还可趁势逃跑。在1910年4月的一个晚上，喻云纪和黄复生偷偷地来到这个桥下。他们首先把炸弹安好，然后再来安设电线，谁知事前目测不准确，临时才发觉电线短了几尺。怎么办呢？不得已只好收拾重来。正在收拾的时候，暗中发现有人在桥边大便，于是他们只得暂时躲开。而这时摄政王府大门开处，有打灯笼的人等出来。喻、黄恐怕被他们发现，便顾不着去取炸弹了，只得任它埋在土里。等第二天晚上

再去探取时，炸弹已被人取走了！他们估计：若是敌人取走，必定会惹起满城风雨；若是竟无声息，则是一般居民拿去了。过了一天、两天，一连几天皆无动静，他们估计无事，便派喻云纪、陈璧君再到日本向我取炸药，准备回头再举。他们回到日本，陈留在神户，喻到岗山来找我。就在那天我们正要去准备器物的时候，忽然报上登出了黄复生、汪精卫被捕的消息！原来敌人非常狡猾，他们发觉炸弹以后并未声张，先拿到外国使馆找专家鉴定。这外国专家说：“这炸弹威力强大，技术高超，绝非中国境内制造；但外壳很大，且较粗糙而车有螺丝，必是就近制造的。”于是清朝政府根据弹壳的线索，找到了那家铁工厂。然后由便衣侦卒带着那家铁工厂的老板四处寻找，又在琉璃厂附近认出了黄复生并发现了守真照像馆。于是侦卒们装着要照像，趁机把黄复生和守真照像馆的人全部逮捕了。接着又利用一个给汪精卫送饭的人带路，把汪也捕去了。陈璧君看到汪精卫被捕的消息，简直跟发了疯一般，竟无理辱骂喻云纪怕死。喻云纪见她已失去理智，不愿在她悲痛中和她争吵，只得把无穷的委屈压在心底。一天他对我说：“她同我一起回来，却说我怕死，……唉，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言罢不胜唏嘘。从这时起，他便已下了必死的决心。果然以后的事实证明：喻云纪不愧是留芳千古、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而汪精卫、陈璧君则作了狗彘不食、遗臭万年的无耻汉奸。

十四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

黄复生和汪精卫被捕后，清朝政府鉴于单纯的镇压不足以消灭革命，没有立刻杀害他们，只是把他们监禁起来，准备慢慢

地实行软化政策。1910年的夏天，为了去营救黄复生和汪精卫，我从日本经过朝鲜潜赴北京，住在我姊夫那里。那时，曾醒有一个弟弟曾季友在北京经商，我通过他去打听消息和联络同志。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还是想不出有效的营救办法。至于以前所设想的劫狱，根据实际情况，更无实现的可能。我的姊夫，素知我参加了革命党，这时又见我的行迹可疑，便不管我同意与否，先替我买好车票，临时骗我上车，一直把我送到了上海。

在上海，我碰到了熊克武、但懋辛和井勿幕等人。我们于是一同南下，到香港去找黄兴和喻云纪，共同商议发动广州起义的事情。

在此之前，孙中山先生已与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议定要在广东大举起义。为此，同盟会在香港设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统筹部，由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长。这次起义的计划是很庞大的，除在广东积极准备外，并派人到广西乃至长江流域各省发动，同时通知在日本和南洋各地的同盟会员尽量参加。这是鉴于过去几次分散性的起义都归失败，因此要集中全力，实行决战，而不计成败如何。所以这次起义仍是一种军事投机性质的冒险，并不是客观条件真正成熟了的有把握的行动。由于有了过去几次失败的经验，这次起义的准备工作是做得比较充分和周密的。为筹措经费，孙中山先生亲自到海外华侨中去募集。各方募集的结果，约得二十万元左右。为储备军火，派了几批人向好几个国家去购买。我一到香港，即被分配到日本去负责购运枪弹。而喻云纪等还专门设立了制造炸弹的机关。为这次起义，特别组织了五百人的选锋队（敢死队），其后更增至八百人。为这次起义组织的秘密机关达三十余处，四川同志即曾以我的名义组织了一处机关，名曰吴老翁公馆（吴公馆）。后来起义失

败，人们都风传吴老翁牺牲，把我算作烈士，其实我根本没有到过这个公馆，而先到日本买军火去了。

买军火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大批购买，并且要把它秘密地送到香港和广州，困难就更多了。记得我第一批购得手枪一百一十五支、子弹四千发，交由周来苏运往香港。香港原是无税口岸，向不检查行李，所以我们将军火装作行李运送。周来苏从横滨上船以后，我忽然接到黄兴来电，说香港近日对美国总统号轮船，曾经检查行李，要我注意。而周来苏这次坐的轮船恰恰就是美国总统号。我于是派王希闵赶赴神户，把周来苏的船票换为头等舱位，以避免检查。谁知周来苏胆小如鼠，当船过门司时，他忽然害怕起来，竟把所有的枪弹，一一投入海中。而船到香港，根本没有检查。香港诸人听说周来苏押械前来，无不喜如雀跃，待周到后，才知周已把枪弹完全丢了。大家于失望和愤恨之余，便给周取了一个外号，叫他“周丢海”。这样一来，我续购军火的任务就更重了。在购运军火的过程中，我也遭到过几次危险。一天正下雨的时候，我在急忙中亲自运送手枪子弹二千发到别处去。当时我手执雨伞，脚穿高脚木屐，两腋下各拴子弹一千发，外穿“和服”，行走起来极不方便，稍一不慎，就有摔倒的危险。不巧刚出秘密住所，偏偏遇上一个警察。我惟恐他看出破绽，便故意和他拉开一些距离，慢慢地走在他的后面。好容易走了半里之遥，右面横街又出来一个警察，走在我的后面，把我夹在中间。这时我真是提心吊胆，但又不敢稍露惊慌。我故意镇静地一直向前走去，大约走了一里之后，才趁势转到别的街道，把他们甩开了，并且安全地达到了目的地。当我卸下子弹时，虽然周身是汗，但精神上却格外轻松愉快，好象打了一个大胜仗一样。还有一次也很危险：平日军火装箱，都是由我亲自

料理的。一连运出三四批以后，我因为事情太忙，就叫一个人去代替我管包装。这个人竟把一百二十支手枪装在一个长不到三尺、厚不过几寸的皮箱里。那箱子看起来不大，提起来却重得要命，几乎能使人跌倒。这样就引起了车站人员的怀疑，故意将交运牌子弄错。因为牌子错了，领取的人必须说明箱内装的什么东西，并且要打开箱子查看，如果完全符合，才能取走。这一箱子军火，怎么能打开看得？因此运到横滨后便被扣住了。我接到横滨的来电，急得不可开交。因为箱子写明运往香港，如果事情暴露，前几批军火正在船上，也会遭到没收；而且报上一张扬，甚至连广州起义的全盘计划都将由此破坏。我于是同陈策等立即赶到横滨。想什么办法去取那个箱子呢？他们首先买了一个同样的箱子，里面也装上一些沉重的东西，然后去找领事馆的秘书写信，说把箱子取出后即存于领事馆；如果能把箱子取出，则在途中偷偷地把它换掉。但那秘书正在写信的时候，却碰着领事出来，不让他写。实在无法了，我便让陈策冒险跑到车站去相机取出箱子。这时夜深人静，所有的行李都取走了，只剩下那个箱子，由一个日本人看守着。陈策装做很安详的样子，径直走到他的跟前，和颜悦色地同他交涉。陈说箱子是朋友的，钥匙早给带走了，实在无法打开，请他务必通融。他先打量了陈一阵，后来又听陈说得很诚恳，慢慢地态度已不那么严格了，而且表现出犹豫的样子。陈于是一面和他说好话，一面大胆地提着箱子就走了。当陈策提着箱子胜利地回到寓所的时候；我们是多么高兴啊！

当我开始在日本买军火的时候，黎仲实也来了。但他不是来买军火的，而是来要回扣的。他一见我就说：“把回扣给我吧，我要去救汪精卫。”我说：“我为革命买军火，从来没有拿过回扣，

并以拿回扣为可耻。……现在既然要救汪精卫，那么就拿去吧。”当时我对汪精卫的印象还很好，听说要救汪，便立刻给了黎仲实三千元。我这次经手的款项前后大约有六万元左右，黎是按百分之五拿去的。黎拿到这三千元后即回香港去了。

在从香港往广州运送军火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叫陈镜波的叛徒。因此又损失了一批军火。为了便于运送军火，曾专门在香港和广州开设头发公司，利用运头发藏运军火。为了运军火进广州和在广州城内运送，有时还不得不把女同志打扮成新娘，装做办喜事的样子，利用花轿来抬军火。总之，当时购运军火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我们为此曾经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

正因为购运军火的困难，再加以温生才于4月8日(三月初十)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引起了清朝政府当时在广州的反动统治者张鸣岐和李准等人的注意，所以原订于4月13日(三月十五)的广州起义，不得不展期到4月27日(三月二十九)。4月23日(三月二十五)，黄兴到广州指挥一切。4月25日(三月二十七)，张鸣岐、李准调巡防军二营来加强了广州的防务，胡毅生(大革命时期的坚决反革命分子)，陈炯明(后为孙中山先生的叛徒)忽生畏惧，要求改期；姚雨平也故意要枪五百支，存心刁难。黄兴无奈，便决心自己去拚杀李准，而令赵声等各部退去，免遭敌人搜捕。赵声等刚起身返港，林时爽、喻云纪等去黄兴处反对解散和延期，说巡警即将搜查户口，起义日期只可提前，绝不能展后。黄兴遂决定以三四十人攻总督衙门去杀张鸣岐。4月26日(三月二十八)，陈炯明、姚雨平报告：新来巡防军内多有革命同志，黄兴乃定4月27日(三月二十九)仍按期举事。事后证明，陈、姚的报告并不可靠。而黄兴发电要香港的人赶去参加，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因香港到广州只有早晚两班轮船，而能搭

早班轮船的人数极其有限。我们在香港接电后，除派一部分选锋于 27 日搭早轮赶着先行外，我和胡汉民等都只能搭晚轮动身，因此急电黄兴务将起义展缓一日。等我们的电讯达到黄兴手中时，他的号令早下，大家都已行动起来，无法更改了。而这时陈炯明、胡毅生忽借此不愿发动，于起义前逃出了广州城。谭人凤在城门口碰着陈炯明的时候，问他“往哪里去？”他慌张地回答了一声“出城一下”，就一去不返了。姚雨平在起义发动后也藏着不敢出来，和陈炯明、胡毅生一样做了可耻的逃兵。这样便使黄兴领导的起义队伍成了无援的孤军，不得不遭到失败。本来，陈炯明、胡毅生这样的人不但缺乏革命意识，而且存有浓厚的封建地方主义思想，他们不象大多数广东革命同志那样，对外地赶来参加起义的同志，表示热忱的欢迎和衷心的合作；反而认为既在广东起事，参加的又以广东人居多，即应由广东人出来领导，因而对黄兴（湖南）、赵声（江苏）的领导心怀不满，并以此而处处与黄兴为难，最后更任黄兴领着无数志士去赴汤蹈火而不顾，实际上这时他们即已对革命犯下了滔天的罪恶，而成了千古的罪人。

4 月 27 日（三月二十九）午后 5 时半，广州起义爆发了。黄兴亲自领着一队人直攻总督衙门，及至攻入后堂，才发现张鸣岐早已逃避。再返出衙门，恰遇敌人的大队人马。林时爽误信其中颇有党人，便欲晓以大义。他刚喊话出口，即中弹牺牲；黄兴亦伤右手而断两指。此后黄兴仍领着队伍奋勇杀敌，且战且走，直到最后剩下他一个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换了衣服，逃到广州河南女同志徐宗汉家，由她看护，以后他俩即因此而结成了夫妇。起义的那一晚上，喻云纪、熊克武、但懋辛等另为一路，他们从后面攻入总督衙门。喻云纪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所向

披靡。他用炸弹炸开督署后墙时，但懋辛受伤了。熊克武一面扶但，一面战斗，颇为不利。他们走出督署，又与众往攻督练公所。喻云纪沿途抛掷炸弹，一人奋勇当先，敌人见之无不丧胆。但终因寡不敌众，横身被创，最后弹尽力竭，为敌所俘。当敌人审问他的时候，他慷慨激昂地说：“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然后英勇牺牲。

这次起义延续到第二天才失败。我们船近广州的时候，很远就听到了枪声，大家都很惊异，但因船上人杂，不便交谈。我估计是起义发动了，当海军士兵上船来检查时，我便问那操四川口音的军人，他说是城内革命党造反，打起来了。于是我也故意高声地附和，让大家知所警惕。我们下船后，立即赶至城外叫做“但公馆”的一所起义机关。这时枪声已经停止了。我们一面派人去了解情况，一面搜寻武器和制造炸弹的材料，准备马上行动起来，挽救这次起义。但四处搜寻的结果，仍是一无所获；而探消息的人回来又说起义已经完全失败了，并且官兵正在四处抓人。我们无奈，只得返回香港。

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党人表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例如从容就义的林觉民，在事前即给他妻子写了一封感情深挚的绝命书，受审时又挥笔写了一篇坚贞不屈的自供状，这些用血泪写成的文字，就是今天读起来还令人感动，足以流传千古。又如广东的李文甫和花县来的许多同志，据一米铺以米包为堡垒，与敌奋战，至死不屈。其余的烈士也都非常英勇。烈士们的英勇精神甚至使李准这样的刽子手也吓破了胆。李准在大肆屠杀之后又逮住了但懋辛。他亲自审问，当他得悉但系四川荣县人时，故意说：“你是赵熙的学生吗？”而但却说：“我不是赵的学生，我是革命党。”李于是又接着说：“算你是革命党，自首免死。”不等但再

说话,就把但拉下去关了起来,而没有杀害他。难道李准有点回心转意或是还顾及乡谊吗?不,不是的,杀人如麻的李准是毫无人性的,他从来不顾乡谊,更不会回心转意,他只不过是在革命者的鲜血面前发抖罢了。但懋辛下狱后,外边的人不知详情,误传他已自首,上海《民立报》还写了不少的文章骂他,后来事实弄清了,证明他被捕后还是坚决的。

这次起义,牺牲的人很多。后来有人收敛死难者的尸体,得七十二具。广州的人民为了纪念他们,把他们合葬在黄花岗。自此,“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名,遂传遍天下。

志士们虽然英勇无比,但是,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单纯军事行动,终于无法避免其失败的命运。这就是广州起义所以失败的根本原因。此外,如运送军火的失事,叛徒的混入以及陈炯明、胡毅生等人的临阵脱逃等等,都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因素。对于陈、胡等个别广东人的封建地方主义,大家都非常不满。黄兴一到徐宗汉家,立即用左手在草纸上写了一封万言的长信,让我带交同盟会总部,其中说:“实不啻集闽、蜀之同志而歼之”,对那些不顾大局的分子表示极大的愤慨。对于陈镜波那样的叛徒,人们更切齿痛恨。所以当陈不久以后来到香港的时候,洪承点便把他诱至郊外,用匕首将他刺死了,这一无耻的奸细终于受到了正义的惩罚。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并且付出了无比高昂的代价,但是,烈士们的鲜血毕竟没有白流,它激发了无数的人们继起斗争,并使反动统治者吓得丧魂落魄。紧接着广州起义以后,辛亥革命的高潮就来到了,这并不是偶然的。因此,广州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自有其一定的地位。

十五 铁路风潮

经过几年的斗争，粤汉、川汉铁路都归由商办以后，这两条铁路的股本虽然来自广大的人民，但铁路公司的权力却把持在绅商即地主和资产阶级手中。这些办理铁路的绅商，其腐败与清朝政府的官僚也相差无几。由于他们的贪污浪费，铁路股款已耗费很多，而铁路的修筑却很少进展。这种情形也曾引起人民的不满。但是，人民虽不满意于绅商把持路政，而对清朝政府把路权卖与外国，则尤其反对。1911年初，清朝政府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建议以借款为资本，实行铁道国有政策。5月9日，清朝政府颁布了一道“上谕”，说什么“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并威胁人民说：“如有不顾大体，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则照违制论。”当然，清朝政府实行的所谓铁道国有，实际上是把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而便于那些亲贵和官僚买办如载泽和盛宣怀之流从中渔利。这批贪婪的家伙为了从人民手中夺取权利和财产，竟毫无顾忌地通过清朝政府于5月18日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要他去强行接收四省铁路公司；而于20日又与英、美、德、法四国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合同”，向帝国主义拍卖铁路权利。清朝政府这一劫掠和卖国的行径，立即激起了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

在此之前，清朝政府为了欺骗人民，缓和革命斗争，曾于1909年于北京设立资政院，于各省设立谘议局。参加谘议局的人虽然绝大部分都是立宪派的士绅和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但由于清朝政府的铁道国有政策，直接侵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所以

他们便利用谘议局这个类似资产阶级议会的机关来发起保路斗争。

首先起来反对的是湖南绅商。他们聚集在谘议局开会，并散发传单，抨击清朝政府借外债修路，丧失国家主权。学生们继而罢课抗议，使斗争更趋激烈。湖南巡抚杨文鼎见民气激昂，怕事态扩大，便奏请照前办理；但清朝政府却严加申斥，要他对人民的保路斗争实行镇压。

湖北人民的斗争更为尖锐。革命党人詹大悲以“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为题，在《大江报》上发表了鼓吹革命行动的文章。湖广总督瑞澂逮捕了詹大悲，查封了《大江报》，于是各界人士数千人齐集谘议局开会，并有人断指痛哭，大呼救国。他们推出的代表到北京请愿时，曾经绝食三昼夜，表现了很大的斗争决心。

广东粤汉铁路的股东会议也一致反对把铁路收归国有。由于两广总督张鸣岐出示取消股东会议案，引起广东人民更加愤慨，于是争持纸币挤兑，以为反抗。在反动统治的高压下，股东们被迫逃至香港，组织保路会，继续斗争。同盟会在香港出版的报纸《中国日报》及其他各报，都对斗争极力声援，吓得张鸣岐竟下令禁止港报入境。

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不但十分激烈，而且更为广泛和深入。当铁道国有的“上谕”传到四川的时候，四川人民愤慨异常。6月中，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当时会场上一片哭声，情绪激昂，人们痛骂盛宣怀为卖国奴，邮传部为卖国机关。会议当场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推立宪党人蒲殿俊、罗纶为正副议长，并派员分四路出外游说。接着，各县保路同志会次第成立，运动向全省发展，规模十分浩大。川省护理总督王人文见民情激愤，

知道压迫必致引起变端，特为奏请暂缓接收铁路。昏庸残暴的清朝政府不但对王人文严加申斥，并将其革职，而且还派遣了著名的刽子手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屠杀四川和西藏人民被称为“赵屠户”，他继王人文而任川督，更引起四川人民的愤慨。与此同时，清朝政府又强行接收了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并要以川款继续开工修路。这样，清朝政府就不仅从人民手中夺去了路权，而且从人民手中劫去了股款，人民的愤怒愈加不能遏止了。于是自8月下旬起，成都人民开始罢市、罢课；至9月初，更进而实行抗粮抗捐。这时立宪党人怕斗争发展下去会破坏封建秩序，力图将运动加以控制。为此，蒲殿俊等曾发出告白，要人民只求保路，不要反抗官府，更不可聚众暴动。但是，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岂是少数立宪党人所能控制得了的，何况还有革命党人从中推动呢？同盟会虽然并没有完全掌握这次运动的领导权，因而这次运动仍带有很大的自发性；但有一些同盟会员曾经在运动中起过较大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次运动的发展。例如龙鸣剑和王天杰（子骧）等同盟会员，一开始就看透了蒲殿俊等立宪党人的本质，知道他们不敢触及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因而除与他们共同进行合法斗争外，又暗地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8月初，龙鸣剑、王天杰与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子舟等于资州举行会议，根据龙鸣剑提出的“明同暗斗”的方针，决定组织同志军，发动武装斗争。当成都人民开始实行罢市罢课斗争的时候，龙鸣剑跑到成都城南农事试验场内，与朱国琛、曹笃等裁成木板数百片，写上省城业已发难，望各地同志速起救援的字样，然后将木板涂以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河中。这就是后来人们所乐道的“水电报”。这些“水电报”顺着四通八达的河流漂去，下游的人便知道了成都发难的消息，纷纷揭竿而

起。9月7日，赵尔丰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人骗至督署，加以逮捕；同时并封闭了铁路公司。这一无耻行径，立即激起了成都数万人民，前往督署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者。赵尔丰又命令军警开枪，当场打死群众数十人，伤者不计其数。在赵尔丰的疯狂镇压下，人民并未屈服，反而把斗争扩大了。不久之间，整个四川都沸腾起来，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省规模的带有全民性的大起义。这时，过去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赵尔丰，被四周各县的同志军团团围困，龟缩在成都城内，一筹莫展。而清朝政府也吓得手忙脚乱，刚调用岑春煊入川宣抚，又下令端方派兵镇压。岑春煊虽也曾卖弄文墨，发出一篇娓娓动听的文电，想以此收买人心，缓和局势；但一则革命已成燎原之火，再也无法扑灭；再则端方之受命用兵，又把岑春煊所能起的那点欺骗作用，一扫而光；这样一来，岑春煊走到汉口，也踟蹰不敢前进了。至于端方，他面对着四川人民起义的汹涌怒涛，本来也有些害怕，但既然参了赵尔丰一本，而清朝政府又一再督促，便只得硬着头皮，领着队伍，冒冒失失地闯入四川。端方的领兵入川，不但更加激起四川人民的仇恨，使四川人民斗争的火焰愈益增高；而且鄂军西调，武汉空虚，又给武汉的革命党人造成了一个发动起义的绝好机会。后来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够比较容易的成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客观条件。

十六 荣县独立

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失败后，我和洪承点、熊克武等又匆匆地到了日本。因为洪承点刺死了叛徒陈镜波，在香港不能久待，所以我们走得很急。到日本不久，我看见铁路风潮兴起，

估计革命运动会继续发展起来，便决心回国参加。6月，我回到上海。这时，以宋教仁为首的一些同盟会员正在上海搞了一个同盟会的中部总部（中部同盟会）。这个组织虽号称为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实际上是在那里闹独立性。不过，它主张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在中国的中部发动革命，而反对在边疆继续搞武装起义，这个意见在当时却是正确的。当时，全国各处都曾不断地发生饥民暴动和抗捐抗税的斗争，其中尤以长江流域和山东一带最为普遍。1910年春，长沙发生了规模巨大的饥民抢米暴动，参加者二万余人，把巡抚衙门和外国教堂都给烧了。同年夏，山东莱阳又爆发了几万人的抗捐起义。1911年，长江流域大水成灾，饥民暴动和抗捐斗争更为发展。例如湖南浏阳一带和浙江杭州、宁波等地饥民的抢米斗争，规模都是很大的，同时，上海、汉口等城市的工人斗争也日趋活跃，再加以铁路风潮的发生，就使得革命潮流更为高涨起来。中部同盟会虽然没有自觉地看到这种革命运动发展的趋势，但它所规定的活动方针在客观上却是符合于实际情况的。我在上海并未停留多久，也没有见着宋教仁。但宋教仁他们却给我安上了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的名义；这大概是他们觉得张懋隆资望不够，因而故意把我的名字放在他的前面，其实，我并未与闻过这件事。随后，我从上海到了宜昌。一路上看到人们都对清朝政府十分不满，而对革命极表同情；到宜昌又看到那里的川汉铁路职工正在为保路而斗争，这一切使我预感到有什么非常的事件即将发生。在宜昌，我们换乘专门行驶川江的蜀通轮船，这轮船虽说十分简陋，由一只机器船牵带着一只拖驳船并行前进，但比我们当年出川时所乘的帆船说来，已经安稳而又迅速多了。就是这样一只简陋的蜀通轮船，也竟然要请外国人来管理。不仅技术人员是外国人，连船长

也是外国人。这位外国船长摆着帝国主义者的架子，对中国人十分凶狠。因为船上人多很挤，天气又热，所以到晚上有很多旅客到划子上去睡觉，而把划子系在那只载人的拖驳船上。到第二天清早，轮船的服务人员并不等旅客全部登轮，只是由机器船上的洋人鸣笛一声，就立刻开船，并且用刀砍掉系绳，将划子上的旅客弃置不顾。这些旅客，刚从梦中惊醒，即见轮船开走，无不仓皇失措。而且轮船急驶，风浪很大，几乎要把划子淹没。于是这些旅客便大声怒号，高呼求救。看见这种情景，我心中实在难以忍受，便用言语激励轮上旅众，一齐到饭厅里开会。全船旅众对这件事情都很愤恨，因此便喧嚷起来，痛骂洋人不顾中国人的性命，太不讲理。那位洋船长在机器船上听到人们叫骂，非常生气，竟把他的手枪取出示威。但是，人们毫不畏惧，由于更加愤怒，骂声反而更高。这时，船上的买办见众怒难犯，便将那洋船长劝回房里去，并把那些被弃的旅客接上船来。一会，只听得那买办对船长说道：“这帮人都是留学生，谁也惹他们不起。”呵！原来你们只怕留学生，我要你们看看中国老百姓的厉害。我于是继起向旅众演说团结救国的道理，一时人们的情绪又复高涨，纷纷议论不休，吓得那帮洋人和买办低头无语，再也不敢寻衅了。

我经过重庆的时候，见到了谢持、杨庶堪等同盟会员。这时四川的铁路风潮已经闹得很大了，但重庆的革命党人却没有大举起事的图谋。他们只派了朱之洪为铁路股东代表，到成都去作些合法的斗争。朱到成都后也参与了成都革命党人的一些革命活动。我在重庆住了一日即继续赶路回家。路过永川时，我看见满街都挂着黄布，到处都扎起“皇位台”。台上供着光绪帝的牌位，两旁写着一副对联：一边是“铁路准归商办”，一边是“庶

政公诸舆论”。这是从光绪帝的“上谕”中摘出来的两句话，用以作为争路的根据的。市场两头的口子上，还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牌子。一切全和皇帝死了办“皇会”一样。这种情形，乍看起来觉得非常可笑，但仔细一想，确是一种很高明的斗争方法。它既适合于当时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又剥夺了统治阶级任何反对的籍口，而且无论什么官员打从这里经过，都得下来步行，完全丧失了他们平日的威风。这种斗争方法虽是由立宪党人倡议的，但毫无疑问也是得到革命党人同意的。立宪党人取其温和而无犯上之嫌，而革命党人则利用它来广泛地吸引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立宪党人用光绪帝的“上谕”来为自己服务，而革命党人又用立宪党人的方法来为革命服务，这段历史的发展是多么的有趣啊！

在夏历的“盂兰会”(七月十五)以前，我回到了家乡。一天，我往荣县城里去。走到南门外，看见一个人带着队伍，远远地走在我的前面，等进城后走到跟前一看，原来这个人就是龙鸣剑。他自从在成都用“水电报”发出起义的号召以后，马上赶回荣县，参加了王天杰等人发动的起义，组成了一支武装，现在正要率领这支起义队伍，前去攻打成都。他一见我，非常高兴，对我说道：“你回来就好了。同志会由蒲、罗等立宪党人领导，作不出什么好事。我们必须组织同志军，领导人民起来斗争，才有出路。我马上要到前线去，一切大计望你细心筹划吧！”这样议定之后，他便和王天杰领着一千多人的起义军直赴成都去了。当出城门的时候，龙鸣剑异常激愤，他拔剑起誓道：“不杀赵尔丰，决不再入此门。”同行的军士们都很感动。

龙鸣剑、王天杰没有到达成都，在仁寿附近即和清军遭遇，发生战斗。随后他们又与秦载赓率领的起义军会师，组成东路

民军总部，由秦载赓、王天杰任正副统领，龙鸣剑任参谋长。东路同志军与清军转战于仁寿和成都附近一带，因装备悬殊，补充缺乏，在秦皇寺作战失利。于是龙鸣剑、王天杰乃分兵改道攻取嘉定。接着他们又进兵叙府。在行军途中，龙鸣剑以积劳成病，更兼作战不利，病况愈恶，后来竟在宜宾乡下含恨而死。龙鸣剑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奋斗一生，特别是在四川的保路运动中，他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运用正确的策略推动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当时机成熟时，他又毫不迟疑地立即发动武装斗争。在辛亥这年最紧张的夏天，他冒着盛暑，往返于成都、荣县的途中达六七次，这种为革命事业而不辞劳瘁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正因为这样辛勤的工作，才损害了他的健康，丧失了他的生命。他临死之前，仍念念不忘革命工作，并对王天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他虽死在异乡，但入葬的时候，群众自动前往送葬的竟达一万二三千人，可见他是多么受着群众的爱戴。象龙鸣剑这样的人，才是辛亥革命真正的英雄，但过去的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家”却不怎样提到他，这是极不公平的！但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裁判者，既然群众是那样地拥护他，“历史家”纵然不肯秉笔直书，他最后也是不会被埋没的。

自龙鸣剑、王天杰率领起义军离开荣县以后，我便承担起后方的全部责任。就是龙鸣剑起程的那天，荣县城里的大地主张子和请客，我也被请去了。席上有人持大地主、大当铺老板郭慎之上县官一禀，说什么“三费局”（征收局）被匪（按指龙鸣剑、王天杰）劫去了八百两银子，要张子和签署。我一看即问张子和道：“龙鸣剑和王天杰领着同志军去打赵尔丰，是替我们大家争铁路、争人格，他们是为国争权、为民除害，做的是正大光明的事情，怎么能说他们是土匪呢？”被我这么一问，满座的士绅们都哑

口无言。我于是继续说道：“同志军到前线去为我们打仗，我们在后方应该继起支援。我提议全县按租捐款，替他们筹军饷。”对于我的提议，他们心里虽然不赞成，但却没有人敢出来反对。席散，我即召集各方人士商议，通过了按租捐款的办法，就这样为同志军解决了精饷问题。有了经费以后，我更加紧训练各乡民团，并且还开了一个军事训练班，准备不断扩大队伍，支援前线。

当龙鸣剑病重离开部队以后，王天杰感到孤单，便率领部队回到荣县。清朝政府的荣县知县和郭慎之等土豪劣绅一听到消息就都逃走了。王天杰等来找我商量办法。我提出应立即宣布独立，自理县政，大家都很赞成。这时，广安县的同盟会员蒲洵因来与我联系工作，正住在我的家里。我考虑到本县人出来管理县政，容易惹起纠纷，于是便想请他来主持荣县民政。我征得他本人同意后，便提出来请大家讨论，大家一致拥护。9月25日（八月初四），我和王天杰等在城内召集各界开会，由我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并提议蒲洵主持县政。大家都知道我是刚从东京同盟会总部回来的人，自己不图官职，却把蒲洵推了出来；而蒲洵也是同盟会员，并且又是外县人，与各方面全无矛盾；因此都很满意。于是，在一致欢呼声中建立了荣县的革命政权，从此，东路民军也有了一块根据地作依托了。

荣县起义，发动于8月初，比武昌起义要早两个月。荣县宣布独立是9月25日，比武昌起义也早半个月。因此，它的影响很大，成为成都东南民军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在荣县独立的前后，起义军还曾经占领过彭山、眉州、青神、井研、名山、洪雅、夹江等十数州县，但都旋得旋失，没有得到巩固。只有荣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并且一直坚持下去。辛亥革命胜利以后，蒲洵还在

荣县作知事，他的政声很好，受到群众拥护，替当时的革命党人保持了荣誉。

我们虽然在荣县站住了脚，但小小一县的革命政权，是难于单独存在的，因此必须向外发展。我们首先去攻威远，马上就攻下了。再攻自流井，却遭到大队巡防军的抵抗，相持不下。这时武昌起义已经爆发了。我们由于被敌人严密封锁，并不知道外边的情况，只是从各种风传中听说湖北革命党造反，有一个姓黎的当了都督。这又引起了我们的疑问：既是革命党人起义，就应该打出孙中山先生的旗号，怎么会钻出一个姓黎的人来呢？我们局限在一个地方斗争而不了解整个局势的发展，真是苦闷极了。我们必须和外面取得联系！

十七 武昌起义

当时的传闻倒也不是假的。传闻中所说的湖北造反就是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发动的武昌起义，那个姓黎的都督便是黎元洪。

武昌起义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是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而四川沸腾的铁路风潮和带有全民性的武装起义更是促使武昌起义爆发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两湖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而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有效活动又是武昌起义能够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原因。

早在1904年，武汉就出现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等革命团体。日知会的会员分布在湘、鄂两省，同盟会成立后，他们纷纷加入，因此，后来日知会差不多成了同盟会的分支机构。萍、浏、醴起义时，日知会曾经图谋响应。1906年，日知会遭到破坏，刘

静庵(敬安)、胡瑛、季雨霖、李亚东、张难先等被捕入狱。1908年7月,革命党人在武昌拟组织军队同盟会未成。7月,杨王鹏等人发起在新军中组织群治学社,并刊行《商务报》,积极鼓吹革命。1910年,群治学社拟乘长沙的抢米风潮举行起义,引起了湖广总督瑞澂的注意,遂改名为振武学社,表面上宣称讲求武学,暗地里从事革命活动,扩大革命组织。1911年初,因遭受挫折,又改名为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作掩护,而积极地在新军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同时发行《大江报》,从事革命宣传。文学社的主要分子为蒋翊武、詹大悲、杨王鹏、刘复基等,社员至1911年7月,已有五千多人。当时湖北的新军共计不过一万六千人左右,而文学社员却占了这么大的数量,可见作为清朝反动政府支柱的新军,已经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由于革命党人的工作,而一步步地革命化了。此外,共进会在两湖地区也拥有一定的力量,这时湖北的孙武和湖南的焦达峰等,正在共进会的名义下,积极从事联络会党的工作。1911年夏,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后,极力策动共进会和文学社合作。经过多次协商,这两个群众基础较好的革命团体终于联合成功。8月,它们鉴于四川的铁路风潮已开始发展为武装起义,感到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共同组织了一个领导机构,准备大举起义。起义的临时总司令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

9月初,清朝反动政府被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吓坏了,连忙派端方从湖北调一部分新军入川镇压,湖广总督瑞澂知道新军中潜伏着大批革命党人,所以新军调走,他非常高兴。但革命党人却恐新军分散,于革命不利,因而急谋迅速举事。9月24日,革命党人举行会议,决定在中秋节(阳历10月6日)发动起义。此后,武汉的街头巷尾,到处都传遍了中秋节杀鞑子的故事,风

声越来越紧。这时，瑞澂才感到军队调走，防务空虚，恰好给革命党人造成了良好的机会，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困难，不仅从前的高兴化为乌有，而且吓得心神不安，坐卧不宁，竟自把行辕设在兵舰上，每天偷偷地到那里去睡觉。

由于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原定的起义日期被推迟了十天。谁知10月9日(八月十八)的上午，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的时候，不慎失事，孙武头部受伤，机关遭到破坏，所有起义的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均被搜去。因为起义计划暴露，怕迟延遭到损失，蒋翊武便以总司令的名义发出紧急命令，决定当晚午夜起义。这一命令还没有完全传达下去，武昌小朝街的起义总部和其它许多机关，都又遭到破坏，起义的领导人员大批被捕，蒋翊武乘机逃走。这天晚上，瑞澂一方面残酷地杀害了被捕的起义领袖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一方面禁闭城门、封锁营门，根据所获名册到处搜索起义分子，弄得满城风雨，空气十分紧张。一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不但革命分子人人自危，就是与革命党人稍微接近的人，也都惴惴不安，大家都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斗争。

10月10日(八月十九)，瑞澂根据名册继续大索革命党人，并扬言要把革命党人斩草除根。这样一来，武汉三镇完全陷入恐怖的气氛中。至此，新军中的一些革命分子便决心起来反抗，以图死里求生。当晚7时，住在武昌城内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其中的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正欲行动，被排长陶启胜发觉。陶命左右绑金，金大呼“同志动手”，全队士兵齐声响应。反动军官或被击毙，或闻风逃走。起义士兵四十余人，在熊秉坤的率领下，一直向楚望台军械局进攻。当夜在楚望台防守的工程营左队士兵，也纷纷起来响应起义，于是军械局遂被

起义军占领。这时武昌城各处革命党人听见枪声，也纷纷起义，并不断奔赴楚望台。经过大家计议，决定进攻督署，捕杀瑞澂。但因部队纷乱，缺乏指挥，进攻不克。这时，起义的士兵越来越多，起义的范围越来越大，熊秉坤感到指挥困难。恰好这时有一个士兵把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找到了。吴是在楚望台士兵响应起义时乘隙逃跑的。由于他平日在士兵中还有一些信仰，所以现在被大家推为临时总指挥。吴当即根据情况，提出作战方针，同时又申明纪律，重新发动对督署的进攻。瑞澂在猛烈的进攻下，破墙而出，逃上兵舰。其余清朝官员，也都在起义的枪声中逃得干干净净。至11日上午，武昌遂为起义军完全占领。

起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由谁来负责领导呢？当时在起义军方面，从前的领导人员或则被捕，或则逃亡，正是群龙无首。他们在吴兆麟等人的建议下，把从前的新军协统黎元洪找出来做了都督，把从前的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找出来做了民政总长。汤化龙是一个著名的立宪党人，根本就不赞成革命。至于黎元洪，不但从前残杀过许多革命党人，就在起义那天晚上，他还手刃了一个送信的革命士兵，后来见起义势盛，才逃匿在他手下的一个幕友家里。当吴兆麟派人去请他的时候，他吓得浑身发抖。他见了吴兆麟，不但不肯拥护起义，反而责问吴为什么造反。以后大家把他拥为都督，他还是不敢在安民布告上签字。后来别人强迫把他的辫子剪了，他还为那条奴隶的标志哭了一场。等到汉阳、汉口光复，一直等到10月17日，驻汉口的各国领事都宣告“中立”以后，黎元洪才宣布就任都督的职务。武昌起义的结果既然是由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人物出来当权，那末，它以后逐步走上和反动势力妥协的道路，就丝毫也不奇怪了。

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各省也纷纷响应，宣告独立。清朝政

府二百余年的反动统治，很快就陷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中。但是，各省的情况也和武汉相差不多，革命的果实没有落在人民的手中，而是被一些军阀官僚和立宪党人篡夺去了。

十八 内江起义

端方自从9月初奉到清朝政府“入川查办”的命令以后，即率领大队鄂军，浩浩荡荡地杀往四川。但是，他的队伍还没有到达成都，武昌起义就爆发了。在端方的鄂军中，有很多的革命党人，他们一进入四川，便极力想和四川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鄂军后队中有一个名叫田智亮的革命党人，在万县遇着了四川的革命党人张颐。经过他们的密商，决定派人到资州一带联络前队士兵，发动起义，捕杀端方。端方刚入川的时候，虽然其势汹汹，但愈往前走，愈发感觉自己陷入了人民群众层层包围之中；加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更吓破了他的肝胆；所以到了资州，他便踌躇起来，再也不敢贸然前进了。他虽然派了一支队伍，去援救在自流井被民军所困的巡防军，但也只走到内江和威远交界的界牌地方就停下了。这时，我们民军方面，对整个大局并不了解，只见久攻自流井不克，巡防军愈聚越多，而端方又派兵前来，便感到形势十分严重，因此人心不免有些惊慌。同志们都要我赶快想办法。我于是和大家约定：由他们坚守阵地，我到外面去搬救兵。我说：“只要你们能坚决死守，一星期以后必有救兵来到。”我早先就从孙武那里知道新军中潜有许多革命党人，现在端方领兵来到，我相信孙武他们是一定会派人来找我的，所以我才敢这样大胆地说。同志们因我从来不说假话，对我很有信仰，所以听了我的话以后，情绪十分高涨，都愿意死守待

援。我看见这种情况，也就比较放心。11月21日(十月初一)，我同吴庶咸二人偷偷地越过敌人防线，走到贡井一个同盟会员家里住了一夜。这位同志潜伏在敌人的警察署里工作，成天地盼望民军打来，他好率部响应。我们把他那里的工作部署好了之后，又连夜轻骑赶赴内江。内江的革命党人很多，烈士喻云纪的家也在那里，极便于我们藏身和进行工作。我们于23日(十月初三)到达内江，住在喻烈士的家里。这时恰好有端方的队伍经过，我们很快就和其中的革命党人接上了头，决定由他们到资州杀掉端方，我们在内江发动起义。

11月25日(十月初五)，端方的队伍果然在资州起义了。平日骄横不可一世的端方，这时竟在起义的士兵面前哀求免死，胡说什么他祖先原本汉人，隶入旗籍还不满四世……，想以此骗取一条活命。但是，对于这个作恶多端的无耻家伙，起义的士兵们毫无怜惜地把他杀死了。士兵们公推革命党人陈镇藩为入川鄂军的统领，而陈也就马上派人到内江来与我联络。

11月26日(十月初六)，内江的知县听到了端方在资州被杀的消息，便立即逃走了。巡防军接着也逃跑一空。有人到喻云纪家来找革命党人。我们于是决定立刻行动，并且马上到了团练局。这时有些革命同志正在那里同团练局长谢仲辉谈判。谢说什么土匪来了他可派兵去打，同志军来了他可派人交涉，如果鄂军来到，治安问题他就无法负责了。我当即回答说：“治安问题完全可以保证，但你必须首先将团练局交出。”谢不肯答应，聚集在外面的群众便大声怒吼：“非交不可，一定要交！”谢不得已才允许交出。我们于是立即将团练局接收。接着，喻云纪的父亲和当地同志便去召集群众，在天后宫的大戏台前开会。一时前来参加的有好几千人，情绪空前热烈。当由我上台宣布革命

宗旨，主张建立革命政权，群众听说，欢呼万岁，声震屋瓦。当场通过成立内江军政府，并一致举我为行政部长，吴庶成为军政部长。当成千的群众把我们拥到县署去办公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到群众力量的伟大，真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丝毫不爽。

成都的革命党人，知道我曾经组织过共进会，而共进会与新军素有联系，因此，当端方的队伍逼近成都的时候，他们特派康宝忠和董修武两人赶到我家，邀我到成都去策划起义。他们到我家扑了个空，又跟踪追到内江，正赶上内江起义成功。他们到县署一见我就说：“省城的同志都准备好了，专等你去，好发动起义，我们立刻一起动身吧！”我说：“这里今天才组织起来，不能马上离开，你们请先回去，告诉同志们努力奋斗，我一星期后就到。”就这样，他们便赶回成都去了。

陈镇藩派人和我们取得联系之后，于11月27日（十月初七）率军来到内江，我们特开大会表示欢迎。内江人民看见这么多装备精良的军队和人民站在一起，情绪更为兴奋。起义军队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也非常感动。在欢迎会后，我要陈镇藩把军队留在四川，共图大举。他说：“现在军心思归，而且武汉方面战争还很激烈，我要赶快率队回鄂，替革命效力，但求你们沿途替我疏通，我就万分感谢了。至于四川的事情，还望四川同志好自为之。”随后，他送了我们快枪四十余支，我们也送了他一千五百两银子，并且告诉了他沿途联系的方法。就这样我们便匆匆地分别了。

我们在内江举行起义的时候，还不知道重庆已经在11月22日（十月初二）宣布独立。原来11月5日，夏之时就在成都附近的龙泉驿率部起义。夏是四川合江人，曾经留学日本的东斌学校，并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他毕业回川后，在清军中担任排

长,驻扎成都。当四川保路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他看到革命的时机已到,便准备发动起义。恰好这时他奉命率领步兵一队驻守龙泉驿。他趁机暗地向士兵们进行革命宣传,士兵们都很感动,愿意随着他参加革命。这时驻在龙泉驿的还有骑兵和辎重兵各一队,夏又派人去进行宣传,结果这两队的士兵也愿意和夏部一致行动。到了11月5日的晚上,夏之时集合三队的官兵二百余人,在驻地附近的一所庙里宣布起义,当场将驻龙泉驿指挥的东路卫戍司令魏楚藩处死。这天晚上,恰有新军教练官林畏生奉赵尔丰的命令,前去迎接端方,正好住宿龙泉驿。他听到庙内欢声大起,赶忙前去察看。有一个士兵认识他,马上举枪对他射击。夏之时立刻起来保护他,因此他虽然受伤,幸免于死,并且还参加了起义队伍。起义成功后,士兵们一致推举夏之时为革命军总指挥,当夜整装东行,直奔重庆。由于当时端方的部队驻在资州,所以他们绕道取小川北路线东下。他们沿途受到群众的欢迎,并不断地扩大了革命队伍。11月21日(十月初一)夏军到达重庆近郊。当夏军接近重庆的时候,重庆的革命党人就派人前去与他取得了联系。11月22日(十月初二)夏军在城内革命党人的协助下,胜利地开入了重庆城。由于夏军的到来,清朝反动政府在重庆的官吏见大势已去,除个别逃跑者外,其余的都被迫向革命党人投降。当天,重庆各界群众在朝天观举行大会,成立了蜀军政府,推举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并通电全国宣布独立。

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一再函电催我前往。这时我已知道武昌起义成功,全国纷纷响应,我把整个大局仔细考虑之后,觉得必须与领导全国革命的总机关取得联系,才好进行工作。因此,我把内江的工作安顿就绪之后,便于12月2日(十月十二)

起程，连夜赶往重庆去了。

十九 重庆军政府的军事裁判会

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立即组织军队，准备西上讨伐成都。这时，在全国和全省革命潮流的袭击下，成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政变。

自从端方在资州被杀、内江起义成功，进攻自流井的民军，因此也取得了胜利。于是，成都四周的民军，势力大振。这时被民军围困了几个月的赵尔丰，眼看救兵已经绝望，成都早晚要被打开，他便作这样的考虑：与其被革命党推翻，不如将政权交给立宪派，便于保存实力。就这样，11月27日，在立宪党人和赵尔丰的勾结下，成都扮演了一出“独立”的滑稽戏，成立了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由立宪派头子蒲殿俊担任都督，赵尔丰的心腹新军统制朱庆澜担任副都督。至于赵尔丰，仍被委以办理边防的重任，实际上操纵着军政大权。对于这样的“独立”，人民当然不会满意。各地民军都以“索赵”为号召，继续向成都进攻。这时，赵尔丰已确知清朝中央政府尚未垮台，于是又阴谋复辟。12月8日，蒲殿俊到校场点兵，巡防军在赵尔丰的唆使下，发生哗变。蒲殿俊从此躲藏起来，连都督也不敢当了。四郊民军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愤慨，便相率入城，将赵尔丰围困在督署里面。赵尔丰的复辟阴谋终未得逞。经过这一场事变，成都军政府为了欺骗人民和敷衍民军，不得不实行一番改组。于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前陆军学堂总办尹昌衡当上了都督，与哥老会有联系的罗纶当上了副都督，同时还拉了几个革命党人来当部长，以资点缀。但是，人民对赵尔丰的仇恨，始终不能平息下来。立宪党人

看到不杀赵尔丰,不足以平民愤,将会引起深刻的革命,因此,才不得不借赵尔丰的头来缓和群众情绪。12月22日,尹昌衡和立宪党人依靠着民军的力量,解决了督署的武装,捕杀了赵尔丰。立宪党人在捕杀赵尔丰之后,便马上回过头来对付民军。在他们软硬兼施的进攻下,缺乏正确思想领导的民军首领,有的被腐化收买,有的被残酷杀害。于是,轰轰烈烈的起义运动,竟被瓦解,人民艰苦斗争的果实,竟被立宪党人窃夺去了。

从这一系列的事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尔丰是清朝反动统治在四川最顽固的代表者,他曾经用尽一切办法,来挽救清朝反动政府在四川所遭遇的危机,他自始至终没有动摇过对清朝政府的忠心,以至最后和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同归于尽。以蒲殿俊、罗纶等为首的立宪党人,则代表着四川地主阶级和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他们也曾假借革命群众的力量,向清朝反动统治者作过一定程度的斗争,但是,他们最害怕的是群众真的革起命来,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所以,他们对赵尔丰等清朝反动统治的代表者总是特别“宽大”,而对起义群众却格外的残忍无情。至于起义的民军,它基本上是由自发参加斗争的广大下层群众所组成的,其领导成员多半为会党首领,只有少数是革命党人,他们当中有不少的优秀分子(如龙鸣剑等)大多在残酷的斗争中牺牲了,而剩下来的人后来却上了立宪党人的圈套,无形中成了替他们争夺江山的工具。但是,无论是争路运动和推翻清朝的功劳,都应该归之于这般下层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身上。赵尔丰是屠户、立宪党人大部分都是骗子、起义民军大部分都是好人,这并不是什么高论,而是广大人民群众早已作出的历史定评。但是,周善培却不同意这种论断,为此,他特地写了一本《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把赵尔丰描写成实行禅让的尧舜,

把立宪党人视为彬彬有礼之士，而把革命党人和起义群众则看作大逆不道的匪徒。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周善培的无耻妄说，有谁能相信呢？其实，周善培在这次运动中，担任了一个颇不光彩的角色，他曾经以提法使的地位参与了赵尔丰镇压和破坏人民革命斗争的一切残暴行为和阴谋活动。当然，平心而论，他和赵尔丰还是有所不同的，他虽然坐在他的大帅（赵尔丰）的那只船上，但他一看风头不对，就把一只脚踏到立宪党人的那只船上去了。因此，他比他的大帅总算要开明些。不过若与他的采帅（王人文）比较起来，他就未免有些逊色了。因为他的这位采帅，曾经为庇护立宪党人而丢掉了官职，也就是说，当他看到清朝政府这只破船快要沉没的时候，就从船上跳了下来，而不象周善培那样犹豫不决地踏在两只船上。因此，周善培根本就没有资格写什么《辛亥四川争路亲历记》，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亲历过四川人民的争路斗争。他如果为人老实，肯把他们那帮人如何反对四川人民争路的亲身经历写出来，倒一定会有许多非常精彩的内容。但他不肯如此，却硬着头皮把他反对争路的亲历写作争路的亲历，因此就不免要大闹笑话了。读者只要翻开他的书一看，满纸都是大帅、采帅之类的称呼，他的反动立场就怎么也掩盖不住了。

当重庆蜀军政府正在组织军队准备讨伐成都的时候，它的内部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危机。这次军事行动，原定由夏之时以副都督的身分亲自领兵出征，而以总司令林畏生兼任北路支队长。林对此发生误会，以为摘掉了他的总司令职权，大为不满。本来林的参加革命就是出于被迫，根本没有什么觉悟，及至当了蜀军总司令，他自以为过去在新军中的地位比夏要高，因此，对夏常出不逊之言，态度非常傲慢。现在又误认夏在故意压

抑他，一怒之下，即将支队长的委任文书和一切印信当众撕毁，并且破口大骂，持枪握拳，闯进军政府，声言要找夏之时拚命。而且林手下有一两个团长，更横行不法，纵容着士兵四出扰民。我到重庆的时候，正碰到这种情形，当时重庆到处街谈巷议，人心惶惶不安。而张培爵和夏之时对此却毫无办法。刚刚成立不久的蜀军政府，差不多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中。张培爵见我来到，非常高兴，连忙要我想个办法。我严正地说：

“只有严明纪律，才能维护革命政权，现在必须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情，并准备实行军事裁判，整顿军纪。”

张培爵很同意我的意见。这时虽已深夜，但他仍立刻下令召集全体负责军政人员开会，不许携带武器，并令守卫妥为戒备。一会，人们到齐，会议开始。夏之时首先报告事情发生的经过，请全体讨论解决。这时林畏生毫不在意地起来大声说道：“我林畏生罪多得很！砍官防，其罪一也；撕委任状，其罪二也；辱骂都督，其罪三也；闹军政府，其罪四也。看你们敢把我林畏生怎么样！”他气势汹汹，说完就坐下。过了许久，没有一个人敢起来发言。

我看见这种情形，非常气愤，心想既为革命党人，对清朝反动政府都敢起来革命，为什么对这样一员悍将就不敢斗争了呢？于是抑制着愤怒，从容地起来说道：

“我们革命的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实行民主政治，解除人民痛苦，并不是以暴易暴。我们革命党人是不侮鳏寡，不畏强暴的。扶正义，打抱不平，正是我们革命党人的本色。如果我们今天刚一胜利，就横行霸道，和清朝官吏一样，实在违反革命初衷。……”

我沉痛地讲了两个小时，最后主张执行革命纪律，把这个会

议变为军事裁判。全场热烈鼓掌，表示同意。这时林畏生才不时地看我，对我这样一个陌生人的讲话，感到惊异。

接着夏之时说：“我是当事人，不便主持裁判。我提议请最近由同盟会总部派来的、孙中山先生亲密的朋友吴玉章同志作裁判长。”大家表示赞成。这完全出于我的意料。我想：由于我的提议才召开这次会议，现在要我来主持裁判，岂不是故意把杀人的事情推给我作吗？但接着又想：如果推辞，旁人也是一定不干的，事情又怎么解决呢？于是，便毅然接受了大家的推举，并且向大家说道：

“第一，我说明犯罪的行为时必须得众人的同意；第二，我判决的处罚也必须得众人的同意；第三，判决后犯罪人得申诉或声明不服，并说明不服的理由；第四，判决后一定要遵照实行。必须大家都赞成这四个条件，我才能就职。”

大家都说：“这是最公平的裁判法，我们赞成。”

于是，军事裁判就立即严肃地开始了。我详细地说明林畏生的犯罪行为违背了革命宗旨，危害了人民利益，无异企图推翻革命军政府，应照军政府规定的军法处以死刑。问大家同不同意，大家表示赞成。于是又问林是否服罪，限他二分钟以内讲话。林却沉默着。又延长五分钟，他仍不讲话。经再三催促，他才说：“说我想推翻军政府，我没有这个心思。”

我说：“我不能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心思。但判断犯罪以客观行动为标准，你的行动是危害军政府的。”

他再也没有话讲了。于是我就请夏之时执行判决。夏却犹豫起来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应该特设什么什么的话。他的意思是说，裁判既是特设的，执行也应该特设。因为他说得不清楚，有些人就以为是“特赦”。于是他们又反过来为林畏生辩

护，说林也是参加了起义的人，应该从宽处理，赦免他。

我坚决反对，认为大家刚才约定的条件，不应该马上就自己推翻。辩论了一小时，还是没有结果。有一个激烈的革命党人愤慨地说：“象你们这样懦弱畏缩，我就拿炸弹来把大家炸死算了。”大家又纷纷反对他。我说：“不必性急；我试问林畏生这样蛮不讲理的人，谁能保他以后不再作乱事呢？”

这时有一位姓舒的团长起来说：“我保他，我们四团人保他。”

他话犹未了，卫队中几个士兵就齐声说：“就是这个家伙最坏！”因为士兵们说话时过于激动，挤得刀枪碰击作响，那位舒团长恐怕有人打他，急忙把头低下去躲藏，猛地一下碰到桌子角上，流出血来。大家以为士兵开了枪，都赶快逃避。石青阳尤为可笑，竟把茶几顶在头上，跑了出去。这时会场上就只剩下我和张培爵、夏之时、林畏生四个人。林也和张、夏两人一同劝士兵们归于安静。卫兵说：“就是那舒团长劝林司令做坏事。”我说：“现在暂把舒团长扣下，另案办理。今晚还是要把这个案子结束。”

接着又把大家都请了回来。好在军政府戒备很严，没有一个人逃得出去。大家坐定后，我看林畏生并未趁这次扰乱逃走或者有什么不好的表现，也就有从轻处罚的意思了。因此我就和大家商量：“有人说要特赦他，但是谁能替他保证呢？”谢持、朱之洪说他们愿意担保。最后决定立刻解除他的职务，并且派人送他回湖北原籍。

这件事情充分地表现了当时蜀军政府的软弱无力，也表现了当时这些革命党人的畏缩、妥协。然而，经过了这一次严重的斗争，蜀军政府总算得到了暂时的巩固，更重要的是重庆人民都

高兴为他们除去了一个祸害。

这时已是 1911 年的 12 月了，南京已被民军攻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酝酿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也已经从国外回来，首途前往南京。因此，我也准备到南京去。于是，重庆蜀军政府就让我 and 杨庶堪作为它的代表到南京去参加临时政府的工作。

二十 南京临时政府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非常惊慌，连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两镇前往扑灭。但北洋军的将领，都是袁世凯的爪牙，荫昌指挥不动。当时一切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的许多有力人物都认为袁世凯是个“人才”，只有他才能挽救中国反动势力的灭亡。清朝政府不得已，只好再度起用袁世凯。袁自从 1908 年被清朝政府解除职务以后，即在彰德“养病”，而实际上仍然控制着他自己所培植起来的北洋军队。现在，革命兴起，清朝垂危，正是他玩弄权术的绝好机会。清朝政府发表他作湖广总督，他故意坚辞不就。一直等到清朝政府答应了他的全部条件，赋予了他以全部权力，并且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以后，他才出来组织力量，对革命展开进攻。

有一个名叫朱芾煌的川籍同盟会员，在武昌起义以后，估计到袁世凯一定会得势，便跑到袁那里去进行投机。他去到彰德，看见袁世凯布衣草帽，成天在那里钓鱼，装作不问国事的样子。朱于是劝袁趁机把清朝政府的军政权力夺取过来，然后投效革命，那么革命方面一定会推袁出来统一中国；并表示他愿意为袁在革命方面进行疏通。袁听了以后，表面上虽然没有什么表示，暗地里却非常喜欢。因此，他把朱芾煌留作策士，待以上宾之

礼。不过，袁从清朝政府那里取得大权以后，并不是去投效革命，而是要革命投效他，由他来作中国的独裁者。在袁世凯还未北上组阁之前，清朝政府迫于形势，已经把汪精卫、黄复生等革命党人释放出来了。汪出狱以后，便和北方大官僚、大地主、大买办的代表李石曾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京津同盟会。在京津同盟会里面，虽然也有不少真诚的革命分子(如彭家珍等)；但它的主要成员如汪精卫、李石曾等，则专门为袁世凯捧场。他们和中外许多反动分子一样，认为只有袁世凯才能收拾当时中国的时局。汪精卫为了巴结袁世凯，还与他的长子袁克定结为兄弟。

袁世凯既从反革命方面取得了权力，又与革命方面的不肖分子有了勾结，他就可以在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操纵自如，而对革命也既可以打又可以拉了。袁世凯奉命组阁以后，看到革命正在迅速发展，便决定对革命实行进攻。他一方面用计刺杀了准备在石家庄起义的革命党人清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使反革命的中心直隶和北京得到巩固；一方面集中兵力，从革命军手中夺去了汉口和汉阳，并隔江炮击武昌，使武昌的军政府受到严重的威胁。但是，他并没有乘虚渡江进击武昌，因为他需要养敌自重。他于展开军事进攻的同时，又对革命方面展开了和平攻势。于是，12月中旬，在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压迫下，民军代表伍廷芳与清朝政府(实际上是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达成了临时性的停战协定。自此以后，双方就没有再发生什么大的战事。

本来，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全国人民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在革命党人的领导和影响下，各省的新军和会党纷纷发动起义。到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就已经有十五个省宣布独立。若把边远地区除外，这时清朝反动政府能直接控制的地方已经

很少。就是这些地区，也在酝酿着革命。甚至它肘腋之下的直隶省，也曾经爆发过起义。而且，广大农民还掀起了反封建的斗争。例如江苏、广东和湖南等省，即有很多农民自动武装起来，惩办土豪劣绅，反对封建压迫。其他各省也都发生过大小不同的农民起义。至于四川的农民斗争，其规模之大，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以外，近代史上再没有可以和它比拟的。为了保卫武昌起义，起义各省特别是湖北人民曾经作了英勇的斗争。无数工人、农民乃至一些知识分子，都纷纷参加起义军队，并且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勇敢。当民军和清军作战的时候，广大人民更是极力支援民军，打击清军。这说明革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再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但是，这样高涨的革命斗争，却没有一个坚强的政党来领导。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以后，几乎陷于瓦解的状态。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虽是极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倒很合乎事实。而立宪党人这时却很活跃。他们摇身一变，钻入革命阵营，并把革命的领导权窃取而去。昨天还在拥护君主，今天忽然“赞成共和”，许多立宪党人就这样成了“开国元勋”。由于他们的混迹革命，革命方面的矛盾和纠纷更为增加了。因此，武昌起义后，各省虽然纷纷响应，但好久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来。当时，武汉和上海之间为了建立中央政权就发生过很大的争执。后来，上海方面让步了，起义各省代表才由上海转赴汉口开会。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的反革命军队占领了汉口、汉阳。于是这批代表就跑到汉口的外国租界里去开会。他们不敢讨论如何组织力量，打退袁世凯的进攻；如何推进革命，争取全国的胜利；却在那里咬文嚼字地讨论什么临时政府组织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猎取官位

的上面。更可怪的是，他们竟在袁世凯的炮火下通过了一个“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充分地暴露了他们在革命初起的时候，就早已作好妥协投降的准备了。

12月2日，江浙方面的革命军队攻克了南京，于是各省代表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备过程中，各派势力之间又因为争夺权势，闹得不可开交。直到孙中山先生于12月末回到上海，才打开了僵局。接着，孙中山先生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元旦正式宣告成立。但是，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规定，临时政府只设立五个部，粥少僧多，怎能容纳这么多要作官的人呢？这时，有一个叫李肇甫的同盟会员，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他出身于官僚家庭，懂得旧式官府的那一套组织，于是由他提出一个扩大政府组织的办法来，把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安置下来了，因此大家都很满意。这个临时政府，既有立宪党人，也有官僚军阀，但革命党人还是占着主要的地位。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因此，它极力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是，由于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是没有实现的条件。而且，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本身就处在风雨飘摇中。孙中山先生当选后，根据事前的规定，立即致电袁世凯，表示和议成功，即当避席。孙中山先生这个总统，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主持和议的总统罢了。

1912年初，我到达南京。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都已经组织起来了。当我们还在途中的时候，重庆蜀军政府即已和成都大汉军政府达成协议：由双方共同派遣黄复生、李肇甫、熊成章三人为四川省的参议员。因此我们到南京后，即没有再作蜀军政府代表的必要了。内务部次长居正和秘书长田桐看见

我没有作官，感到非常抱歉，忙对我说：“你来晚了一步，若早来点，怎么也有一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司长、局长或是参事，你任便选一个吧！”我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作官，你们且不谈这些吧。”但随后他们就给我送来了一张疆理局（即土地局）局长的委任状，我马上退了回去；接着，他们又换来了参事的委任状，我还是给退回去了。后来，孙中山先生要我在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他对我说：“你来得好，现在正要收拾残局，很需要你帮忙。”我于是接受了他的邀请。这时，原来在总统府秘书处负责总务工作的李肇甫已经当参议员去了，我于是接替了他的工作。当时南北和议已成定局。很明显，和议一成，总统府秘书处就要取消。因此，开始很红的秘书处，现在变成了冷门。从前有很多人到秘书处钻营，现在却谁也不愿来这里工作了。甚至秘书处也有人另作打算，有的干脆到袁世凯那里去找官做。有个叫程明超的，他本来是个旧官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秘书处弄到了一个高位，这时即抱着五日京兆的心理，根本不来办事了。还有一个叫秦毓鎰的，他偷着为自己填写了一张委任状，准备回到他的家乡无锡去做知县，一时传为笑谈。从这些事情当中可以看出：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有些革命党人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蜕化，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去了。

二十一 袁世凯窃国成功

辛亥革命所激起的广大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由于缺乏领导，并没有深入地展开下去。中国资产阶级本身既很软弱，又不敢

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因此，它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面前，除了退却和妥协之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孙中山先生刚回国的时候，颇不以和议为然。大家推他为临时大总统，他也很失望。因为他在英国的时候，曾经和英国政府谈定一笔小小的借款；现在总统既然是临时的，这笔借款当然也就无效了。因此，他对当时的和议条件很不满意。但是，当时各方面的“舆论”（当然只是上层阶级的舆论）几乎没有不赞成和议的。而一切帝国主义又都极力支持袁世凯，把他视为它们的新的代理人。尤其是英帝国主义，它的驻华公使朱尔典就是支持袁世凯绞杀革命的主谋。英帝国主义虽然也和孙中山先生拉点关系，但这就更显出它的奸诈。正因为中外反动派勾结成功，一致压迫要讲和，所以孙中山先生反对和议的主张，遭到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绝大多数有力人物的非难。汪精卫甚至对孙中山先生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在各方面的包围下，孙中山先生后来也就不再坚持己见了。

临时政府成立后，和议继续进行。南京方面向袁世凯提出：和议成功后，保证举他为大总统；但必须以清帝退位和他赞助共和为条件。于是袁世凯开始逼宫，企图强迫清帝退位。但却遭到满洲贵族中的顽固分子宗社党人良弼等的坚决反抗。这时，京津同盟会中的川籍会员彭家珍，认为杀了良弼，便可导致共和，使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决定拚死以除良弼。他怎么能够知道他的英勇牺牲，并没有发生多大的作用，只不过是帮助了袁世凯登上总统的宝座呢？彭家珍为了刺杀良弼，曾经用尽心机。他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特地装扮成一个威武的军官，穿着整齐的军服，挂着明亮的军刀，于1月26日，装着良弼的一个好友前去谒见。但那天良弼刚好不在。当晚他又去，良弼又不在。

但他刚往回走的时候，在不远的途中恰好良弼回来了。在路上一来一去的两辆马车相遇，彭就高声叫“贛臣……”（良弼的号），良弼未应，彭即调转马车，跟着良弼的马车追去。到了良弼的公馆，良弼一下车就走近门前，彭也急下车，趁良弼升阶正要入门之时，急投一弹，彭在阶下当时即被炸死，而良弼也负重伤，于两天以后就死了。宗社党人因此吓破了胆，同时又看到大势已去，便不敢再坚持帝制了。清朝皇室终于接受了退位的条件。袁世凯的逼宫竟因彭家珍的刺杀良弼而获成功。我们从当时和议双方达成的优待清朝皇族的条件，可以看到南京临时政府是多么的软弱！

清帝退位之后，和议很快成功。孙中山先生为了保障共和，想出了两个自以为非常高明的办法：一个是颁布约法，想用法律来限制袁世凯；一个是建都南京，想把袁世凯调离北京这个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窠。从2月初开始，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南京的参议院根据资产阶级国家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制定了一部中国宪政史上著名的临时约法。袁世凯对于这个临时约法并不怎么理会，因为他知道这些纸上的东西是可以随时撕毁的。他特别注意的是迁都北京的问题。2月13日，袁世凯在给南京的电文中，于通知清帝退位的同时，就表示他不愿南下。2月14日，南京参议院开会的时候，竟然通过了迁都北京的决议。本来在参议院中，革命党人占据多数，是完全可以根椐孙中山先生的意见通过建都南京，反对迁都北京的。但14日开会的时候，革命党人李肇甫，却到台上去大放厥词，说了一通迁都北京的必要；参议员中原来就有不少人对袁的不愿南下表示同情，而李又善辞令，他这么一说，赞成迁都北京的人便成了多数。孙中山先生和黄兴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非常生气，

当天晚上把李肇甫叫来大骂了一顿，并限次日中午 12 时以前必须复议改正过来。15 日晨，秘书处把总统提请复议的咨文作好后，需要总统盖印，而这时总统已动身祭明孝陵去了。我急着去找黄兴，他也正在穿军装、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请他延缓时间，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说完就走了。这怎么办呢？只好找胡汉民去。好容易才把他找到，拿来了钥匙，开了总统的抽屉，取出他的图章盖了印，把咨文发了出去。同时，并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投票。经过我们一天紧张的努力，当天召开的参议院会议终于把 14 日的决议纠正过来了。但是，袁世凯并不根据参议院的决议办事，他表面上不坚持迁都，却故意地提出去、就问题来要挟。于是孙中山先生又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为专使，于 2 月末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凯南下。袁世凯在破格欢迎的伪装下，暗地发动兵变，把蔡元培等人吓了一跳，使得这几个迎袁专使也觉得对袁的是否南下“尽可迁就”了。至此，南京参议院不得不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孙中山先生的计划完全失败了。

眼看着南京临时政府即将结束，不少的革命党人感到革命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内心非常痛苦。当时在南京的川籍党人很多，经大家商议，决定召开一个四川革命烈士追悼会，对先烈们表示崇敬和悼念，同时借此排遣自己的悲伤。开会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到了。章太炎则送来一幅挽联，写道：“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大家看了，不但很觉扫兴，而且感到愤慨。章太炎在同盟会里一贯闹派别纠纷；武昌起义后，又说什么“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解散同盟会；随后不久，他便正式宣布脱离同盟会，并和一些立宪党人搞在一起，

专门和孙中山先生作对。他骂南京鼠窃狗偷，但当时鼠窃狗偷的大半还是立宪党人，而章太炎不正是和他们沆瀣一气吗？他反对建都南京，认为南京并非龙蟠虎踞，难道北京果真就是龙蟠虎踞的地方吗？很明显，章太炎为了反对孙中山先生，已经实际上站到袁世凯那方面去了。追悼会开完以后，我们又为死难烈士请求追赠。根据我们的建议，孙中山先生以总统的名义立即签署了一道命令，追赠邹容、喻云纪、彭家珍为大将军，谢奉琦为中将。其他各省也有继起仿效的。死者已经安置完了，活着的人怎么办呢？我们秘书处的人，决计不到袁世凯那里去作官。邓家彦因对和议非常不满，一定要出去办个报纸，反对袁世凯。又有人提议继续出洋留学，完成以前未竟的学业，大家都很赞成。当时蔡元培在作教育部长，经过他的批准，大批革命党人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接着便纷纷放洋而去。其中有不少好心的人，以为民国既经成立，自己就应该学点真实的本事，将来好从事建国的工作。他们当时并不了解：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反动政府，但继起的袁世凯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工具。他们更没有料到：民国成立以后，中国不但没有兴盛起来；相反，民族的危机和人民的灾难却更加深重了。当时，我也获得官费留学的资格；但是，因为还有许多善后工作要做，所以没有立刻出洋。

二十二 回川之行

辛亥革命以孙中山先生的解职和袁世凯的登台而结束，实际上是失败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但

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对此并无认识，他们当中有不少的人对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还存在着幻想。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应袁世凯的邀请去到北京。袁故意隆重地接待他，并百般地曲意相从，终于使孙中山先生入其彀中。孙中山先生从袁那里出来就对人讲：“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因此，他便接受了全国铁路总监的任命，想在中国经营二十万里的铁路，实现他的实业救国的美梦。为了这个目的，他随后还到日本去了一趟。但是不久，他的梦想便被现实粉碎了。

南北和议成功之后，我也到了北京。一天，友人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了袁世凯要任命我作四川宣慰使的消息，赶快来告诉我。我感到很奇怪，估计是朱芾煌搞的鬼，便立刻去问他。他说：“总统正要找你，请你和我一同回四川去调解成渝双方的纠纷，并要给我们宣慰使的名义。”我说：“四川是我们的家乡，对于家乡的父老何能用这种名义？而且我在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的时候，即已和大家有约，此后绝不任什么官职。”在此以前，李石曾和蔡元培、汪精卫等专使人员在从北京回南京的轮船上曾有“六不会”的组织，以不作官、不作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相标榜，有人甚至加上不喝酒、不吃肉两条，称为“八不主义”。我虽然没有加入“六不会”，并且知道他们是唱高调骗人的；但我却认为一个人如果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总是问心有愧的，且将失信于人，为人所弃。就是由于这种种原因，我坚决地拒绝袁世凯给我任何的官职。袁不得已，后来才同意不给我任何名义，只要我同朱芾煌一起回川一行，去“慰问”四川人民，并促成四川的统一。我当时并不了解袁是因朱的资望不够，不足以替他完成统一四川的重任，因而想利用我为他服务。我只觉得促成四川统一，避免人民涂炭，为桑梓父老做点事情，是一种不可推辞的义

务，因此便答应了。袁给了朱一笔钱，朱问我怎么开销，我说：“我们每人一月六十元就够了，同行的人，还可酌量少一些。”朱同意了。说也奇怪，朱居然跟我一样，既没有争着作官，又没有争着要钱。我本来对朱的投靠袁氏，内心不取；现在见他这样，又觉得他之投袁，原是要去争取袁氏赞助共和的，似乎也可以原谅。其实，我那时对朱的本质还是没有认识清楚。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一个野心并不太大的道地的投机分子。他投到袁的门下，知道袁也不过是利用他与革命党拉拉关系而已，因此对袁也不存奢望，只趁机会讨了一个夔关监督来当，弄了一批钱，然后便由官而绅，到北京城里买了一大片空地，修了许多房子，做起房东来了。

1912年的夏天，我和朱芾煌回到了四川，这时，成渝双方已经妥协了。成渝的妥协也象南北的和议一样，是重庆投降了成都，革命势力投降了反动势力。其时杨维任军事巡警总监。杨是成都起义被捕的六君子之一，我觉得他似乎尚有可为，便推动朱芾煌用我们两人的名义电袁世凯建议，任命他为成都卫戍司令。袁当即下令委任，并升杨为中将。袁之出此一着，原不过想借以笼络革命党人。但此事却立即引起反动分子的不安。他们马上向袁的亲信四川人曾彝进、顾鳌等进行活动，要袁收回成命。袁虽然没有明白地收回成命，但因他不再支持，杨维终于无法就职。而且，袁见我的心事仍在革命，便急电我们回北京。这时，我正抽空回到了荣县家里。接到袁的急电后，我又匆匆地离开故乡，和朱芾煌一起赶回北京。

在四川的时候，我顺便地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以留法俭学会的名义动员了一批青年到法国去留学。留法俭学会是由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分子倡办的，这批无政府主义分子这时已堕落

为袁世凯的帮凶，是完全反动的；但留法俭学会却送了一些人到法国去学科学，对社会多少总算有点益处。当然，李石曾之流搞这个俭学会的目的，并不存什么好意，纯粹是为了盗取“教育家”的虚名。这个留法俭学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更发展成为留法勤工俭学会，送了更多的人到法国去留学。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宋教仁等已经组成了国民党，正在为实现他的政党政治的幻想而日夜地忙碌着。他以为国民党只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组织责任内阁，中华民国即可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得到“长治久安”，袁世凯的大总统就只剩下一个元首的空名了。他为了在选举中取得多数，不惜把大批的政客和封建余孽拉入党内。他为了使这些人能够接受，又不顾许多同盟会员的反对，把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尽行删除。“平均地权”被改为“注重于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被改为“维持国际和平”，这就是说，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完全被抛弃了。甚至连“男女平权”的主张也被取消，因此更遭到女同志们的反对。有个叫唐群英的女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刚打下南京的时候曾经作过女子北伐队的队长，这时即因反对宋教仁取消“男女平权”的纲领而要打他，以致闹了一场风波。

1912年底，国会选举开始，宋教仁到处演说，俨然象西方“民主国家”的竞选一样。后来选举“胜利”了，宋教仁更得意忘形，到处发表他的政见。正当宋教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时候，袁世凯已经为他挖好了陷阱。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他临死仍希望总统“开诚布公”，竟然还不明白就是这位总统要了他的性命。

宋教仁被刺后，革命党人的幻想破灭了，他们被迫于仓皇中起来和袁世凯斗争。

二十三 二次革命失败,继续追求真理

宋教仁的被刺,无论什么人都知道它的政治背景如何。袁世凯为掩盖天下耳目,故意装模作样地说要“穷究”和“严办”。很快真象就大白了。原来指使行凶的是国务院官员洪述祖,而指使洪的又是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谁都知道,赵是袁世凯手下的特务头子,因此毫无疑问,指使赵的就是袁世凯自己。袁世凯的阴谋被揭露出来了。于是他一不作、二不休,干脆不经参议院通过就违法向帝国主义大举借款,扩充军队,准备用武力来彻底消灭南方各省的革命力量。

1913年4月,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所组成的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镑的“善后”大借款。同时,他命令段芝贵、冯国璋率师南下,准备以段芝贵所率李纯等部进攻江西;以冯国璋、张勋两部进攻南京;此外,并以郑汝成、汤芑铭率领海军协助作战。他于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便在6月间借口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反对借款、抗拒中央,下令免掉这三个国民党人的都督职务。随后至7月间,他又发布“讨伐令”,向国民党人所率领的军队大举进攻。

孙中山先生于3月自日本回国的时候,恰好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事件发生了。他回到上海,非常气愤,决计兴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这时,我为了反袁,也到了上海。当善后借款成立,风传袁世凯要撤消国民党粤、赣、皖、湘四督之际,我即向孙中山先生建议,主张四督联合通电,反对袁世凯违法,并声明在合法政府成立以前,不接受违法政府的命令,以此先发制人。孙中山先生很同意我的意见,但黄兴不赞成。黄兴说这样一来,就

暴露了他反袁的军事准备。其实，这时国民党反袁，正如袁世凯反国民党一样，彼此都明白，还有什么秘密呢？结果袁世凯抢先宣布了免除国民党都督的职务，使我们的反袁在政治上陷于被动的地位。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接着，15日，黄兴在南京强迫苏督程德全宣布独立，响应江西讨袁。程德全是个首鼠两端的家伙，他于宣布独立后即托故离开南京，潜赴上海。我赶到南京去参加起事，见程不在，便责问黄兴。黄兴说他自己要走，谁也无法。我于是又赶去追程。而程到上海后即通电要黄兴取消独立，真是可恨极了！由于事前既不坚决，临事又不协调，这次所谓赣宁之役，很快就归于失败。接着，安徽、广东和四川的反袁斗争也失败了。但是，我对这些失败并不灰心，仍在上海继续奔走，企图挽救革命。当时我想如果能炸毁曾经归向革命后来又被郑汝成收买过去的肇和军舰，或者把它抢过来，上海就可能支持一个时期，革命也许能以上海为基点，重新发动起来。于是向孙中山先生建议，拿出二万元由我去布置这件事，虽然张静江反对，但孙中山先生同意了。我在法租界组织了一批人，准备好了炸弹、炸药和小船。一切就绪后，在一个晚上，我便带着这队人乘汽车出发，结果因过法租界时被阻，不得不返回，最后一次希望又落空了。至此，孙中山先生的二次革命于瞬息之间即告烟消云散。二次革命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失败，根本的原因在于自辛亥革命以后，国民党就已经放弃了革命纲领，逐渐地脱离了群众，因此，它发动的反袁斗争，再不象同盟会时代那样能够激起群众的热情了。

四川的反袁斗争发动得比赣宁为晚，但失败得一样的快。8月初，熊克武、杨庶堪于重庆举兵讨袁；接着，张百祥在绵阳响

应；王天杰在荣县响应；其他川东、川北、川西也有响应的；但不出9月，全部失败了。这次反袁失败，四川的国民党人牺牲很大。王天杰于四川永川被俘牺牲；张百祥逃至上海后被捕，解到北京被杀。

袁世凯认为四川的反袁斗争是我策动的，因而对我下令通缉。我在国内待不住了，只好再度出国。好在公费留学的资格早已取得，北京教育部又有朋友为我办理一切手续，因此我便于1913年末起程赴法国留学去了。

在此之前，大约是6月间的光景，我的一位朋友任鸿年在杭州烟霞洞投井自杀。他是同盟会员，曾在蜀军中任书记，后因意见不合离去；这时看见袁世凯祸国殃民，与清朝政府无异，觉得过去的革命落空了，因而愤不欲生。接着，袁世凯对我下令通缉，那时我的二哥已经双目失明，而又贫病交加，他在成都一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国家和家庭的前途都无希望了，竟悬梁自缢而死！辛亥革命给长期黑暗无际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当时人们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呵！但是，转瞬之间，袁世凯窃去国柄，把中国重新投入黑暗的深渊，人们的痛苦和失望，真是达于极点，因此有的便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但是，我却是一向反对自杀的，我认为自杀最不值得，既然敢于牺牲，何不去和敌人斗争呢？而且，我对于祖国的前途总是抱着无限的希望。我相信我们伟大的祖国既有着几千年悠久而光荣的历史，又有着数万万勤劳而勇敢的同胞，她一定会冲破重重的黑暗而走上光辉灿烂的前程。但是，对于国家的危难、同志的牺牲和兄友的自杀，我毕竟也不能无动于怀。当我踏上出国的征途以后，有时一个人站在轮船的甲板上，看着无边无际的海洋，波涛汹涌，我胸中的热血，也不禁翻腾起来。啊！亲爱的祖国，你何时才能从沉重的枷锁中解

放出来呀！

说也凑巧，我这次出国，偏偏坐的是日本轮船，又在船上碰上过 1914 年的元旦，而且这轮船上挂的万国旗中依然没有中国的国旗！我气愤极了，立刻鼓动全船的中国同胞起来向船长斗争。但是，除了让船长道歉之外，又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记得十年之前，也是在庆祝元旦的时候，我们在成城学校，为了争挂国旗曾经闹过一场斗争。谁知十年之后，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仍然毫无地位呢？我们十年来辛勤地从事革命工作，结果竟然如此！难道我们的道路错了吗？还是没有正确的方法呢？我必须研究明白。我迫切地追求着新的救国救民的真理。

真正能够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后来果然找到了，那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劳动人民自求解放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7 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人民开辟了光明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下，1919 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1921 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国革命即在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我自己也跟着毛泽东同志走到胜利，分享了胜利的喜悦。

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

一 流亡法国，接触社会主义思潮

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止，这是一段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当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革命党的组织陷于土崩瓦解，中国天空上满布着黑暗的阴云。在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

1913年7月，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南京、上海、江西、安徽、广东、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反袁起义。但这次起义（所谓二次革命），在袁世凯的强大军事压力下，好象昙花一现就失败了。国民党仅存在南方几省内的一点革命军事力量也被摧折殆尽。

起义失败后，我还留在上海。我并不认为革命从此就完了，我相信袁世凯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所以想隐蔽在上海，继续为革命做一点工作。但是袁世凯并没有放过我，指名说我是四川

重庆熊克武反袁起义的策动人，对我下了通缉令。我在上海站不住脚。于1913年11月亡命法国。

我在法国巴黎居住了两年多，思想上非常苦闷。“中华民国”成立了只有一年多，中国的政治局面就弄得那样糟糕，革命爱国之士或死或逃，我也被军阀撵到了外国，革命失败得真是再惨痛不过了。我时时刻刻惦念着中国的情形，希望革命火焰会再一次迅速地燃烧起来，把丑恶的军阀统治烧个干干净净。1914年春季我没有入学，痴心指望着很快地能再有一个回国参加斗争的时机。但是过了半年，国内没有一点革命发动的迹象，而且袁世凯还修改了民元约法，解散了国民党以及国会，担任了终身大总统，许多北洋派爪牙也纷纷爬上了各省都督的位置，看起来袁世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我的归国希望暂时也不能实现，于是决心先埋头读书。辛亥革命以前，1903年我初到日本时，决心要学一门科学，选的是电气工程。1911年我弃学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我原来学的是工程技术，但由于国事日非，只得经常从事革命活动，深深感到“所学非所用”，于是这次进了巴黎法科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学。

亡命巴黎的两年多，看到了不少事情，接触了不少人物，长了不少见识。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交战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彼此疯狂地屠杀，整个欧洲沉浸在血泊中，好象一个大屠宰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已暴露无遗。同时，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盛行一时。1903年我在日本东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地学习，一面着重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对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这时，又重新看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

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这个远景虽然是美丽的，但是如何能够实现它？我们当前应该做些什么？我仍旧是茫然的。我曾经和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谈起这些问题，李石曾认为：“我们只要搞教育，宣传互助、合作，传播这种美丽的理想，努力去感化别人就好了。至于总统、皇帝及其他官职和议员，让人家去当没有关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说：“教育、宣传工作固然要做，但是组织工作也要做，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团结和培养人才，是干不了革命的，你不去侵犯皇帝、总统，人家就要侵犯你。”李石曾的思想是典型的克鲁巴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我从以往的革命实践中感到这种不要组织革命团体的主张根本是行不通的。仅仅有一个美丽的理想，而没有一套实现理想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那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在法国虽然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流派，但是它们并没有给我指明一条拯救中国的光明大道。

二 军阀腐朽统治的一个实例

1914年以后，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趁着欧洲大战的机会出兵山东，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而接受了这些条件，秘密地签了字。1915年底袁世凯玩弄公民投票，强奸民意，公然称帝，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他逐步地往上爬的时候，反对他的各种社会力量也在逐步地集合起来。1915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军首先起义，各地纷纷响应，袁世凯的皇

冠不久就滚落在尘埃里。1916年6月6日，这个窃国大盗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活活地气死了。

袁世凯统治垮台，对我的通缉令自然失效。随后，南北和议达成，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我就和蔡元培一起从法国回国，1917年2月我到达北京。我到北京有一个任务，因为欧洲大战开始以后，法国人力不足，需要大招华工，袁世凯政府和法国订立了一个关于招募华工的条约，内容对中国工人非常不利，经手人梁士诒从中捞了很多钱，根本不顾工人的利益。这时候我们已在法国组织了华法教育会，主持人有蔡元培和我，目的是要在法国的大批华工中进行教育，并希望国内贫苦学生能出来留学，还组织了勤工俭学会。由于袁世凯政府与法国所订的条约对工人很不利，我们出来力争，费了很大周折，与法国改订条约。规定中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同工同酬，总算为工人们争回了一些权利。我就携带这个条约草案回国，要求北京政府批准。

回到北京一看，中国的政治局势还象从前一样。袁世凯虽然死了，但是北洋军阀继承了袁氏的衣钵，并分化成大大小小的派系，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政府中贪污腐败风气，依然如故。华工新约送到外交部，足足等了四个月还没有批准的信息。

有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来访问我，他问我：“听说你带回一个招募华工赴法的条约，批准了没有？”我说：“还没有批准。”接着我详细地给他解释了这个条约比前一个条约要好的多。他说：“你没有在北京住过吗？你是学生吗？真是迂夫子！这里的事，非钱不行。如果有钱，再坏的条约也能批准。如果没有钱，再好的条约也批不准。你这种事至少可以赚几百万，你就是拿一二百万出来也不算什么？”我说：“我们就是为了反对赚工人的

血汗钱，才辛辛苦苦争回了一些权利。我们没有钱，不但不愿拿钱去运动，就是人家拿钱来运动我也不行！”说着说着两个人就大吵起来。他临走时说：“你执拗得很，让你看看吧！”事后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一位科长派来的。在军阀官僚统治下，什么好事也办不成，不铲除军阀统治和官僚制度，中国决无得救的希望，这是对我的一次严重教训，我立志要和恶势力斗一斗。当时我没有任何其他办法，还幻想通过个人关系去说服外交部长伍廷芳。我想：伍廷芳是一个同盟会员，总不会和贪污官僚一样。他身为外交部长，是会有批准条约的权力的。哪里知道：官僚机构，重重叠叠，相互牵制，伍廷芳虽然答应批准条约，可是外交部内上上下下的官僚们都想捞一点油水，仍旧拖延不动，事情就这样拖下去，没有得到结果。

我这时一面在交涉条约的事情，一面又进行第二个任务，就是办留法勤工俭学，设立了一个留法预备学校，同时又给四川同事去信请他们成立留法勤工俭学分会。1918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传到了湖南。于是四川、湖南等地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我们希望在这个动乱的环境中能够培养出一些人才。但是目睹国内的混乱和腐败，眼前一片黑暗，仍不知出路何在？

不久又证明，在军阀统治下，连教育工作也不会让你安定地做下去。这时北洋军阀正在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总统黎元洪和国会议员站在一边，背后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多数省份的督军站在另一边，背后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之间围绕着对德宣战问题，勾心斗角。段祺瑞唆使督军团包围国会，胁迫黎元洪一定要通过对德参战案，以便借此机会，大借外债，扩充实力；黎元洪为了对抗段祺瑞，勾引顽固派张勋进京。其实张勋和段祺瑞暗中也有勾搭。1917年6月张勋

进了北京，演了一出“宣统复辟”的丑剧。当时，北京城内，兵荒马乱，到处抢掠捉人，凡是与辛亥革命稍有点关系的人都纷纷避难出京，我也只得暂时放下教育工作，避往天津。随后段祺瑞又玩弄手段，以“恢复共和”为名，赶走张勋，独揽政权。辛亥革命所遗留下来的“民元约法”被军阀完全撕毁了。南方为了“护法”，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成立了军政府，于是出现了南北两个政府对立的局面。

三 “南与北一丘之貉”

1917年7月，伍廷芳和海军部长程璧光率领海军南下，孙中山先生也到了广州，主张“护法”，在广州组织军政府，非常国会选孙中山为大元帅，联合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对抗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1917年年底熊克武驱逐了刘存厚，统一了四川，要我代表四川省参加军政府。我于1918年2月到广州见了中山先生，随即又回北京把所负华法教育会的工作进行了交代，6月才去广州任职。原来军政府初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桂系和滇系军阀的力量，我们当时以为滇桂军阀与北洋军阀有矛盾，可以利用他们来为革命服务，而且他们实力较小，不象北洋军阀那样跋扈难制，有可能团结他们，使他们服从中山先生的领导。不久就证明：这种想法是十分错误的。军政府成立后，野心勃勃的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暗中一直在和北洋军阀勾结，并且跟我们大闹幕后磨擦。军政府成立不到一年，中山先生终于被排挤，1918年5月由广州回到上海。他在辞职通电中痛斥桂系军阀说：“南与北一丘之貉。”中山先生这时真是伤心愤恨到极点了。

当1918年6月我再到广州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已经到上海去了。7月间军政府改为七总裁制，中山先生也被列为七总裁之一，我当时曾到上海劝中山先生就职，他未同意，我又劝他可派代表去应付，他答应了。我们当时仍想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抵制桂系，以图补救大局于万一。我们所能团结的力量有南下的国会议员和海军，有各省军的代表，有中山先生的嫡系部队——陈炯明所统率的粤军，还有广东的一些地方派人物。桂系特别把陈炯明部视作眼中钉，千方百计想消灭它，陈炯明部被迫退驻在福建的漳州，不能回粤，情形很危险。这时军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们揭露桂系和北洋军阀勾结的事实，反对桂系排挤粤军，极力保全陈炯明部。在会议上，我常常和站在桂系方面的政学系政客争吵起来。桂系军阀恨我入骨，要求四川省撤换我的代表职务，到了1919年他们策划达成南北和议时，我就不再当代表了。

参加“护法”，使我十分深刻地体会到中山先生所说的“南与北一丘之貉”的名言。而且就是我们当时苦心孤诣所要保全的陈炯明又何尝不是与南北军阀同属“一丘之貉”呢？不久以后，陈炯明利用国民党和中山先生的威信，驱逐桂系，重返广州，并且随后又背叛了中山先生。这个叛徒要知道当时中山先生如何苦心扶植他，我们又如何极力保护他，他真应该惭愧而死。在当时，军队是统治者私人的财产和工具，军队的活动完全听命于他们的统帅，不知道有国家民族，我们也没有可能去根本改造旧军队，使它成为革命的工具，而只是看到个人的作用，力图争取有实力的统帅。从辛亥革命起，我们为了推翻清朝而迁就袁世凯，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军阀而利用西南军阀，再后来为了抵制西南军阀而培植陈炯明，最后陈炯明又叛变了。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

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但是我们应该依靠什么力量呢？究竟怎样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呢？这是藏在我们心中的迫切问题，这些问题时刻搅扰着我，使我十分烦闷和苦恼。

四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十月革命刚发生的时候，由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封锁消息，我们还不知道俄国已发生了一个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革命。但是消息是不可能长期被封锁住的，后来我就读到了约翰·里德写的《震动寰球的十日》，这本书对十月革命的过程描写得很生动。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我们北方邻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个工农政府，伟大的俄国人民已经摆脱了剥削制度，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从前我在法国接触了社会主义各种思想流派，深深为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今天这个理想居然在一个大国内开始实现了，心中感到无限兴奋和鼓舞。1919年，我资助几个学生到苏联去学习，希望他们能为中国带来新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方法。但是后来联系中断了。1920年，我一度去北京，碰到了王维舟同志。他本来在四川军队中工作，由于川军内部要打仗，他不愿意参与，便交出了所率领的军队，到苏联去工作和学习了一年。1920年8月间，他回到北京，对我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苏联的状况，使我对这个新起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厚的感情。当时苏联正处在国内革命战争的困难时期，物资非常缺乏。王维舟同志和我就在北京东安市场召集许多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俄灾救援会”，向各方募捐，捐募到几万元钱，买了许多面粉和日用品寄往莫斯科。后

来王维舟同志又到上海募了几万元。那时候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非常同情，人人都希望能出一分力量来支持苏俄，所以我们的募捐能够有这样大的成绩。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发生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前夕，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的时候，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和会。大家希望通过巴黎和会，收回日本在山东所占夺的权利。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发表了花言巧语的“十四条”，其中也有主张民族自决的词句，伪装同情殖民地人民的悲惨遭遇。当时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大多抱着幻想。可是和会上帝国主义的弱肉强食、毫无公理和阴谋欺诈等等，再一次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日本帝国主义蛮横地坚持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以及和我国卖国贼订定的一切条件，伪善的美帝国主义不仅帮着日本说话，反怪中国何以在山东问题上有“欣然同意”的签字，以逃避他的责任。结果，和会决议：德国在山东权利一概让与日本。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却得到“战败国”的待遇。

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传来，全国激愤。1919年5月4日，北京首先发生了爱国示威运动，惩罚了卖国贼，各地纷起响应。雄伟的工人和学生的队伍走上了街头，全国范围内激扬起反帝反封建的巨大浪潮，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激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一切反动腐朽的恶势力，都显得那样猥琐渺小，摇摇欲坠。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

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特别是一向被人轻视的工人群众也发出了怒吼，象上海那样的大都市，自6月5日开始，一声罢工、罢市令下，整个城市的繁华绮丽顿时变成一片死寂，逼得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免去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工人阶级的奋起，这是一支真正能制一切反动派于死命的伟大生力军。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革命的性质完全不同了。

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五 新道路的起脚点

1919年，我被西南军阀排挤，退出军政府，10月底回到四川。就在这一年，我读到了一本日文叫《过激派》（日本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意的称呼）的书。

一个人读一本新书，通常总是根据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和生活经验来吸收新书中的内容，作出判断和选择。所以同样一本书对于不同环境中不同的个人，往往会发生不同的影响。当时中国革命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革命实践的发展使我日益明确地感觉到旧民主主义道路走不通。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

发生给我启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径。我渴望了解苏俄革命的经验,《过激派》这本书,恰恰满足了我的需要。我反复地阅读它,结合着自己过去的经历,认真地思索,把以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作了一次详细的批判和总结。我体会最深刻的有以下四点:

第一、工人和农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哺育了整个社会。但是他们自己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世代代过着贫困的生活。而地主、资本家,游手好闲,不事劳动,却过着奢侈的生活。如何能使这些人绝迹?布尔什维克主张“不做工,不得食”。我非常拥护这个主张。的确,对于这些社会上的寄生虫,一定要强迫他们去劳动,让他们“自食其力”,社会才能够安定和繁荣。

第二、布尔什维克认为: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得到解放。这个道理在从前我是不可能理解得深刻的。从前虽然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寄予极大的同情,搞革命就是为了要解救民众的苦难,但是总以为革命只能依靠少数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没有看到广大人民中所蕴藏的伟大革命潜力。经过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发挥了冲击旧制度的伟大力量。在国际和国内的新形势下,读了这本书,深深感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辛亥革命只在知识分子和军人中进行活动,恰恰是没有把下层民众动员、组织起来。所以革命显得软弱无力,反动派一旦反攻,就陷于土崩瓦解。今后一定要改变办法,革命新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下层民众。

第三、我从前读无政府主义的著作,觉得他们不要组织的做

法是不可能成功的。1915年听到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党员要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不能自由行动，组织手续很严格，入党时还要按手指印。我觉得他的办法比无政府主义强的多，但是党员入党时要打手指印的做法又太落后，有点旧式会党的气味。究竟怎样才好呢？我始终抱着疑问。布尔什维克主张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一个坚强的、有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共产党，作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核心力量。这个主张使我多年以来所未能解决的疑团，涣然冰释。

第四、辛亥革命时，我们对掌握政权和改造国家机器太不注意了，当时为了迁就袁世凯而让出了政权。有些人（如宋教仁）还幻想用议会斗争的方式来控制住旧的国家机器，结果反动派就能够利用现成的政权和旧国家机器向我们进攻。布尔什维克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才能够巩固革命的胜利。这正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象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相传下来的以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旧国家机器，是许多罪恶的根源，其势力根深蒂固，即使经历许多次的革命风暴，但在官僚国家的荫底下，万恶的旧势力仍会死灰复燃。以往我也常想这个问题，模模糊糊地想不出一个道理。布尔什维克关于政权和国家的理论，解决了我的问题。

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有了点新的体会。这些体会当然是很笼统肤浅的，但却形成了我的新道路的起脚点。说起来真是可怜，我那时渴望能够看到一本马克思或者列宁的著作，但是我东奔西跑，忙于应付事变，完整的马列主义的书又不易得到。所以只好从一些报刊杂志上零星地看一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那时候，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知识还是不多的，阶级观点也不明确，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各阶级。我当时只是认为：重要的是要把这些知识贯彻到行动中去，身体力行，为革命做一点贡献。

六 利用“自治”讲台做宣传工作

1920年南方各省掀起的“自治运动”的潮流，给我提供了初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自治运动”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的政治局势是十分混乱的，在全国范围内，是北洋政府和广州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在北洋政府内部有皖系、直系、奉系的对立；在广州政府内部有革命派和滇系、桂系军阀的对立；甚至一省之内也有许多小军阀割据称雄。当时北洋派大军阀以“武力统一”为名，攻打南方各省，发生连年混战的局面，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民生活极为痛苦，特别是湖南省受战祸最惨。段祺瑞的爪牙张敬尧作了督军，横行霸道，连小学都封了。因此，湖南群众起来组织了驱张运动，赶走了这个蠹贼，出现了要求“自治”的潮流。所谓“自治”，就是由本省人制定省宪，选举省长，管理本省事务。这种主张当然不是挽救中国危亡的根本办法，因为当时人民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本省人治理本省，其结果仍不外是本省的上层分子压迫本省的下层人民，但在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叫嚣声中，它却不失为是抵制北洋军阀的一个有效武器。由于当时人民群众对北洋军阀最为痛恨，因此这个反对北洋大军阀的“自治”口号，受到人民群众一定程度的支持。当时各省参加运动的人很复杂，有马克思主义者，有急进的民主主义者，有资产阶级，但也有为保全并扩充自己地盘的地方军阀和政客。

我回到四川以后不久，“自治”潮流就卷进了四川。当时四川情形也十分混乱，1920年2月，属于国民党的四川省长杨庶堪及谢持等为了争夺权力，联合了滇军、黔军，攻打同属于国民党的督军熊克武，熊败退至保宁。下半年熊克武又联合旧川军刘湘、杨森等部进行反攻，驱逐杨庶堪等。胜利后熊发表了解除四川督军职务的通电，经协商后分为三军，以但懋辛、刘湘、刘成勋为一、二、三军军长，协同维持川局，使局面暂时安定下来。但刘湘及其所属的杨森又各抱野心，随时企图夺得全省政权，结果弄得四川全省四分五裂，动荡不安。北洋军阀的军队这时驻扎在陕南、鄂西，注视着四川的形势，随时准备大举入川。在这种具体形势下，“自治”就变成了人民要求自己作主来统一全省以反对北军入川的政治运动。

我对于四川“自治”的态度是：不同意把“自治”当作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是在当时具体形势下，应该抱赞助态度，并积极参加这个运动。因为：

第一、“自治”可以抵制北洋军阀，也有利于制止本省的混战，创造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第二、“自治运动”提供了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的机会，不应该拒绝这个机会，应该利用它把群众的觉悟引向更高的水平。第三、假使革命派不参加这个运动，那末，地方军阀就会去控制这个运动，使运动成为他们达到私利的工具。因此在运动中对于地方军阀一定要进行揭露和斗争。

1920年底，我们开始了组织活动，1921年4月1日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一百多个县每县都有一、二个代表来参加，我们通过这个组织系统，了解了四川各县的许多情况。我也借着这样一个公开的讲台，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常写文章，做讲演。“全川自治联合会”的宣言和十二条纲领就是由我起草的。

其中以“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为总目标，强调民主政治以反对军阀专制；提出“不作工、不得食”以反对社会寄生虫；提出“民众武装”以反对军阀武装；提出“合作互助”以改善工农生活。十二条纲领是：“全民政治”、“男女平权”、“编练民军”、“保障人权”、“普及教育”、“公平负担”、“发展实业”、“组织协社（即合作社）”、“强迫劳动”、“制定保工法律”、“设立劳动机关”、“组织职业团体”等，每一条纲领都详加解释，许多观点开始摆脱了旧的束缚，初步反映了马克思、列宁的一些主张。这个宣言和纲领曾经登载在当时创刊的“新蜀报”上，各县进步青年看了，十分欢迎。我从前许多老朋友看了，也感到我的见解变得更新奇了。

我通过这个自治机构，初步传播了一些进步思想。大会开幕时，全省人心振奋，可容千余人的重庆商会大礼堂，座无虚席，门窗外还有许多人伫立而听，许多人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盛会。可是开会不过十多天，刘湘、杨森就企图收买自治联合会，以作为他们的御用民意机关，自治联合会中的成员本来就很复杂，有些卑鄙的人已经被他们收买。我觉察到这种情况后，就把大家发言拥护自治、起草省宪的意见作成决议通过，并宣布“我们联合会的宗旨是促成省宪，不能代替民选的省议会，我们大家已决议实行自治，起草省宪，任务已经完成，至于起草省宪的权力应该交给省议会”。这个意见得到多数人的赞同，于是就把起草省宪之权移交给省议会，而把自治联合会解散了。我当时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省议会还在国民党多数的控制下，还不至被反动军阀随意操纵。军阀刘湘、杨森费了很多心机，用了许多钱收买代表，结果是人财两空。他们因此恨我入骨，下令通缉我。

四川“自治运动”本身，并无成效可言，但这个运动却使我有

了一个面对广大人民讲话的机会，使我把新近体会到的一些想法得以倾吐于广大人民之前，而且得到了热烈的反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收获。而且通过“自治”的失败，使我又有了两个教训：第一是进一步体会到在军阀统治下毫无民主可言，要拯救中国，必须首先用武装的革命来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第二是自治联合会那种地域性的临时的组织极容易为敌人破坏，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组织的组织来领导革命。这时候我心里非常强烈地要求组织象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政党。其实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上海秘密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我远在被封锁的四川，并不知道。

全川自治联合会解散后，我就到成都把制订省宪的任务交给省议会，然后到南充、绥定等地讲演，1922年初我又到了成都。

七 整顿成都高师，组织工人农民

1922年夏，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闹风潮，校长去职，学生和当局请我担任高师校长，我义不容辞地担任了这个职务。我在校内进一步展开了宣传和组织活动。

我费了很大力量来办这个学校。从前学校中纪律非常松弛，课程内容也陈腐不堪。我到校以后，采取革新的措施，聘请了许多具有新思想的人来担任教师，并加强学校纪律，扭转了散漫的风气和革除了落后的封建陋习，对教师和学生的学习、生活尽力关心照顾。经过一番整顿，学校面貌大大改观，师生员工团结得很紧密，树立了一种崭新的学风。同学们有秩序，有朝气，追求知识，孜孜不倦，议论政治，意气焕发，成都高师成了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五四”以来，四川省的新文化运动很快地就开展起来。除了成都高师学生创办的《星期日》等刊物进行鼓吹新文化、新思潮以外，许多外地的新书报也纷纷传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等都曾到四川进行宣传活动，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随着形势的推移而逐步深入。

我利用同盟会老会员的身份，尽可能地推进新思潮的扩展，除了在校内工作外，并利用个人与四川上层社会的历史关系，为革命同志作掩护。如1922年，恽代英同志在泸州被川军赖心辉部所扣押，我知道后就打电报去泸州，保释代英同志，并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将近一年。恽代英同志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他在成都高师期间，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在这时，我们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和农民中去做宣传和组织工作。成都市有一个兵工厂，工人很集中，此外市内还有许多分散的丝织工人，我们派学生去分片联系，组织工会，发动罢工。另外在成都近郊和某些乡村的农民中，也有学生去进行活动，组织农会。当时成都经常发生罢工事件，我的一个老朋友跟我开玩笑地说：“只要把吴玉章捉来杀了，罢工就不会发生了。”的确，当时四川的一些军阀对我很头痛，但是因为我和同盟会、国民党的历史关系，更因为当时群众伟大力量的支持，反动派也奈何我不得。

当宣传和组织工作开展到工人、农民中去以后，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也就愈来愈迫切。这时成都高师内已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我当时年已四十四岁，当然不能参加，于是与杨闇公同志等二十多人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机构，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由于四川地

处僻远，一直到这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也不知道国共合作的新时期即将开始了。

八 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3年，刘湘、杨森勾结吴佩孚进攻四川。1924年1月杨森攻占成都，派人接收成都高师，我就交卸离校。“五一”劳动节快到时，我们一些人怀着兴奋的心情筹备一次盛大的纪念会，许多青年人通过工会组织在工人中做了许多宣传鼓动工作，纪念大会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突然，4月29日，有人告诉驻在成都的军阀杨森，说“五一”纪念会是吴玉章的“阴谋”，要组织工人、农民和学生推翻杨森，夺取政权。第二天，成都市内实行戒严，空气非常紧张，杨森的军队纷纷从各地调回成都，我们预定的会址“少城公园”也被军队看守起来了，并且扬言要捉拿吴玉章。

在这紧张的时刻，成都工人阶级表现了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精神，他们不顾反动军队的武装威胁，仍在公园内召开了纪念大会。我当日本欲参加大会，由于同志们力阻，未能亲身参加；近郊农民也被反动军队阻止，未能入城会师。

“五一”事件以后，我在成都立不住脚了，随即离成都和刘伯承同志一起离开四川，取道贵州、湖南、到上海。到上海一看，全国工人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国共合作已经开始，广州革命政府日益巩固，革命局面蒸蒸日上，真是感到无比的兴奋鼓舞。当时孙中山先生为召开国民会议的事已赴北京。我也于1925年2月赶到北京去。本拟见中山先生，他因病重不能接见，不久他就逝世了。

我到北京后，见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负责人之一赵世炎

同志,才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活动情况,我就在这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写信去四川,要杨闇公同志等把“中国青年共产党”取消,个别地参加中国共产党。

我入党的那年已经四十六岁,我的前半生一直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行进。从我少年时代听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我们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想寻找一条出路。许多我所敬仰的、熟悉的同志为此而献出了生命,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以前,还没有找到一条光明出路。感谢十月革命,它的万丈光芒照亮了殖民地人民的前途,我们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武器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立即发挥出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才能够通过自己的具体历程完成个人思想上的革命转变,参加了共产党,从一个民主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这四十年国际国内的历史,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和生气勃勃。让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旗帜吧!它已经引导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它正在引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并将引导我们走向建设共产主义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1959年5月)

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

1925年初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全国工人运动正开始走向新的高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虽然以血腥的屠杀镇压了1923年的“二七”罢工，但是英勇的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被吓倒，在党的领导下，工人群众把悲愤变成了冲击反动势力的更大的力量。从1924年下半年起，全国各地的工人运动彼伏此起，一场伟大的战斗在酝酿中。

1925年5月初，我奉党的命令从北京到了上海。那时上海的形势，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进步的报刊上登载着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和福州军阀枪杀学生的消息，登载着许多庆祝“五一”，纪念“五四”、“五七”等等文章，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也在酝酿罢工，我们的同志为了迎接一场新的战斗，正在紧张地工作着。

我找到了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秘书长王若飞同志，给他们带去了北京党委负责人赵世炎同志的一封介绍信。由于我与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有着深厚的历史关系，党中央决定我留在国民党内，便于做统一战线的工作。随后的二十多天内，我一直在

上海和许多同志研究情况，商讨工作步骤。

当时国共合作已有一年多，国民党虽然经过了改组和整顿，但是组织涣散的状况仍然是很严重的。国民党在广东已经初步建立起一片根据地，但这片根据地陷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四面包围之中。在全国范围内，大军阀张作霖、孙传芳、吴佩孚等都企图进攻广东根据地；就是西南地区，如负隅东江的陈炯明、割据云南的唐继尧、统治湖南的赵恒惕等军阀，也都环伺着广州，虎视眈眈，待时而动；还有广东根据地内部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也在酝酿叛变。根据地的情况正是内外交逼，险象环生。同时国民党的中枢领导机构内，右派力量还不小。以邹鲁、谢持、林森等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正在形成。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场政治决斗看来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这种形势下，怎样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呢？怎样巩固和整顿国民党组织以发展左派的力量呢？这是当时萦绕在我头脑中的大问题。我一直认为：整顿和巩固国民党应该从基层做起。基层是联系群众、进行革命活动的最直接最基本的单位，一个革命团体若没有健全的基层组织，就不可能有雄厚的实力和广泛的影响，也不可能有强有力的中枢领导。所以我很愿意去做基层工作，并希望党中央派我回四川去，把四川的国民党组织整顿好。我经常和王若飞、恽代英、李立三等同志进行研究。他们很赞成我的意见，并告诉我说：“上海工人运动的高潮不久就会到来，全国性的高潮也会随之而来，应该抓紧时机，扩大革命的影响，吸收进步的工人和其他革命群众参加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壮大左派的势力，一定要使统一战线工作紧紧地跟上工人运动的发展，用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来健全国民党的组织。”他们这些意见，与我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合。党中央决定派我先去广州，与国民党中央取得联

系，然后再回四川。这时我已经没有以前那种单枪匹马地搞革命的感觉了，在我的背后，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和工人运动的支持。当我看到上海的许多同志在工人群众中忘我地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的時候，我对于自己的工作抱着更大的勇气和信心。

二

任务确定以后，我很快地收拾好了行装，准备立即启程。1925年5月30日下午，我到南京路上一家布店买衣料，准备去缝一件换季的衣服。那天天气晴朗，南京路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点也没有异样的迹象。前十多天已发生了日本内外棉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的事件，上海的工人和学生组织了宣传队，分赴租界，进行宣传。我们都预料到工人运动的高潮即将形成，但却没有想到暴风雨来得这样迅猛猛烈，而且就发生在这一条世界闻名的繁华绮丽的南京路上。

我正在挑拣布料的时候，突然门外一片吵嚷的声音，布店里也起了一阵骚动。许多人都跑到门口去观看，我也跟着走出去。只见从黄浦江边拥来黑压压的一片人群。外国巡捕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走在前面的几个巡捕象凶神一样挥舞着棍棒；后面几个巡捕捉着两个学生连拖带搯地走向前去，学生嘴里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再后面跟着许多徒手的学生；路上很多行人，也陆陆续续地参加进学生队伍里去。南京路上交通为之阻塞。我看了这种情景，心里感到又愤怒，又兴奋：愤怒的是帝国主义分子竟敢穷凶极恶、无理逮捕徒手的学生；兴奋的是中国人民终于觉醒了，觉醒了的人民群众，一定能够战胜黑暗势力，一

定能够把万恶的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我挤在人群里看了一会儿，队伍逐渐走远了。我返身回到布店里，匆匆忙忙地买了衣料，心里惦念着被捕去的学生，想去打听打听消息。我的脚步刚跨出店门，突然一排响亮的枪声从不远的地方传来，几秒钟后又是一排枪声。接着街头上一片骚乱，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激动得不能抑制自己，我的心几乎要随着加快的脚步而跳出胸膛来。我一直往西走，想到现场看个究竟。但是，队伍象潮水一样退下来了，不能前进。只听得人们惊呼：“巡捕开枪啦！”人们沉浸在严肃、悲愤的气氛中，却并没有慌乱的迹象。我目送着这些站在斗争最前列的人们，向他们默默致敬。我的心中交织着忿怒和悲痛，很久不能平静下来。一直到傍晚，我才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寓所。

“五卅”惨案的发生，立即引起了上海和全国工人、学生以及各界人士的反响。上海和各地相继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我也因此推迟了行期，暂时留在上海，做一些宣传工作。当时准备出一个刊物，定名“反日战线”，却遭到了戴季陶的反对。戴季陶是当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主任，他搞了一套所谓“孙文主义”的谬论，拿着刚刚逝世的孙中山先生作为招牌，到处招摇撞骗。在讨论出版刊物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就说：“‘反日战线’这个名字不好，这次惨案要英国负责，跟日本没有关系，日本和我国是东方友邦，应该争取团结它，现在应该联络日本，单独对英。”我听了非常气愤，立即反驳他：“逮捕青岛纱厂工人，是不是日本人干的？残杀福州学生的主谋者，是不是日本人？顾正红是不是死在日本资本家手里？日本帝国主义从来就是我们的凶恶敌人，假使连‘反日战线’的名称都不敢提，那么罢工、

罢课、罢市都用不着搞了，我们只有坐待当牛马做奴隶了！”接着很多同志都起来反对戴季陶的主张，戴坐在那里，被驳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后来他仍旧到处宣扬“单独对英”的谬论，但除了在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中间有些影响外，他的主张在群众中是完全孤立的。

三

我在上海一直住到6月下旬才去广州。途中经过香港。这时香港的工人已经开始罢工，许多工人挤在轮船上，要回广州去。码头上的货物堆积如山，无人搬运。6月24日，我到达广州。这天正是广州发生沙基惨案后的一天，群众都走上了街头，抬着血衣，高喊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五卅”的影响是这样的深刻和广泛，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我到了广州，找到廖仲恺先生，跟他谈了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的计划，他非常赞成。这时广州刚刚镇压了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正在酝酿把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廖仲恺先生要我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再去四川，并且带我去参观了黄埔军校和其他地方，向我介绍了广州的许多情况。黄埔军校是在我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这时廖仲恺任该校的国民党代表，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还有我们许多同志如恽代英、肖楚女等都在那里担任教官或其他工作。所以我们去参观时，看到的是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担任主席，廖仲恺担任财政部长，胡汉民担任外交部长，许崇智担任军事部长，至于蒋介石还只是以黄埔军校校长兼任军事参谋长的职务。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但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右派还有着很大的势力。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继续发展工农运动,发展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这时整顿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工作已刻不容缓,我想回四川的心情更加迫切了。7月初,我离开广州赴上海,准备取道长江水路入川。临走时廖仲恺先生代表国民党中央给我一千元钱作为活动的经费。

这时,四川的国民党组织,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内部派系很多。特别是谢持、石青阳等在党内组织的所谓“实业团”,借兴办实业为名,大种鸦片烟和做投机生意,在政治上又搞派别斗争,进行内战,影响极为恶劣。谢持和石青阳都是西山会议派的要人,他们当时虽然没有在四川,但四川国民党重庆党部是归他们掌握的。他们这帮人只顾借党营私,拒绝进步力量的集聚,以致党部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1925年8月15日,我到了重庆,先找重庆国民党负责人黄复生、朱之洪商量,提出整顿国民党的计划。黄朱二人听了都摇头,说:“现在人家听到政治和党派就头痛,已经参加国民党的不过是挂个名儿,没有参加国民党的,今后也未必肯加入。你的想法倒不错,只怕是白费力气。”我对他们说:“从前国民党的声誉,虽然被一些政客所玷污,但自从中山先生主张国共合作、实行改组国民党以后,情形就不同了。今后正要我们好好地去整顿。只要我们目标远大,做法正确,群众自然就会拥护我们,国民党的威信也就能树立起来。”黄复生反问我:“你看这一堆烂摊子,怎样整顿法?”我说:“第一,要有一个严密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第二,要培养一批效忠革命的干部;第三,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活动。做到这三件,我们的整顿工作就算成功了。我计划先办一个学校,一方面可以集合和培养一批干部,另一方面也可

以作为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的据点。”他们听了我的话，都说：“你以为办学校是容易的事情吗？我们很久想办学校，都没有办成呢！”我跟他们谈了很久，他们始终表示怀疑，没有信心。

国民党的旧人暮气沉沉，我就去找青年人商量。找到了我在成都办高等师范时和我共同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杨闇公和杨伯楷（当时叫杨洵）、冉钧、张锡畴等，他们大多已是共产党员或青年团员，听了我的计划，非常赞成，立刻就动手干起来。我把廖仲恺先生给我的一千元钱全部作为办学校的经费，但是还差很多。又把我私人在川江轮船公司的两张股票拿出来押当，由于这个股票的利息很高，当了两千块钱，也把它全部充作了学校经费。

我们一方面筹备经费，联络熟人；一方面分头去找校址，买家俱。那几天，重庆格外炎热。可是大家干劲都很足，每天清晨就到外面去奔走；中午到杨闇公家里开会，交换情况；下午又出去奔走。大家累得汗水直流，但心里都很兴奋，反而觉得挺爽快。不几天，就在大溪沟找到了校址，而且把一切筹备工作都办妥当了。早些时候，华法教育会曾计划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重庆办五个中法大学。我是华法教育会的发起人之一，于是就把新办起来的学校定名为“中法学校”（大学部称中法大学）。

学校的筹备工作差不多了，学生从哪里来呢？恰好江北中学、合川联合中学和重庆第二女子师范都因罢课而有许多进步学生被开除。我立即找到了这些学生，把他们招收入学。于是各地进步学生都闻风而来，一下子招了二百多人。9月4日，学校正式开学上课了。

与筹办中法学校的同时，我又着手整顿国民党的组织，把省党部迁到莲花池新址。我对四川各县国民党的情况是比较熟悉

的。还在 1921 年搞四川自治运动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物色了一批干部。现在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革命势力日益高涨，群众的革命情绪很饱满，所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久，许多重要县市的党部都成立起来了。我回到四川以后，不过两个月时间，居然办起了学校，建立了国民党的各县党部，以前对整顿工作缺乏信心的黄复生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惊奇。他对人说：“吴玉章的手段真高明，好象有神仙帮助一样。”其实，哪里有什么神仙帮助？我所依靠的是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不过黄复生当时并不知道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那时，我们接到广州的指示，定于 1925 年 11 月初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接到电报已经很迟了，我们赶紧筹备起来。因时间仓促，便让各县市代表就地开会选举。选举结果，我和杨闇公同志等六人当选去广州出席大会。这六个人中间，除了黄复生以外，其他都是共产党员，可见当时四川的国民党内，左派势力已经占了很大的优势。

1925 年 11 月，我们离开四川，经上海去广州。

四

我离开广州只有四个多月，再回广州一看，情形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州政府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右派看到左派力量日益发展，非常害怕，竟于 1925 年 8 月 20 日，暗杀了廖仲恺先生。这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以来，右派势力对左派的一次最严重、最卑鄙的挑衅。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依靠省港罢工工人的力量，立即进行反击，驱逐了国民政府内部公开的右派头子胡汉民、许崇智等人，并解除了粤军魏邦平、梁鸿楷部

的武装。10月1日广州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盘踞东江的陈炯明虽然得到英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援助，但在革命军队的英勇进攻下，仍是不堪一击，被打得落花流水。11月中，广州政府收复了惠州、潮州、汕头等重要城市，陈炯明叛军完全被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大大地巩固起来了。

但是革命运动的发展总是迂回曲折的。国民党内一些旧的右派失败了，跟着就又有新的右派产生。这时，戴季陶之流的所谓“理论家”正在大肆贩卖其“纯正的三民主义”的反动理论；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组成的西山会议派，也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在北京召开了非法的所谓“西山会议”；广州黄埔军校中的一部分反动军官和学生在蒋介石的卵翼下也搞起“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组织。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虽然还没有暴露他反革命的身份，但在左派力量日益增长的形势下，也感到十分恐慌，办一切事情都缩手缩脚。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原定在1925年11月召开，但是由于右派的阻挠，会议一直拖延下来。

我们四川代表团在到达上海之前，本来以为一定要迟到了。到上海以后才知道会议已经延期到1926年1月1日。我们赶到广州，才知道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开始，各地代表也到的很少。除了我们四川的代表外，只有湖北的代表来了董必武、钱介磐（亦石）同志等五人；华侨代表来了彭泽民、许苏魂等三十余人；其它地方的代表有的还没有报到，有的地方甚至连代表都还没有选出来。更可怪的是连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广东省，也还没有选出代表来。大家议论纷纷，说大会恐怕开不成了。我看了这种情形很着急，因为当时邹鲁、谢持等正在北京酝酿要在上海召开非法的代表会议来和我们争夺领导权。这次大会是我们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一次重要会议。假使大

会开不成，那就会大大助长西山会议派的气焰，对革命将带来十分严重的恶果。因此我立即去找汪精卫。汪精卫愁眉苦脸地说：“大会恐怕开不成了！”我说：“现在邹鲁等人这样猖狂，他们不但排斥共产党，也排斥广东的国民党，不跟他们斗一斗，怎末成？否则，许多同志流血牺牲换来的这块根据地就要垮台，只怕你这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也坐不住了！”汪精卫说：“我也没有办法。”我说：“怎末没有办法，快些筹备就有办法了。”汪精卫只在那里唉声叹气，我又催促他赶快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以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不几天，中央会议召开了。会议上，大家推举我做大会的秘书长，负责筹备工作。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切筹备工作都是依靠我党进行的。那时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聂荣臻、萧楚女等同志都在广东工作，陈延年同志是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和我经常往来的还有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同志。大会的筹备工作，就是由我和这些同志商量，分头进行的。依靠我党党员大家的努力，筹备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

1926年1月1日，大会果然如期召开了。会址设在广东省议会的大厅中，布置得朴素庄严。会场门口设置了一个很大的地球模型，表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团结。会议开得很生动、很热烈。到会代表256人，其中约有五分之三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着压倒的优势，形势非常有利。那时广州还有几十万省港罢工的工人，天天游行集会，还组织了工人纠察队。由我党举办的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如雨后春笋，遍设于广州市内。尤其是毛泽东同志所主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集中了二十几省的各族革命青年，成为指导和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群众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到处都可以听到国际歌的雄

壮歌声。

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左派势力日益增长了，国民党的右派甚至中间派都感到恐慌。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对汪说：“你看这次大会上，能办事的，会说话的，一考查，都是共产党员。”从她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共产党的嫉恨。大会开了几天，刚好蒋介石从潮汕军次回广州，出席了大会。蒋介石最喜欢人家吹捧，陈肇英迎合蒋的心理，在开会时，向大会提议：“蒋总指挥劳苦功高，大家应向他起立致敬。”结果起立者寥寥无几，闹得蒋介石十分尴尬。会后代表们都骂陈谄媚无耻，陈也无地自容，几乎不敢露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大会上正气完全压倒了邪气。

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可是机会主义者陈独秀偏偏顾虑重重，恐怕共产党力量太大，吓跑了国民党右派，于是便亲自出马来限制一下。他一直在上海，没有参加广州的大会，但却非常殷勤地一定要请右派分子戴季陶、孙科等去广州开会，好象少了这几个人，大会就开不成似的。后来他又给我们写了好几封长信，大谈其所谓形势与策略。他对形势的估计很悲观。当时，郭松龄军倒戈失败，奉系军阀气焰复张，并与吴佩孚勾结在一起，冯玉祥的国民军正处于四面受敌的情况中。陈独秀片面地认为这就是革命低潮到来了，因此指示我们在统一战线方面要执行让步的策略。他对大会出了许多坏主意，主张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据说这样做就可以团结国民党。他提名了一些人，其中很多是顽固不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当时我们感到这种做法不对头，也有几个同志坚决反对这种无原则的让步，因此大会并没有完全按照陈独秀的意图进行。大会通过了对右派集团的坚决谴责，开除了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并给林森等以书面警告。这些做法都

违反了陈独秀的意志，都是做得很对的。但最后在选举方面却受了陈独秀的影响，在选出的六十个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十四人。（包括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恽代英、董必武、邓颖超和我等人。）而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的势力更大。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让步。在这次大会上，本来我们有条件使进步力量在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取得优势，但是我们却自动地放弃了。事实证明，不进行斗争，幻想以片面的退让换取“团结”，其结果只会助长右派的气焰，而使“团结”终于破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方面虽然是正确的，但在选举问题上片面让步的错误，也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五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许多同志要我留在广州工作。但是我觉得四川的国民党组织建立不久，急需继续巩固；而且四川省又是吴佩孚巢穴——湖北——的一个侧翼，假使把四川的革命工作搞好，对于行将到来的北伐，一定会起良好的作用。基于这些原因，大会刚刚结束，我就匆匆地离开广州，回四川去了。

一路上为了宣传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精神，耽误了一些时间。在上海、南京做了许多次讲演。由于长期紧张工作，感到身体有些支持不了。到达宜昌，需要换船，我一上岸在人力车上就晕过去了。同行的熊晓岩先生把我扶到一个教堂的墙下，给我吃了一杯药酒才苏醒过来。刚到重庆，又晕厥了一次。大家把我送进医院疗养，我心里总是放不下四川党部的工作。可是医院规矩很严，不准我走动，不准我会客。同志们也怕影响我的健

康，许多事情都不告诉我，因此我住在医院里什么事情也不知道。

那时，国民党右派更加猖獗起来了。蒋介石开始暴露出反动面目，制造了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诬蔑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阴谋暴动。逮捕了李之龙和军队中的许多共产党员。这是国民党右派对我们发动进攻的一个信号。当时毛泽东等同志主张给右派以坚决的回击，可惜这个主张没有被采纳。同时，西山会议派也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企图和广州的二次代表大会对抗。到5月15日，蒋介石得寸进尺，又召集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什么“党务整理案”，自己又当起了党的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把党权、军权统统抓到自己手里。各地的国民党基层组织里也刮起了一阵反共的逆风。四川就有西山会议派的头子石青阳，在重庆另立一个省党部，天天找我们莲花池党部的人打架。我住在医院里就看见许多被打伤的人，包着头，扎着绷带，不过我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再三追问，同志们才把实情告诉我。

我出院以后，决心组织力量，对右派进行反击。我和杨闇公同志分工，他负责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工农运动；我负责整顿国民党的组织，并在中上层和军队中进行活动。当时刘伯承同志也在一起工作，我出医院后大部分时间就住在重庆浮图关刘伯承同志的家里。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准备在1926年8月召开一次四川省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反击右派的进攻。后来会议也如期举行了。不过，那时我已于7月底出川，因为革命军已经开始北伐，广州方面急电召我到广州去，因此我没有来得及参加那次大会。

在四川的几个月，我又在军队中进行了一些活动。四川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兵员之众，番号之杂，甲于全国。其中较大的军阀有杨森、刘湘、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以及从贵州来的袁祖铭等。这些军阀各据一方，互不相下，今天甲军与乙军联合攻打丙军，明天甲军又和丙军联合攻打乙军，弄得烽火连年，哀鸿遍地。而且这些军队大部分在名义上都已归附了吴佩孚，他们战斗力虽差，但假使和吴佩孚联合起来，也未始不是北伐军的一个大患。好在这批军队内部矛盾很多，某些军队又跟我有些历史关系，所以我就着手从中分化他们，希望争取一部分军队反正，以减少北伐的阻力。我最先选择驻在南充的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作为争取的对象。何本是熊克武的部下，与我相识，他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起先以为这个人比那些腐朽的军阀总会开通一点，哪里知道他的头脑也象花岗岩一样的顽固不化。我劝他归顺广州革命政府，晓之以理，喻之以势，反复譬说，仍然是一窍不通。原来他以老婆的名义在一个织绸工厂加入了股份，他已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军阀和资本家“一身而三任焉”的人物。当时织绸厂里有我党的组织，工人时常罢工。他为此对于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痛恨入骨，所以革命的道理一句也听不入耳。象何光烈这种人对于无政府主义正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不过我这次去南充也没有白跑，我利用旧的关系，天天到士兵中去演讲，宣传革命的道理。何光烈部下有两个旅长倒比他们的“无政府主义”上司好的多，这两个旅长同情革命，终于被我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两旅队伍参加了刘伯承同志领导的顺（庆）、泸（州）起义。

我还在重庆袁祖铭的黔军里进行活动，并且跟袁祖铭亲自谈了一次。当时袁祖铭受到杨森、刘湘的围攻，正在走投无路。

其部下师长王天培、杨其昌颇有归附广州国民政府的倾向。我跟王天培谈了几次，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他颇为悦服，表示愿意加入广州革命队伍。我曾据此报告国民政府。不久，黔军被迫退出四川，王天培和杨其昌就投降了北伐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九军和第十军。不过这两支军队由于没有得到改造，虽然他们在常德同贺龙同志的军队一起，消灭了袁祖铭，又攻下了宜昌，但是后来仍被蒋介石拉了过去。

六

1926年8月，我又到了广州。这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叶挺同志领导的独立团担当先锋，已于6月初进入湖南。由于过去几年里毛泽东同志在湖南作了许多工作，我党在这里的组织极为坚强，工农运动也最为发展。在我党的领导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英勇善战的独立团所向无敌。7月间，北伐大军在广州誓师，陆续进入湖南。一场伟大的革命战争展开了。

但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急需调整。自从3月中山舰事件和5月党务整理案发生以后，蒋介石包揽了军权、政权和党权，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北伐军出发的前夕，蒋介石又担任了总司令，把北伐军的各军以及政治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兵工厂等机构统归总司令部管辖。蒋介石上升到一个独裁者的地位，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遭到排斥。我一到广州，何香凝看见我就哭了起来。她说：“现在是跟北洋军阀决战的最后关头了，可是国民党内部情形这样糟，怎么办？一个人专横跋扈，闹得大家三心二意，这次战争怎么打下去？国民党怎能不垮台？”当时我们就商量对策。9月到10月，我们在广州召开了一

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以及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的联席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些重要的决议案，如提高党内民主、反对个人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等。唯有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由于右派分子张静江等的坚决反对，未提付表决。通过的这些决议案主要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右派的猖狂进攻的。

北伐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北伐军连续攻克了长沙、岳州。8月底，以独立团为主力的北伐军在汀泗桥、贺胜桥打败了吴佩孚的精锐部队，北伐军长驱北上，攻克汉口、汉阳。10月10日，打下武昌。吴佩孚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退入了河南。同时北伐军在江西和福建方面，也开始发动进攻。盘踞东南的大军阀孙传芳由于遭到失败，内部发生分化。11月北伐军攻占南昌，12月占领福建。不到半年的时间，曾经称霸中原、不可一世的吴佩孚和割据长江下游富庶区域的孙传芳，其反动军队都迅速地土崩瓦解了。只有奉系军阀张作霖还负隅北方，妄图顽抗。北伐战争发展得这样迅速，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群众热烈支援，人民箪食壶浆，迎接大军。人民群众的拥护，正是北伐战争获得迅速胜利的根本原因。

但是北洋军阀的垮台和北伐军事的胜利，并不表明革命从此就可以毫无阻碍、一帆风顺的发展。因为站在北洋军阀后面的还有更加凶恶的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不会就此甘休的，它们总要千方百计地来挽救自己的失败。近代的中国历史证明，每一次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帝国主义决不会坐视，它或者发动公开的干涉，或者进行内部的破坏。而北伐战争时期革命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我党领导上的机会主义错误，更给帝国主义造成了从内部破坏革命的空

隙。可以看到：从1926年年底开始，北伐的军事方面逐渐被推到一个次要的位置，而内部的政治斗争却被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正是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内的右派，企图破坏革命运动的反映。1927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和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都投入了反击右派、挽救革命运动的斗争中。这场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在革命内部的反映，是北伐战争在政治上的继续。

1926年底和1927年初，国民党内左右派的冲突在迁都问题上又爆发出来。当时蒋介石在南昌搞了一个右派中心，和帝国主义眉来眼去；许多政客、买办，如黄郛、虞洽卿辈出入蒋介石的幕府；帝国主义、江浙财阀和蒋介石在一起策划一个新的阴谋。蒋介石背弃自己的原议，反对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的决定，要把政府迁到南昌。当初，蒋介石因害怕广州的工农革命力量，曾提议把政府迁往武汉，遭到了我们大家的反对；等到武汉工人运动和两湖农民运动起来了，我们大家都主张把政府迁往武汉，并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了正式决定的时候，他忽然又提出异议，不肯服从。蒋的出尔反尔，暴露了他的个人野心，引起了大家的愤慨。当时江西地区处在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控制之下，南昌已成为右派的巢穴。很显然，蒋介石是要把革命政府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以便任意摆布、为所欲为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蒋的企图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又被我们拒绝。

1926年12月，广州政府迁移，党政负责人分路去武汉。有的走水路经过上海从长江上溯；有的走陆路，取道湖南；也有的取道江西。我走的是水路，到达武汉最早。12月10日大部分负责人赶到了。当时有许多问题都亟待解决，因此决定成立一

个党政联席会议，以应付临时的一切事务。

七

我们一到武汉，就听到刚刚打下宜昌的各军发生了磨擦。宜昌是湖北的重要城市，地方富庶，又是出入四川的要道。但驻在宜昌的军队很复杂，有贺龙同志所率领的湘西民军，有新加入国民革命军的黔军王天培、杨其昌部，还有后来以反共著名的湘军何键的第三师。因为贺龙同志的部队把军阀袁祖铭打死了，并和何键的部队发生了纠纷，这件事轰动了武汉，国民党右派议论纷纷，要求解散贺龙同志的军队；宜昌的地主商人也制造了许多谣言，并跑到武汉来控告贺龙同志。武汉政府便派我到宜昌去调查和处理这件事，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宋子文所推荐的一个 人，负责去搞财务税收。我们到宜昌一看，装备精良的何键第三师和兵员众多的袁祖铭余部已经剑拔弩张，作好战斗准备，就要向民军开火，民军处在人少枪少的不利地位。何键和那些地主、商人天天到我跟前嘀咕，他们痴心指望我会同意他们消灭民军的反动计划。我当场把何键申斥了一顿，然后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把贺龙同志的民军调到武汉去拱卫革命的中心，以避免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右派军队吃掉，但是调动民军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宜昌的地主商人拿出四百万元来作为革命政府的军费。何键心里虽不愿意，地主、商人要拿钱出来，更是肉痛，但仍不得不服从命令。宜昌的这场纠纷就这样解决了。

我在宜昌住了一个月的时间，曾派出同志去组织工会及学生会等群众团体。这时武汉接连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武汉地区，在我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正蓬勃地发展起来。1月3日，

汉口群众举行庆祝游行，队伍走到江汉关前，英国水兵开枪行凶，死伤群众三十多人。工人群众十分愤慨，立即起来驱逐外国巡捕，收回租界。武汉政府在工人群众的支持下，接管了租界。这个举动象霹雳似地震动了全中国以及全世界。中国历届的政府从来都是唯帝国主义之命是听，如今武汉政府却一洗积辱，用群众的力量收回了租界，那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武汉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1月6日，九江工人也起来收回了租界。英帝国主义鉴于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的教训，不敢贸然使用武力。它除了进行威胁，并加紧拉拢蒋介石以外，同时也向武汉政府提出了“抗议”，进行交涉。武汉政府不顾诱惑，不怕威胁，态度强硬，英帝国主义也无可奈何。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有“铁腕外交”之誉。当然，武汉政府的这个铁腕，并不是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的铁腕，帝国主义那时所碰到的乃是全中国人民高举的真正有力的“铁腕”，所以它的一切诱惑和一切威胁都属徒劳。

八

汉口租界收回以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诱惑日益加紧了。1927年1月9日，蒋介石从南昌到武汉，他这次武汉之行的目的仍然是想把国民政府迁到南昌去。那时武汉的群众运动，非常高涨，工会、农会、学生会、童子团、商会等组织都已建立。国民政府召开了一次有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他，会上蒋介石竟恬不知耻地丑表功，说自己如何如何的用兵如神，劳苦功高。群众当场起来质问他：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蒋介石被问得张口结

舌，面红耳赤。接着苏联顾问鲍罗廷讲话，大意是说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独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蒋介石受了群众正义的质讯，恼羞成怒，却把怨毒之气全都转移到鲍罗廷身上。他回到南昌以后，立即给徐谦（党政联席会议主席）打来一个电报，硬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徐谦接到这个电报，吓的不得了，打电报到宜昌，要我快回去商量。这样我就星夜从宜昌赶回了武汉。

我回到武汉，开了一次会。会议上多数人反对撤换鲍罗廷，只有徐谦主张顺从蒋介石的要求，说：“照顾蒋介石的面子，把鲍罗廷换一换罢！”我说：“这不是面子问题，鲍罗廷是否要换，应由大多数中央委员来决定，蒋介石一句话怎能算数！究竟是蒋介石服从中央呢，还是中央服从蒋介石？再说鲍罗廷的话根本没有错误，凭什么理由要撤换他？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后来会议决定不理蒋介石的这一无理要求。

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行为，引起了武汉方面极大的愤慨。我们决心要跟他斗一斗。为此，特成立了一个由徐谦、邓演达、孙科、顾孟余和我共五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发表了宣言和宣传要点（内容主要是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以及所谓“迎汪复职”等。）接着我们又准备在3月7日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中央全会。各地中央委员陆续到了武汉，足了法定人数；只有蒋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委迟迟不来。到了临开会的日子，谭延闿、陈公博等从南昌来了，带来了蒋介石的口信，说要把会期移在3月12日他才能来开会。我反对会议延期，我说：“开会日期早就通知了，为什么他不来？现在法定人数已足，为什么要让大家等他一个人？”结果会议还是如期在7日

开始。不过由于不少人有顾虑，所以把7日的会议算作预备会，10日才开正式会议。假使蒋介石真想在12日来开会，也可以赶得上。大概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他的意旨，所以他很生气，始终没有到会。

三中全会上，左派力量占压倒优势，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上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案，统一革命势力的决议案，制定了“修正政治委员会及分会组织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以及其它一系列的决议和宣言。确立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选出中央常务委员九人，有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孙科、顾孟余、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和我，除这九人兼任政治委员并推三人兼任秘书外，又选出宋子文、宋庆龄、陈友仁、邓演达、王法勤、林祖涵(林伯渠)六人为政治委员。这些人共同组成一个领导机构。这样就实际上剥夺了蒋介石所窃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会议一直开到3月20日才结束。

那时，长江下游的形势又起了变化。3月21日，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起义，八十万工人和装备精良的直鲁联军展开了肉搏，经过一天一夜的血战，终于解放了上海。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第二军也攻克了南京，孙传芳和张宗昌的残余部队狼狈逃窜苏北，从此长江以南的全部地区为国民革命军所控制。

革命势力日益推进，革命内部的分化也日益剧烈。当3月7日三中全会开会的前一天，蒋介石就在南昌枪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同志。随后又指使青红帮匪徒捣毁了南昌市党部和总工会。3月23日，蒋介石又跑到安庆行凶，

指使他手下的暴徒，捣毁了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3月24日，即革命军解放南京的那一天，英美等帝国主义公然出动军舰，炮轰南京的革命军队及和平居民，死伤达二千人。就是这样，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同时举起了屠刀，里应外合地对革命展开了进攻。

九

1927年4月，在长江下游，左派和右派的斗争达到高潮。当时，上海在工人纠察队的控制之下，南京在六军和二军的控制之下。（这两个军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并由著名的共产党员林伯渠和李富春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为了勾结帝国主义进行反革命的叛变，就倾注全力来夺取这两个最大的都市。他把自己的嫡系部队都摆在京沪线上，盘马弯弓，跃跃欲试。情形已经很明显，京沪线上的这场斗争，将是革命成败的一个关键。有人主张把刚从郑州前线回来的第四军（是北伐的主力，号称“铁军”，军中有许多共产党员）调到南京去加强南京的防御，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并监视蒋介石的活动。这个主张得到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的支持。4月3日，第四军开往南京的准备工作都作好了，军队中已作过动员，运输的船只和粮秣枪弹都已准备就绪，并已决定4月4日出发。就在出发前夕大家在一起开会时，忽然有人提出，不应该把“铁军”调到南京去。理由有两个：第一是怕在长江下游和帝国主义太靠近，会引起冲突和干涉；第二是当时汪精卫已从国外回到上海，将要来武汉，假使我们和蒋介石完全闹翻，蒋一定要扣留汪，不让他来武汉。这两个理由，我们今天来看是何等荒谬，但当时却有不少的人说得振振有词，甚至部分共产党员也支持这种主张。为什么许多人思想这样混

乱呢？主要是由于武汉政府的阶级构成复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还占很大的势力，许多国民党员以至共产党员，政治思想水平也都不高。当时我党还处在幼年阶段，虽然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但思想上却不够坚强。大家对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没有从本质上加以分析，以为躲远一点就可以避免干涉。由于缺乏应付干涉的经验，对帝国主义干涉的后果也作了过高的估计。至于对汪精卫抱有幻想的人就更多，大家只看见汪在历史上的光明面，只看到他某些伪装的革命词句，只看到汪蒋之间存在的矛盾，而没有进一步从阶级本质上去分析汪蒋之间的一致性。

反对“铁军”开往南京的意见提出来，引起了会上一场激烈的争辩。参加会议的共有十个人，只有瞿秋白、邓演达和我三个人坚持原议。我努力想从军事方面说服别人，特地征询军事顾问加伦将军的意见。加伦将军说：“从北伐的军事观点来看，加强南京方面的兵力是合理的，这样我们一方面可以从武汉沿京汉路北上，一方面可以从南京沿津浦路北上。”于是，我把加伦将军的这个意见，作为调动第四军去南京的理由来力争。但是会上大多数人不同意，因此调第四军去南京的计划被搁置了下来。这是革命方面的一大失着，假使第四军按照原定计划调去南京，长江下游左右派力量的对比便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也就不会那样顺利。可惜革命方面在这样关键性的问题上又走错了一着棋。

以后形势急转直下。伪装进步的汪精卫从国外到了上海，和蒋介石等秘密谈判，决定分裂武汉政府。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在上海共同发表了所谓汪陈联合宣言，极力为蒋介石辩护。这时，身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完全被反革命牵着鼻子走了。4月9日，汪陈一起来到了武汉。12日，蒋介石在上海

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反革命大屠杀，成千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在新军阀的屠刀下牺牲了。15日，广州方面也发动了屠杀。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府，和武汉革命政府公开对抗。

十

汪精卫刚到武汉，仍伪装革命的样子。“四·一二”惨案发生后，汪也跟着别人拍桌子，大骂蒋介石，但是他骨子里却无时无刻不想反共。他住在谭延闿家里。谭的家里有一个四川名厨师，做得一手好菜。谭延闿家是个地主阶级的大本营。湖南许多地主遭到了当地农民的清算，都跑到谭延闿那里去造谣诽谤。汪精卫不仅吃了许多四川菜，同时也喝了许多地主的迷魂汤，于是就显出了他的反革命面目。他一见我们，就叫喊说农民运动搞的太过火。陈独秀也跟着帮腔。有一次，不知哪个地主造谣，说某某司令的母亲因为是小脚就被农民解去脚布，用箩筐抬着游街；又说某地农民协会扣留了政府的粮米，不让运出去。汪精卫借题发挥，暴跳如雷地说：“这不是造反吗？岂有此理！是政府管农会？还是农会管政府？”陈独秀也在一边应声：“是谁在湖南搞的？简直是乱搞！”

汪、陈到武汉之前，我们本来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党所掌握的军队，因此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已经筹划好了。当时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政府中占优势，工农革命情绪又很高，所以干起什么事来都很顺手。可是陈独秀来了，附和谭延闿的意见，说什么计划中配备的枪械比别的军队都好，怕引人妒忌；他又说自己建立军

队，太惹人注目等等。就这样前怕狼、后怕虎，这一师军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1927年4月下旬，我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实际上并未解决任何问题。陈独秀只是表面上承认了一下错误，而大会竟仍然选他作党的总书记，这样就使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得以继续执行和发展。我虽是四川省的代表，但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因为怕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好在国民党内工作。可是大会开完后不久，陈独秀却故意地给我暴露了。他在《响导》上转载了高一涵的一篇文章，说在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某某几个人是共产党员，决不可能操纵国民党，想以此来表白对国民党的忠心。这简直等于告密，给我以后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增加了极大的困难。我见了这篇文章很生气，立刻跑去质问他。但他却厚颜无耻地说：“为了这件事，我一夜没有睡，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把你们几个人公开了好。”原来陈独秀反复考虑的结果是不惜牺牲一切以讨好国民党，他的机会主义毛病实已深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那时武汉政府派出继续北伐的军队，在河南受阻。1927年4、5月间，战事相持于遂平一带。随着战争的停滞，促使军队进一步分化。5月17日，驻在宜昌的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挑唆下发动了叛变。我们正在开会，听到夏斗寅部已经到了武昌附近的纸坊，立即要进城。大家忙着找叶挺去抵抗。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徐谦、顾孟余这些投机政客一见大势不好，都悄悄地溜走了。后来通过电话找到了叶挺，才知道夏军已经被叶的部队打垮了。当时叶挺领导着他的部队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组成的队伍把叛军打得一败涂地。如果叶军一直把叛军追到岳州，完全可能把它一鼓歼灭。可是汪精卫主张调解，

唐生智这时也说他可以招呼夏斗寅。于是派了陈公博等进行调解。反革命打我们，没有人出来调解；我们打反革命，“和事佬”就这样多。武汉政府中的那些反动分子的反共意图，已昭然若揭，可是陈独秀还在那里跟他们无原则地大讲“团结”，对农民运动泼冷水，说农民运动搞得“过火”。

夏斗寅叛变后，湖南的反革命势力起而呼应。5月21日，第三十五军许克祥团在长沙发动叛变，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这就是血腥的“马日事变”。当时长沙附近各县的工人和农民义愤填膺，集合十数万人准备于5月30日进攻长沙。长沙只有许克祥一个团的兵力，只要我们领导上坚决一点，消灭这支叛军，可以说是瓮中捉鳖。汪精卫听到消息，大发脾气，指责我们不该打许克祥。陈独秀就赶快下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大多数部队接到命令后停止了行动，只有其中一支工农部队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5月30日，这支工农部队单独攻扑长沙，由于没有其他方面的配合，结果失败了。这次失败完全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事后汪精卫还讥笑陈独秀：“你们十万大军怎么连许克祥的一个团也打不赢。”反动派就是这样可恶，你越让步，他就越嚣张。象这种让步完全是软弱的表现，怎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呢？

5月30日，武汉政府的北伐军打下了郑州，与冯玉祥在西北的国民军取得了联络。这是一个喜讯，但喜讯中也包含着噩兆。因为在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党在政治上不能振作起来，那末军事上的每一步进展就只能成为革命阵营内部进一步分化的契机。6月10日，汪精卫、唐生智、谭延闿、徐谦、邓演达等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会议是秘密进行的，我身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对会议内容也一无所知，可见汪精卫是如何处

心积虑地来对付我们。他们从郑州回来后，我只见邓演达垂头丧气，情绪消沉。6月19日，蒋介石又和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分共与宁汉合作。冯玉祥给汪精卫打来一个电报，说已在徐州与蒋介石开会商谈。那时我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一切重要文电都由我经管，我看到这个电报十分惊异，就问汪精卫：“冯玉祥为什么跑到徐州去跟蒋介石开会？他们商谈些什么问题？”汪精卫含糊其辞，先说不知道，后来又说电报弄错了。我把这种可疑的情形告诉了陈独秀，但陈独秀仍是若无其事，泰然置之。

形势一天天地恶化。唐生智的军队从前线开回了武汉，名义上是拱卫政府，实际上是要控制局势，以便先发制人。不久军事委员会下令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陈独秀竟同意了这项命令。于是我们手中仅存的一部分武装也被解除了。事后军事委员会开会时，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还说：“只收到一千支坏枪。”意思是说还有更多的好枪藏起来了，还要逼我们交枪。其实我们手上已根本没有什么武装了。

财政方面的情况也很糟。蒋介石叛变后，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不辞而去，跑到上海去投靠蒋介石。他丢下了一笔糊涂账，后来由湖北的两个反动商人来接管财政。那时前线的开支很大，政府收入不多，再加上管财政的人贪污中饱，弄的国库空空如也，十分困难。

针对这种非常危急的情况，共产国际在5月发出了紧急指示，内容是实行土地革命，发展工农运动；加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左派力量；动员党员和工农群众，编练五万军队；组织革命军事法庭，肃清反革命分子。这是当时挽救革命的唯一方法，陈独秀却扣留了这个指示，不让全党知道。直到6月23日，在

党中央的一次扩大会议上，任弼时同志要求陈独秀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党内公布出来，陈独秀拒不接受，还大发脾气。我问坐在旁边的张太雷同志是怎么回事，张太雷同志把指示内容告诉了我。我说：“这样重要的指示，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张太雷同志说：“我也是刚刚知道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这回事。”在革命十分危急的关头，陈独秀仍然用家长作风来坚持他的机会主义路线，革命的失败怎能避免呢！

十一

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走上了失败的道路。全体党员都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而党的领导中心却涣散无力。不少党员想尽种种办法来挽救局面，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有一些党员则表现消沉。谭平山辞去了武汉政府农民部长的职务，成天忙着收拾行李，见了我就叹息说：“不行了！搞不下去了，还是走吧！”我问他：“不在这里继续搞，又走到哪儿去呢？”他也回答不出来。武汉街头的空气也愈来愈紧张。何键的反动军队天天在街上巡逻。汪精卫正在加紧酝酿“分共”。当时的第四军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是“分共”的主要阻碍。汪精卫找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商量，张发奎怕控制不了军队，有些犹豫。汪精卫就拿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添油加醋地说：“共产党要消灭国民党，要把军权抓到手上，跟他们合作不下去了，还是分开的好。”这样，张发奎也就同意了“分共”的反革命计划。

1927年7月14日晚间，武汉国民党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员都被排斥而不得参加。那晚，我和林伯渠同志在一起等候会议的消息。直到深夜12时，彭泽民来告诉

我们开会的情况：汪精卫在会议上极力主张“分共”，宋庆龄没有参加会议，请了陈友仁作代表，在会议上极力反对“分共”。陈代宋说：“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孙科听了就起来跟陈友仁大吵。汪精卫也坚持要“分共”，并假惺惺地说：“分共以后，我们还可以跟共产党实行党外合作；我们仍继续反帝反蒋。”当然汪精卫说的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事实证明：他在“分共”的同时就立即对共产党员大肆逮捕和屠杀。他所说的“分共”就是“反共”的同义语，而“分共”的必然结果，就是滚进帝国主义的怀抱里。

当晚我回到寓所，心中很烦躁。再加天气炎热，不能睡觉，夜间3点钟我还在晒台上乘凉。忽然看见有四个人，背着枪，推开我寓所的门进来，一会儿又出去了。我躲在暗里看他们的动静，以为他们走了。几分钟后，这四个人又从后门进来了，到我电话室里，拆了电话，还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外面风声很紧，要我赶快离开。我和同住的邓懋修商量，邓劝我说：“你且暂时移居一个地方吧！否则，赤手空拳，一定要吃他们的亏。”因此我当晚就搬到我大哥的寓所去了。

7月15日早晨，接到党中央的通知，让我到武昌集合。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印信、账目、文件，都是由我经手管理的。我考虑到账目没有交代，反动派很可能制造谣言，诬蔑我卷款潜逃，借此来破坏我党的声誉。因此我决定要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办清交代。9点钟我就去党部，把我经手的一切都交代清楚，然后给汪精卫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大意是说昨晚有武装到我寓所迫我速走，所以我只得离开；并说他们“分共”的决定是

完全错误的，把革命中途断送了。

当天傍晚，在一阵倾盆大雨之后，我渡江去武昌。在船上，面对着郁郁的青山和浩浩的江水，一件又一件的往事在我脑子里翻滚。多少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出生入死，流血牺牲，才赢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如今革命竟被断送了，胜利的果实被反动派夺去，作为建立新的统治的资本。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我恨不得有这末一支大笔，可以蘸满长江之水，把这个教训题铭在青山之巅！

十二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屈服的。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叛变了革命，共产党却领导着人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由南昌起义而秋收起义，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创立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在新的情况下，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唯一正确的胜利的道路。

我从汉口到武昌后，随即搭船往九江去。这只船很脏，人就睡在载牛马的仓房里。天气又很炎热，气味十分难闻。但是我心里却很兴奋。因为我明白，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新的斗争。这种斗争虽然一定很艰苦，但从此以后，我们决不再受国民党政客和机会主义者的气了。

到九江后，立即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果然，彭泽民、张曙时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来到了。刘伯承同志到得很晚，他是月底才到达九江的。接应的工作完毕后，我乘最后一次火车去南昌。

到南昌后，我住到贺龙同志那里。这时部队已经在作起义的动员了。对于这次起义，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前敌委员会来领导，由周恩来同志担任前委的书记。前委开会的时候，曾发生很大的争执。张国焘主张要拉拢张发奎，若张发奎不同意，就不要举行起义。周恩来、恽代英等多数同志都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意见，认为我党应独立地担负起义的领导责任，不能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更不可依赖他。最后通过了多数的意见，决定8月1日晨4时举行起义。不料这个秘密，被二十军的一个军官泄露给朱培德的部下，于是前委又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

8月1日晨2时，南昌响起了革命的炮声，城头上竖起了革命的红旗。由叶挺、贺龙和朱德同志领导的起义部队迅速地将南昌的反革命部队全部解决。起义胜利了！

接着，成立了中央革命委员会，并在其下分设党务、农工、宣传、财政等委员会及参谋团、秘书厅、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等机关。我担任的是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同时又把军队编为三个军，由贺龙同志任二十军军长，叶挺同志任十一军军长，朱德同志任九军付军长。

起义虽然胜利了，但起义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却没有解决。那时，我们的思想还是认为要取得大城市和国际的援助，才能继续革命。因此决定回师南下，夺取广州，再举行第三次北伐。我们没有认清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没有把南昌起义胜利的部队和湘赣两省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更没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结果溽暑远征，终于遭到失败。这又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啊！

十三

从8月3日起，南昌起义的部队开始了南征。那时天气很热，加以群众受反革命宣传的影响，相继逃避，以致沿途很难买到饮食；因此行军极为艰苦，生病的人很多。同时宣传工作又做得很差，士兵不明了行军的意义，不少人偷偷地开了小差，仅仅行军几天，部队就几乎损失了实力的三分之一。

到临川以后，部队经过一番整顿，情绪比较好些了。这时天气也开始凉爽起来，对行军较为有利。记得阴历8月15日的晚上，我们到了三江口。对着中秋的明月，谭平山也一扫平日的愁容，拣着烧饼歌中的两句念道：“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接着又说：“九九八十一，正应在‘八一’上面，我们的起义是一定会成功的。”他虽然是在说笑话，但实际上他对革命也并无信心，只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命运的上。他后来走上了所谓第三条道路并不是偶然的。

部队经瑞金到汀州，又由汀州到了汕头。我们的部队在瑞金、会昌一带打了许多胜仗，也受到相当的损失。到汀州以后战斗就很少了。我在汕头又见到了我的大哥吴永棣和邓懋修，他们是从上海赶来的。这时情况已很紧急，我劝他们赶快离开。果然，敌人的海军（中山舰）派兵上岸来袭击汕头。我们在这里是没有什么战斗部队的，所以一时情况非常混乱。不过林伯渠同志（他当时是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和我们大家都很镇静，终于组织力量把来袭的敌人打退了。

但是，我们在汤坑却遭到严重的失败。经过反复的冲杀，我军的损失非常巨大。

汤坑失败后，起义的领导机关在流沙开会，决定非军事必需人员，一律分散。从此，我和林伯渠、贺龙、刘伯承等同志都分开了。到后来，和我同行的只剩下我的侄子吴鸣和一人。我们二人都不会说广东话，因此一路上十分困难和危险。说也凑巧，就在这时我们又碰到了谭平山，有了这个广东佬，我们才得以安全地走到海边，然后搭民船去香港。

在香港的一家商店里，贺昌同志看见了我。党派他到香港来是专门做接应工作的，这样我又找到了党组织。我在香港又见到了贺龙和刘伯承等同志，但却没有见到林伯渠同志。当时蒋介石为向帝国主义讨好，竟颠倒事实把英美等帝国主义炮击南京说成是第二军和六军搞的，诬称林伯渠同志是什么“国际要犯”。因此林伯渠同志不能在香港久待，在我到香港之前就避居到日本去了。在香港住不多日，党就把我们送到了上海。由于认识我的人太多，不便在国内工作，党决定我到苏联去学习，并警告我不要随便外出。后来有人看见我在上海的一家医院治牙，中央便又传来了对我的警告，要我赶快赴苏。党对一个同志是多么的关切啊！

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我和刘伯承及我的侄子吴鸣和等同志离开了亲爱的祖国。但是，祖国的人民仍在继续地斗争。井冈山上的红旗，正在引导着全国的土地革命胜利地向前发展。尽管革命的道路上还有无数的困难和障碍，但是，循着毛泽东同志开辟的道路前进，中国革命是终于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1961年)

忆杨闇公同志

锦城五一树红旗，革命风云壮华西。
为救万民于水火，不辞千里转成渝。
打枪坝上留英迹，扬子江心系健儿。
血沃鹃花红四野，巴山蜀水显神奇。

杨闇公同志，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人。生于1898年，牺牲于1927年。他是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组织的优秀领导人。

闇公同志很早就参加革命活动。他小时候就对旧社会和旧教育不满。1913年考入江苏军官教导团。1915年开始参加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16年秘密到江阴炮台策动官兵起义，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因事泄未成。1917年赴日本留学，先入成城学校，后进日本士官学校，专学军事。到日本后，因积极参与“留日同学读书会”学习进步理论，曾被日本反动当局拘留过。五四运动时，因联络留日学生在中国驻日公使馆门前举行抗议示威被捕，并被判刑坐监。

闇公同志在日本期间，阅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用以武装自己的头脑。随后，他决定回国参加实际斗争。1920年他回国返川。回川后，一面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宣传，一

面进行革命的组织工作。

1922年，我担任成都高等师范校长；闇同志这时也住在成都；我们就是在这年夏天认识的。他给我的印象很好。忠实可亲，精明能干。1923年秋后，闇同志通过我与刘伯承同志认识。由于我们志同道合，很快便成了知心朋友和革命战友，经常聚会在一起讨论局势，研究问题。

这时，四川省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革命形势很好。我和闇公等同志以成都高等师范为基地，积极展开革命活动。我们除了在校内活动外，还派人深入工厂，发动罢工，组织工会；深入乡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

当宣传和组织工作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以后，我们迫切感到有成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这时，中国共产党早已成立，但因四川地处偏远，我们还不知道；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虽然已在高师建立了组织，但因我已年过四十，又不能参加；我于是便与闇公等同志在1923年冬秘密组成了“中国青年共产党”（简称C.Y），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机构，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报。

有了领导革命的机构以后，我们的革命工作就更有计划和更有组织了。1924年5月1日，“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青年共产党”在成都联合召开了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大会的筹备工作，实际上是由闇同志与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进行的。在大会筹备初期，军阀杨森还假意表示欢迎，但当有人告诉他说我们“阴谋聚众夺取政权”时，他便撕下假面具，调集军队，实行戒严，把预定的会址“少城公园”派兵看守起来，还扬言要捉拿我，空气十分紧张。在这紧张时刻，英勇不屈的成都工人阶级和革命青年学生，不畏强暴，照计划开了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工

人就有五千多人，只是城郊农民队伍因反动军队的阻止，未能入城会师。我在闇公等同志力阻下，未能亲身参加。大会由闇公等同志主持。他在大会上作了“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情形”的讲演，演辞精彩，博得全场群众的热烈欢呼。会后他又到各地讲演，揭露军阀压迫人民的罪恶。通过这一事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看清了反动军阀的凶恶面目，从而更加激励了我们的斗争意志。

闇公同志对时局具有比较深刻的见解。他认定：“社会的过程，……有自然的定律。”他认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已全陷于半殖民地的状态了。国内的军阀，无论哪一个后面都有帝国主义在作背景，此仆彼起，混战不休。”他看到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奋斗的雄心油然而生，内心的信仰更加坚决。”他对军阀不抱幻想，而且认为军阀“外强中干”，是能够打倒的，他说：“我总认定军阀自身有绝大的矛盾，不久自然要崩溃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在预备与军阀作决斗的人才和工具，不在希冀他们大人先生们垂怜我们。”他主张“我们目前须要努力的是在宣传和组织两样（工作）上，尤其要使敌我的界线分明，要向左转走，要向民间去才有办法。换句话说，就是要以民众为后援，尤其是无产阶级，不然谈不上革命。”他又说：“我们要……从民众的团结上着手，外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内而铲除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人民才能解放。”

“五一”事件后，我因在成都站不住脚，被迫离开四川去上海。接着，闇公同志也因工作需要去重庆，先任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组织部长，后任书记。他积极组织革命团体，培养革命干部。11月，他领导了因日本帝国主义的轮船“德阳丸”号私运旧铜币（清朝的铜币），并打死重庆地方检查员的事件所引起的

群众斗争。1925年，为响应召开国民会议的号召，他组织了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并选派童庸生等十多人为代表，到北京出席国民会议。中山先生逝世后，他又在重庆组织了追悼大会，并广泛地进行宣传活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根据党的指示，组织了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推动这一运动的发展。这些，都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准备。

鬲公同志在组织革命团体的时候，力说“不宜滥收同志”，“对人要考察过去的历史，和他目前的动作、人格。”“今后当注意同志的学识，择优秀分子，为中坚的骨干，因群众运动，非有中坚人物不可。”他认为“将来要使团体支配人，不要人来支配团体。”“个人利益不要拳拳于心。”“一个团体的精神全在工作的表现，并且在内部的人能否团结得坚固，对于这两点，后者较前者尤其重要。”由于鬲公同志具有比较正确的思想，他在识别好人和坏人、选择中坚骨干时也就比较准。例如：他刚刚认识刘伯承同志，即认为“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可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情感来，但我已决意与他长久交好，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他对恽代英同志的看法是：“此君谈话很有真理存在，……他非常注意向民间去工作，与我所主张的很相同。”他认为罗世文同志，“此人是本团的健者，很可造的。”他对当时就表现不好的人，都有所警惕。例如：他认为陈子于“实际说来，他的头脑中，充满了升官发财的欲念。”他认为王国源的“实业救国”“真是做梦，全不懂社会的必然律和进化法则。”当有人向他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时候，他说“与痴人说梦何异”。后来的事实证明，鬲公同志对于这些人的判断基本上都是正确的。

闇公同志很注意群众工作。特别是对青年寄予很大的期望。他说：“青年之可敬可爱，逐处都可以看得见，加以团结训练，必能达光明之途。”他也认识到在当时社会条件下青年的弱点，教育青年“不要畏惧强力的压迫，要努力奋斗，才能打破现实的铁圈，进向光明道上。”他说：“青年的人性多因情而动，尤易随波而靡”，“宗法式的家族制不打倒，……要被它阻滞着若干好青年哟！意志薄弱的人，终难跳出它的圈外的，并且还要误死许多有作为的人们呢！”“故我觉得年轻的人们，要想把一切的万恶的源泉消灭，非与环境奋斗，创造新环境来作代替，不能免掉软化的危险的。”“有思想的人们，决不会盲从的，有强有力意志的，必具有特殊的反抗性！除俯首于真理外，决不屈从于任何势力之下的。能具有这种资质，才能说得上从事革命来。”

闇公同志在领导群众工作中，表现出很好的组织才能。例如：1924年重庆市商人为了反抗军阀的苛捐杂税，组织“商业共进会”，举行了罢市斗争。他一方面称赞他们，一方面又觉得他们内部，“缺乏组织力”。因而想“使S.Y.去助他们，或不至虎头蛇尾，没得结果。”以后便“决计加以援助，不达目的不止。”又如：当“德阳丸”事件爆发，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他认为“群众激动是很容易的，今后如能加以特别训练，则收的功效，更见大了。”当他看到“德阳案的空气，近来颇有搁浅现象，群众的狂热被消极的言论冷却了许多”时，便极力加以激励，于是“群情因之激烈异常！”他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是很卓越的。闇公同志很注意接近和了解工农。一有机会接近农民，“遂与之交谈。他们应对中着实亲切得很，诚实的样子，从言语中流露出来。农民们的生活着实太苦。”他对农民的了解是很深入的。对于工人阶级的力量，他更是深信不疑。他说：“吾人既已有了认识，只有努力为之奋

斗，领导着第四阶级（按：即指工人阶级）们前行，无论环境如何的险恶，决没有一毫的妥协可言。”

闇公同志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他自己却认为：“我是旧社会的叛徒，是新社会的催生者。”他抱着“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的决心，勇敢地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去。他认为“奋斗得来的结果，才是真快乐。”他说：“左右的环境，又如潮的压迫而来，处此城中，惟有奋斗。此身不死，必是光明。”他虽然工作很多，但在实践活动中感到“书到用时方觉少”，对学习很勤奋。他每天“晨起频读二、三小时的书，以免将来应用时产生学少缺憾。”闇公同志不仅注意自己的修养，也很关心弟妹们的成长。他常常给弟妹们讲时事，要他们研究马列主义，指示他们应走的道路。我看到他的弟妹们都很听他的话，也和他一样感到高兴。

1925年春我到北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即写信请闇公同志等宣布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个别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闇公等大多数同志都同意并且按照我的建议做了。但也有少数人认为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团体解散，再个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太吃亏，因而不肯照我的建议办，这些人后来便走上了错误的乃至反动的道路。这是很深刻的教训，一个人要革命，便不能有私心，否则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入党后，党命我仍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并要我先到广州去和国民党中央取得联系，然后回川整顿四川的国民党组织。

1925年8月，我回到了重庆，和闇公等同志商定了整顿国民党的计划，决定先办一个学校，以培养干部，并立刻动手筹备起来。

我们一面筹备经费，联络熟人；一面分头找校址，买家具。

我们冒着盛暑，每早外出，中午回二府衙闾公同志家里开会，交换情况，商量办法，下午继续奔走。闾公同志虽然体质较差，但工作特别积极。他的父亲杨淮清先生也热情地为我们服务，常说：“你们去忙吧！累了就回来休息、吃饭。”我们也就把闾公同志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在杨淮清先生和其他友人的帮助下，我们果然在大溪沟办起了学校，定名为“中法大学”。

学校成立了，学生来源呢？恰巧这时，江北中学、合川联合中学和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因罢课有许多进步学生被开除。反动派不喜欢的进步青年，正是我们所喜欢的；他们开除的学生，正好成了我们学生的来源。我们立即决定招收这些学生。于是，各地进步学生闻风而来，一下子就招收了将近三百人。9月4日，学校就正式开学了。

与筹备中法大学的同时，我们又着手整顿国民党的组织，把省党部迁到莲花池新址，由闾公同志负责实际领导责任。不久，许多县市的党部也都建立起来。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地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委员会，闾公同志被任为书记。

这时，国民党定于1925年11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赶紧筹备，要各县市代表就地选举。结果，我和杨闾公、童庸生、廖笠君（廖苏华）、廖划平（他当时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了可耻的叛徒）、黄复生六人，当选为代表去广州出席大会。这六个人中间，除黄复生以外，都是共产党员，可见当时四川的国民党内，左派势力是占很大优势的。

1925年11月，我们离开四川，赶往广州。到广州后，大会已决定延期到1926年1月1日。为进行大会筹备工作，国民党中央开会，推举我担任大会秘书长，闾公同志等分别在大会秘书

处担任工作。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完全是在我党领导和
我党党员的努力下进行的，因此进展迅速，能以在 1926 年 1 月
1 日如期召开。

这时，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大会的代表以共产党员和国民
党左派人士占压倒优势，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但是，由于陈独
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在选举问题上错误地让步，结果，在选
举出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仍
占极少数。这给后来的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恶果。

陶公同志在大会期间十分活跃。他到广州后，发觉“川中留
粤的人，太涣散，往往被反动的人把他们迷惑着。”就发起组织“四
川革命青年同志会”。他看到会场内外革命空气高涨，极为兴奋。
他对大会“取的策略是拥护左派，拆散右派”，特别是对开除右
派分子石青阳、马君武等的党籍，非常拥护，认为“在工作前途
上，又去了一些障碍”。他对“右派的人们，拚命的在运动票，每
票出四百元”，付之一笑。他对毛泽东同志的宣传报告十分称
赞，认为“较前此各种报告都要有系统些，他能把具体的事实指
得出来，并对于每个时期所施的宣传口号也恰中客观的需要。”
他对于汪精卫和蒋介石的报告很不满，认为汪精卫的报告“对罗
廷（按：指苏联首席顾问鲍罗廷）只说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
不说其具体的功绩，其用心可见。”认为蒋介石的报告“抹煞一切
农工援助的事实，而表示自我太强，这都是别有用心的人啊！”尤
其对会上有人提议全体起立为蒋介石致敬，他更为不满地说是
“笑话！”他对会议的结果，如宣传和党报以及工人、农民、商民运
动等决议，还比较满意，但仍认为“站在我们的观点上看来，不满
意的地方太多”，并决计今后要更加努力工作，以谋改进。他为

了在会后能更好的开展工作，在离广州前还应约访问了徐特立等同志。

大会结束后，闇公同志先回四川。随后，我也回川。这时国民党右派更加猖狂。蒋介石于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又于5月间提出了“党务整理案”，凶相开始暴露。四川的国民党右派也更加反动。西山会议派头子石青阳等，回重庆另外成立了一个伪省党部，设在“总土地”，人称“总土地党部”。他们专门与我们设在莲花池的省党部唱对台戏。他们经常派人到莲花池省党部来吵闹打架，并且打伤了我们许多同志。闇公同志主张与右派进行坚决斗争，同时也很讲究策略。

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我和闇公同志分工，他负责我党组织工作，开展工农运动；我因过去留学日本，同盟会员认识较多，便负责整顿国民党的组织，在中上层和军队中进行活动。闇公同志在组织群众团体的时候，很注意扩大与整顿相结合，他“觉得二者万不可偏废。”这时我住在浮图关刘伯承同志家里，闇公同志仍住二府衙，我们常在他们家里开会讨论工作。我们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论是策动军队、整顿国民党组织以及发动群众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闇公同志极注意发动群众，他常说：“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军阀们那几杆烂枪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对军阀武装的反革命作用估计得未免太低了。

军阀刘湘对我们搞群众工作非常害怕；他怕群众“赤化”，便暗中扶持总土地党部与莲花池党部捣乱。他曾说：“莲花池这一批人很厉害，他们是要彻底挖我们的墙脚呀！”的确，我们发动群众的目的就是为了铲除军阀。

为了扩展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整顿国民党的组织，我们计划在8月召开一次四川省国民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在我与刘

伯承同志再去广州后，由闇公同志等具体组织，如期召开了。

1926年9月，以闇公同志为首的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为反抗英帝国主义军舰炮轰万县事件，组织了“万县惨案雪耻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迫使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和所有的英国侵略分子不得不撤离四川。

这时，国民革命军已出师北伐，并于10月攻克武汉。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更加飞扬跋扈。为了限制蒋介石的独裁，我们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通过了反对蒋介石独裁、二五减租等决议案。这时，四川军阀中仍效忠北洋军阀的杨森，竟从万县、宜昌一带侧击武汉，给北伐进军造成严重的威胁。在此之前，朱德同志已被党派回四川，并在杨森部担任党代表，想争取他参加国民革命军。但杨森是个投机家伙，他一面答应参加国民革命军，一面又奉北洋军阀的密令侧击武汉。就在这时，邓演达和我们讨论二次北伐的问题，冯玉祥的代表徐谦等要求设法接应冯玉祥的军队出陕西与北伐军会师中原。考虑到冯玉祥部困在西北、杨森部侧击武汉等情况，根据我党意图，我在会上提出派刘伯承同志回川策划军事工作。当时设想：如果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就可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军。必要时也可以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北出西安，接应冯玉祥军队，配合北伐。大家同意了我的提议，决定给刘伯承同志以“特派员”名义回川。同去者还有欧阳钦同志。接着，我随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伯承同志等回到四川。伯承同志回川向闇公、朱德同志传达了党的意图后，即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同志组成中共重庆地委的军委，并由闇公同志兼任书记。军委当时决定，努力争取所有地方军阀都反对

北洋政府，倾向国民政府，抑止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在具体策略上，是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举行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军阀武装易帜倒戈，配合北伐进军。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军委会决定策动驻防顺庆和合川的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个旅和驻防在泸州的袁品文、皮光策、陈兰亭三个旅，举行顺泸起义，由刘伯承同志任总指挥。这时，陈毅同志正由中共北方区委派回四川执行任务，也参加了顺泸起义的领导工作。当时的计划是：争取驻防顺庆和合川的三个旅首先发动起义，在川北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三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把泸州起义的部队，拉到川北会合，扩编为六个师、一个军。如果能在四川立足，便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如果不能在四川立足，便拉到川陕边境，策应武汉，或北进西安，与冯玉祥军配合。

1926年末，顺泸起义先后爆发。顺庆起义被迫比预定计划提前，非常仓卒。刘伯承同志及我党派去的其他人员赶到时，各路军阀部队的反扑已经逼近。由于起义的是旧军队，还没有得到改造就遭到围攻，又没有与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因此战斗力差，很快就遭到失败。只有一小部分，跟着刘伯承同志到了开江县。紧接着顺庆之后，泸州起义也爆发了。按原订计划，泸州起义部队是要迅速开到川北去与顺庆起义部队会合的。但起义部队的将领都是些军阀，他们起义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现在因起义胜利才得到泸州这块肥肉，他们那里肯放呢？为了争夺泸州城每月十万元的盐税，他们甚至发生内哄。陈毅同志也曾对他们反复解说，他们哪里肯听。陈毅同志见他们无望，就离开了。后来，伯承同志赶到泸州，对起义部队力加整顿。这时

蒋介石已公开反动，他指示四川军阀，一面在重庆布置大屠杀；一面调动军队包围泸州，企图消灭起义部队；而川黔各个地方军阀，为了抢夺泸州这块地盘，凡是能赶得上的，各人都派出一支军队把泸州包围起来。等刘伯承同志赶到后，泸州城已被团团围困了。与此同时，“三·三一”惨案发生。伯承同志一面通电讨伐“三·三一”惨案的祸首刘湘，一面积极布置守城。由于我党在泸州的工作较有基础，所以一经我党发动，广大群众就积极起来支援起义部队。工、农、商、学各界，特别是学生界，积极参战，有的甚至壮烈牺牲。全城军民在刘伯承同志卓越的指挥下，英勇地坚持了四十余天的守城战斗。当整个形势已经不利，而且起义军阀正在酝酿着投降出卖的阴谋时，刘伯承同志便乘机突围而走。接着，所谓起义将领，果然投降敌人，泸州起义就最后失败了。

顺泸起义时我在武汉。起义之初瞿公同志派人来汉口告诉我，顺泸起义已发动，请求国民政府给起义军队以国民革命军番号。我在国民政府会议中，提议按军队序列给顺泸起义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的番号，委刘伯承同志为该军军长。会议通过了我的提议。但别有用心的谭延闿（这时汪精卫不在武汉，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借故推延，说什么需要经过蒋介石，并将此案交给苏联顾问加伦将军顺便带往南昌蒋总部“划行”。这时蒋介石正在与帝国主义勾结，阴谋叛变革命，他怎么能够同意我党建立军队呢？但国民政府会议既已通过，根本不需要经过蒋介石。因此，我们后来就没有理会谭延闿，公开发表了国民政府给顺泸起义军以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和给刘伯承同志的委任，只是军队番号改成了暂编第十五军。

1927年春的革命形势，一方面是革命势力猛烈发展，一方面

革命内部的分化也日益剧烈。在武汉地区，工农运动在我党领导下蓬勃地发展起来；在上海，工人阶级经过前后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取得了胜利；同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六两军又于3月24日攻克南京。但是，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也加紧了，他首先在赣州惨杀了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同志，随后又在九江、安庆捣毁了国民党党部和总工会。英美等帝国主义在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的当天公然出动军舰，炮轰南京，死伤达二千多人。就这样，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相互勾结，同时举起屠刀，对革命展开进攻，天空出现乌云，革命处于危急中。

当时四川的形势也与全国的形势一样。在四川人民反帝反军阀的群众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和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四川军阀虽然大部都已先后易帜，改悬青天白日旗，改称国民革命军，但他们钻进革命阵营的目的，不过是想利用革命旗帜，来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地盘，保存和扩张自己的实力。这批封建军阀，翻云覆雨，奸狡异常，他们既利用革命，又害怕革命，同时更伺机反革命。

当蒋介石在1927年春决心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时候，他派遣爪牙向育仁、戴弁、杨引之等入川，以国民党右派作基础，勾结四川军阀和一切地方上的封建反动势力，准备首先在四川实行反革命屠杀，以配合他整个的反革命计划。于是，四川的时局紧张起来了。

在这种形势下，简公同志主张发动群众，反击反革命的进攻。南京事件发生后，中共重庆地委决定于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反对蒋介石独裁，反对四川军阀卖国（四川军阀刘湘，当时曾以川滇铁路作抵，向帝国主义借款，密订卖国条约），支援北伐战

争,拥护武汉革命政府。在地委会议上,曾经估计到大会可能遭到镇压。但由于对军阀的反革命性认识不足,只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解散大会,至多也不过杀几个人,没有想到会发生大屠杀。因此,在组织上没有作应变准备——去一批,留一批,而是全部骨干一齐出动,结果几乎损失了全部骨干,使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敌人侦知3月31日要召开群众大会的消息,立刻密报蒋介石,蒋随即电覆刘湘,并派卢师谛传达指示,嘱其镇压。接着,敌人就拟定“黑名单”,决定实行屠杀。敌人对这次斗争,先是采取威胁利诱的办法,要闇公同志取消群众运动。3月30日,刘湘指使他的师长罗汉三恫吓闇公同志说:“明天的大会最好不要开,外面部队的大炮已脱去了炮衣。”闇公同志严辞拒绝。当晚,闇公同志有一位在刘湘那里当参谋的亲戚,又派人送信来说:“明日大会将有事故发生,恐对你不利。”又说:“若能不去赴会,军座(指刘湘)定有好音。”闇公同志看完信后,冷笑置之。

不管形势多么险恶,大会还是如期召开。当浩浩荡荡的群众队伍进入会场的时候,发现一些身分不明、行迹可疑的分子混入会场,闇公同志便指挥工人纠察队和童子军把他们劝了出去,以防不测。大会刚要开始,忽然枪声大作,军阀王陵基预伏在会场里面的便衣队和布置在会场周围的武装,里应外合,刀枪并用,对手无寸铁的广大群众,实行有计划的血腥屠杀。一时血流遍地,呼声震天,惨不忍睹,痛不忍闻,当场死难者即达五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著名的重庆“三·三一”惨案。

当会场上枪声四起时,闇公同志正在主席台上。他连忙指挥大家不要惊慌,就地卧倒。后来枪声更密,死伤渐多,会场秩序大乱,已无法指挥,闇公同志才跳城墙而出。他跳出城墙后,

敌人又紧紧追击，由于他机警灵活，设法甩开敌人，才暂时脱险。第二天，闇公同志又冒着极大危险布置好善后工作，然后准备亲自去武汉向中央报告。这时重庆到处密布暗探，尤其是闇公同志住家周围，更是特务如麻。亲友劝他暂避一时，他声泪俱下地说：“敌人虽然万分残暴，一想到同志们死得那样惨，我岂能顾及个人安危啊！”4月2日晚，他动身上船，因发现有便衣跟踪，当夜就退回家中。次日晚，他又化装起程，与他的爱人赵宗楷和另外一位同志，同上亚东轮船，不幸被敌人发觉。第二天黎明，轮船开至江心，特务们借口检查，将闇公同志一行逮捕。闇公同志为了救出那位共产党员，便假装不认识他，故意问道：“我是共产党员，被他们逮捕，你先生又为了什么事情，遭受逮捕？”特务们一听，认为这个同志不是共产党员，就把他释放了。

闇公同志被捕的时候，敌人问他：“你是不是杨闇公？”他面不改色地说：“我是，你们又怎么样？”敌人说：“那你不要干什么共产党了，跟到我们才有命。”他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国民党反动派、反动军阀是什么东西！你们是一伙凶恶的强盗，无耻的卖国贼，是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你们眼看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敌人要把闇公同志和赵宗楷同志分别押走，闇公同志镇定地对宗楷同志说：“你不要害怕和难过，转告同志们，我会斗争到底的。孩子们大了，要他们为我报仇！”

后来，宗楷同志经营救获释，闇公同志则被囚在浮图关蓝文彬军阀司令部。军阀刘湘、王陵基、蓝文彬及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共同审讯他。无论敌人实行威胁利诱，或用严刑拷打，闇公同志都丝毫不为所动，并且痛骂敌人无耻。敌人问他：“你难道不怕死吗？和我们一起干，你的前途还大嘞！”闇公同志回答说：“哼！怕死，只有你们才怕死，也必然快要死无葬身之地。你们

只能砍下我的头，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一句话，我头可断，志不可夺。”敌人用尽一切卑鄙手段，都无法使闇公同志屈服，便于1927年4月6日夜在浮图关把他秘密杀害了。闇公同志临难时还慷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滥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出共产党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伟大崇高的革命气节。

继“三·三一”惨案之后，上海又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事件，蒋介石在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他的南京反动王朝。“三·三一”惨案，是四川地区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场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是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结合全国各地封建军阀和反动地主阶级，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是“四·一二”政变的序幕。

我在武汉听到“三·三一”惨案的消息，极为悲愤。后来得知这次惨案的凶手杨引之，要去向蒋介石报功，我们便派人到宜昌等着他，跟踪他到武汉，然后将他逮捕。当武汉的革命法庭审判杨犯时，我极力主张将他当场正法，但是身为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的徐谦却坚不同意。经过我们力争，最后才把杨犯判处死刑。这个嗜血成性的刽子手终于受到了正义的惩处。消息传出后，人们无不拍手称快。

但是反革命逆流，很快也席卷了武汉。7月，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从此，全国陷入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我们四川许多共产党人，朱德、刘伯承、陈毅等同志和我，都跑到南昌去参加了“八一”起义。

闇公同志在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中英勇地牺牲了。他的牺牲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位多年同甘苦共患难的亲密战友，而

且使党失去了一位坚强的优秀的战士。每念及此，悲痛万分。但是，闇公同志和我党许多先烈的鲜血并没有白流。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仍然继承着烈士们的未竟事业，继续进行顽强的战斗。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不仅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并将为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到底。这是可以告慰于先烈们的。

闇公同志千古！

附注：

- 1, 本文于1962年草就, 因要征求刘伯承、陈毅等同志的意见, 所以未能及时发表。
- 2, 文中有关杨闇公同志本人的引语, 除作者的回忆外, 均引自《杨闇公日记》。

回忆赵世炎同志

赵世炎同志，四川酉阳龙潭人，生于1901年。1904年开始入私塾读书。1914年毕业于龙潭高级小学堂。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他被选为“附中”学生会的干事长，组织和领导了“附中”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在这期间，他先后创办并主编《少年》(半月刊)、《工读》(半月刊)和《平民周刊》等进步刊物，投入了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1917年，我在北京办了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法文专修馆)。世炎同志因受当时民族危机的刺激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急于寻求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便来这个学校学习法文，准备出国留学。1920年5月，他和一些志士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这伙爱国青年，到法国后，正迎着当时汹涌澎湃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潮流，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深入到留法学生和华工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1921年2月，赵世炎和周恩来等同志组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党成立后，他是中共中央驻巴黎的通讯员。1922年，他和周恩来等同志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亦即“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他被选为书记。同年，“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成立，他

是总支部领导人之一，并且是中共法国组的书记。1923年，他到莫斯科入“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并随李大钊等同志列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秋，他回到国内，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和“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他除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进行系统介绍和广泛宣传外，对于北方党的组织建设和工人运动，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赵世炎同志，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引路人。在他出国期间，我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逐步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23年冬，我在成都和杨闇公等同志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后因受军阀迫害离开四川，于1925年初来到北京。这时，原中国青年共产党成员中的童庸生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我说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是按照布尔塞维克的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并且提出了切合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纲领；同时已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高涨。我听了非常兴奋，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认为中国青年共产党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写信回去将它解散。赵世炎同志知道了我的意见以后，十分满意，特来找我谈话，并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这位优秀的学生，这时便成了我的引路人。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革命风暴。赵世炎和李大钊等同志领导着北方的广大群众进行着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和奉、直军阀的斗争，成为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最活跃的人物。他在《政治生活》上，发表了许多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相互勾结的罪恶行为以及指导革命斗争的文章。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支持

奉系军阀攻打国民军，北京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抗议示威游行。赵世炎和李大钊、陈乔年等同志不仅领导了这次运动，而且亲自指挥和参加这次游行。游行队伍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遭到卖国贼段祺瑞的残酷镇压，造成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从此，使全国人民进一步认识了反动军阀的凶残面目，觉悟到必须用武装斗争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从而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到来。“三·一八”后，赵世炎同志代表北方区工会组织，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被调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他到上海后，化名施英，积极开展江浙地区的组织工作和上海市的工人运动，同时，在《响导》上写了许多指导工人斗争的文章，成为上海工人最爱戴的一位领袖。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赵世炎同志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第三次起义时，他和周恩来同志担任总指挥。他们亲临前线，指挥着无比英勇的工人纠察队和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打败了负隅顽抗的反革命武装，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为中国工人运动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27年5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在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世炎同志仍然坚持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和整顿工作。7月2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世炎同志被捕了。在被捕的时候，他利用空隙让夏之栩同志转告王若飞等同志及时迁移，避开了敌人的搜捕。赵世炎同志在枫林桥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拘留所中受尽了各种酷刑，但一切折磨都不能使英雄屈服。最后，在7月19日晨，反革命把他推到枫林桥畔杀害。就在这样严重的时刻，世炎同志在刽子手的大刀面

前,仍然昂首挺胸,高呼革命口号。

赵世炎同志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从他生命里放射出来的光和热,却永远温暖着劳动者和工人阶级的心,永远照耀着革命人民前进的道路。每当春暖花开的时节,上海的人民,尤其是工人们总爱到枫林桥凭吊。他们看着枫林桥畔如海的桃林,想起烈士英雄的事迹,无不肃然起敬。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

(1962年)

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

1935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联盟已开始形成，并在世界许多地区加紧了它们的侵略行动；世界各国人民，也采取了各种形式来抵御法西斯的侵略，一个广泛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阵线正开始形成起来。在国内，日寇继占领我国东北四省以后，又不断对我发动新的侵略，妄图囊括平津、席卷华北，进而占领全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在1935年制造的所谓“华北事件”，其目的即在于此。中国的民族危机至此空前严重。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日寇的新进攻，仍采取臭名昭著的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1935年夏，它与日寇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接着，在日寇新的压迫下，它又准备成立半傀儡性的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想牺牲冀察两省的主权，来满足日本侵略者的胃口。但是，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决不答应，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展开了抗日救亡的斗争。一个新的爱国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

与此同时，红军在突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后，中国共产党于长征途中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新领导，然后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于1935年10月，胜利地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红军到达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对华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日寇侵略所引起的太平洋国际关系和中国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形势，要求我党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联合一切抗日人民和军队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这个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在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关头，“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并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八一宣言”传到国民党统治区以后，得到了各阶层人民广泛的同情，促进了抗日运动的发展。

1935年7月—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一个著名的报告。这次大会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各国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层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以及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就是根据这一新的方针发表的。

我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决定派我到法国巴黎去扩大正在那里出版的《救国报》，以加强反法西斯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1935年10月，我由苏

联动身去法国。

11月初，我秘密地到达巴黎。一到巴黎，我就按着原来的规定，到一家咖啡馆去和约定的同志（曾同过路，彼此认识）接头。外国的咖啡馆和中国的茶馆差不多，只要买点东西，呆上半天，主人也不干涉。这天我到咖啡馆的时候，里面人来人往，十分热闹，我也要了些咖啡、点心，又时而看看书报，以消磨时间，避人耳目。由于我的行动自然，并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但是一直等了四个多钟头，还不见接头的人来。这时咖啡馆里来去的人已变更多次，如果再呆下去，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非常着急。当时我想，来接头的同志怕引人注意也许在门外等候，便慢步出门寻视。不久，远远望见他走来了。在他的示意下，我便跟他走去。我们就这样又接上了关系。接着，我们便开展了工作。但这时，法国政府在中国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忽令《救国报》停刊。为了反抗法国政府这道命令，使报纸继续出版，我去找法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商量，问他们是否可以通过起诉，争取复刊。那时法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很有国际主义精神，对中国革命极力帮助。他们对我说：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次令《救国报》停刊，是法国政府为了外交关系由内阁决定的。起诉无用，抗议也无济于事。并说：好在法国政府自来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把报头的汉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继续出版。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开展，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纷纷来函订报，各方需要很急，而且报纸的纸版要从莫斯科航空寄来，如不赶快设法，很容易使报纸脱期，从而会引起各方面的疑惧。因此，我急电领导请示，建议改称《救国时报》。在得到回示同意后，我们赶忙把莫斯科寄来的纸版改了报头，使报纸一期也不脱，《救国时报》居然在“一二·

九”那天，又继《救国报》而出版了。把汉字报头增加一个“时”字，并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在法文报头上，却如同新出一家报纸似的，法国政府因此也就不再追问。

就在《救国时报》出版那一天，1935年12月9日，国内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北平学生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半傀儡政权的建立，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们突破了反动军警的封锁，不顾大刀水龙的袭击，英勇地走上街头，举行了激昂悲壮的示威游行。由北平学生掀起的抗日高潮，迅速席卷全国，打破了国民党统治区多年来白色恐怖的反动局面，使蒋介石经常夸耀的所谓“安内攘外”的卖国政策一天天地趋于破产。我们在国外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兴奋之情，真非言语所能形容。我们决心加紧工作，办好《救国时报》，希望它能在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还在我从莫斯科赴巴黎之前，为了扩大报纸的规模，我们就决定要在巴黎创办印刷所。那时陈云同志也在莫斯科。由于他和商务印书馆有长期的关系，他特为我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写了一封托买汉字铜模的介绍信。我到巴黎后即把信发出。“一二·九”运动发生后，我们是多么盼望这套铜模赶快到来啊！1936年3月，铜模果然运到了巴黎。经过大家紧张的筹备，印刷所建立起来了。印刷所的建立，不仅避免了由莫斯科航运纸版常因气候关系致使报纸有脱期的危险，而且从此扩大了报纸印刷的规模，解决了国内外所需要的发行数量。

《救国时报》是我党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它从1935年12月9日创刊到1938年2月10日终刊，历时二年余，共出版了152期。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创刊号起，就明确地指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条

件下，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全民族一致对外，建立全民救国的统一战线。它发表了许多论文；刊载了许多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断地报导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情况；并经常揭露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它为推动中国抗战，作了不少工作。此外，它还经常发表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同志的论文、演讲词，不断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这些，对于当时正处在苦难中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中国人民说来，是很大的鼓舞。

因为《救国时报》的言论代表了广大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读者，成为当时国内外同胞特别是进步青年很喜读的报刊之一。它的发行数量增长很快，在创刊时仅销行五千份；不到一年，就增至两万份，而且还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在销行的两万份中，国内约一万余份，不仅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就是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县城内也有它的读者，而且几乎是每份报纸都是许多读者传阅；它在国外的发行范围，遍及四十三个国家，拥有九千六百余订户，欧洲华侨中有它的读者，美洲华侨也很喜欢它，南洋一带和澳洲、非洲、印度等地也都有它的读者。

也正因为《救国时报》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得到国内外广大群众的支持。1936年2月11日，一个新加坡的读者来信说：“这边——马来亚的华侨对于贵报的态度表示很拥护，凡是读过贵报的人，都愤恨日本和一切卖国贼汉奸，而且争先恐后地要先读贵报。记得有一友人带《救国时报》一张往马六甲，该报由侨胞互相传递，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还是不肯放手。

这个事实，正是说明贵报的态度正确。”1936年8月12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总司令杨靖宇同志来信说：“贵报之内容精彩，议论正确，固不必说，而所标出宗旨为‘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正与敝军之宗旨相合。我们的口号也是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只要是抗日救国的，都一致联合起来。正因为如此，故贵报甚得敝军全体士兵的欢迎。我们应该更感谢贵报的，就是你们关于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登载独多，使我们全体士兵看到，抗日杀贼的意志愈益坚决兴奋。”1958年我到哈尔滨参观革命博物馆时，就看到东北抗日联军保存下来的《救国时报》，有些还是烈士们的遗物。据说明员同志说：该报在当时东北抗日联军中广为流传，深受广大官兵热爱，对于他们坚持东北游击战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各地读者不仅在精神上支持我们，而且在经济上也援助我们，例如在有一段时期内，我们收到读者自动汇来的捐款即达六千余法郎，其中有杨靖宇同志和全体将士捐输的，也有国内外同胞捐输的。这些，都给了我们《救国时报》的同志们以很大的鼓舞。

《救国时报》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过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上和发行上的困难。它虽然有《救国报》的资金作基础，也得到各地同胞解囊支援，但因它并非营业组织，收入有限，而各种费用支出颇巨，两者相较，常常不足。虽然同志们节衣缩食，甚至继以典质，即使“罗掘俱穷”，也还是难以为继。因此后来有时不能按期出版，或出版后又无钱付邮。在发行上，由于国内外反动派的检查，报纸常被扣留，订户及代派处往往收不到。那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报刊入口检查最严，我们的报纸往国内发行极不容易。为此，我们不得不想更多的办法。记得1936年初，上海生活书店的一位同志到了巴黎，他手头上有《新生周

刊》的订户名单及住址，那时《新生周刊》已被查封，我们便利用它的订户名单及住址来寄《救国时报》，使我们的报纸得以在国内广为流传。总之，《救国时报》虽然遭遇到许多困难，但由于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援，再加上报社全体人员同心同德地艰苦奋斗，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坚持了两年多的斗争，完成了它所负的光荣的历史使命。

我在巴黎办《救国时报》的时候，为了加强在欧洲各国的中共党员的联系，交换情况和交流工作经验，于1936年1月，在巴黎召开了一次旅欧党员代表会议，到有在英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法国等国工作的党员代表十余人。我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新政策的报告。会议讨论了组织各国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问题，并制订了筹备计划。这些长期散居在国外的同志，由于客观环境很难与党的领导组织联系，而各兄弟党领导他们也有困难，因此，他们的工作不能很好地开展，情绪也有些沉闷。于是，大家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来加强对旅欧各国党员的领导和联系。这个问题虽然未能得到解决，但通过这次会议，大家听了我的报告和讨论了今后的工作，觉得有了党的新政策可以遵循，都非常高兴地返回了各自的工作岗位，生气勃勃地展开了工作，比起从前来总算进了一步。

我在巴黎除了办《救国时报》以外，为了宣传抗日和争取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作了一些其他的工作。1936年春，听说胡汉民到了法国，住在宜斯（法文 nis，地名）海边休养，我想他在国难当头的时期，思想或许有所转变，便派我的儿子（震寰）持函往见，想约他见面，对他谈谈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谁知这位在大革命时代就著名的右派分子，这时仍然顽固不化，见我的信后竟不敢作答。我知其行将就木，已经不可救药了，便没有再

去理他。后来胡愈之等来巴黎，我和他们畅谈，颇为投契。他们要求到苏联，我为他们联系，并代办了入境手续。

1936年3月，世界学生联合会为援助中国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在伦敦召开大会。在这以前不久，曾在比利时首都开过一次国际青年代表大会。在会上，我们的代表为了扩大统一战线，把表面看来似乎左倾一点和比较与我们接近一点的国民党分子王海镜推入大会主席团，谁知这位王海镜后来竟反对我们的代表在会上讲话。鉴于这一教训，我想这次伦敦大会，再不能蹈覆辙，便写信给德国我党支部负责人王炳南同志，力说我们一方面要顾到统一战线，一方面要保持我党的独立性、斗争性，断不能因为统一战线而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并要我们的代表去伦敦后找侯雨民同志好好筹商办法。因时间紧迫，稍缓即要误事，我们又没有预定秘密通讯方法，怎么办呢？考虑到以前几封信都没有失误过，想来这一次也不一定会出问题，便大胆地写了一封指示信，急忙挂号寄出。谁知这时王炳南同志已另调工作，新接任的刘光德（刘咸一）同志又搬了家，他两天后到旧房东那里取得我的信，已被人拆过了。后来，当大会开始的时候，出乎我们代表的意料，国民党特务忽在会场上散发以“民族先锋社”名义影印的我那封信，并大嚷什么大会是共产党所召集和操纵的。他们还以“留德中国学生会”名义致电大会，反对我们的代表出席会议。我们的代表都很惊讶。但是国民党特务这一无理取闹，在我党代表的有力驳斥下，并没有得到多少同情。大会执行主席柯乐满当场驳斥了他们，大会筹备委员会也回信驳斥了他们的来电。这次大会并没有被他们所破坏，终于获得了成功。我们的代表返巴黎后，说起这件事，并把影印的信给我看，果然是我用假名“平洋”写的那封信。我这时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警

惕性还不够高，考虑问题还不够周密，在反动统治下做革命工作，必须随时警惕啊！后来查明，这件事原来是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大使馆的人干的。他们经常派出特务跟踪共产党人，窃取机密。就是他们把我那封信秘密偷去影印后又送回了原处。他们不仅把影印的信在大会会场上散发，而且遍寄国内外，企图以此来挑拨离间，破坏我们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接着，国民党政府驻德大使程天放，就串通德国法西斯组织“冲锋队”对我们施加迫害，逮捕了刘光德同志和反帝同盟的许德瑗等人。为了反抗反动派的迫害，我们发动了许多团体向德国政府抗议，并要求国民党大使馆将人保出。程天放自然是不会答应的，我们对他也并不存在什么幻想，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更加暴露他的嘴脸而已。由于许多团体的抗议，加上德国和国际舆论的谴责，德国政府不得不将许德瑗等释放，但刘光德同志却被无理驱逐出境。这一消息传出后，党组织惟恐我也发生危险，便急电要我返回莫斯科，并派人来接替我的工作。

原来我到法国去是非法居住的，没有居留证，是经不得检查的。刚到巴黎时，报社又被查封，同志们怕有危险，不要我到报馆去，但我每天总要设法去一次。我还常约同志们到咖啡馆商量工作，有时风声很紧，大家都为我担心。当时法共的同志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极力设法掩护我。我一到巴黎，他们就把我送到一个同情分子开的旅馆里，住约十月之久，未出问题。这固然是由于法共同志们和旅馆主人的掩护，同时也由于我自己小心谨慎，举止大方，和自己装扮的身分相称，并注意保守秘密。主人一家因此都很喜欢我。1937年，我再到巴黎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工作时，曾去看他们，并告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抗战胜利有望，他们一家人都非常高兴。直到如今，对于法共同

志们和法国朋友们的帮助，我仍感激不忘。正是由于他们的国际主义的援助，才使《救国时报》胜利出版，并使我胜利地完成了党所交给我的任务。

1936年7月，我把报社的工作交代以后，返回莫斯科，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1962年)

回忆林伯渠同志

伯渠是我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我们同生死、共患难、肩并肩地在一起斗争达半个世纪以上，他的逝世，怎能不使我感到格外伤心！

回想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同盟会随即土崩瓦解。为了继续革命，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鉴于同盟会的教训，孙中山规定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要打手印，要宣誓效忠于他。这时，不独妥协投降的京津同盟会如汪精卫、李石曾之流已脱离他而去，就是坚决反袁的国民党南洋派如黄兴、李烈钧等人也对他表示反对。当然，打脚模手印并不是什么先进的办法，但孙中山在没有学习到无产阶级政党的经验以前，他只能采取这类旧社会秘密结社的办法以谋团结一致。那些出身高贵并已显达的人物既不屑于顺从孙中山，结果只有廖仲凯和伯渠同志等少数人能够识大体，不拘小节，毅然地追随孙中山左右。其实，这里存在着一个原则问题，你是主张志同道合、坚持革命斗争和团结一致、不怕牺牲的战斗呢，还是主张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等虚无主义，或甚至堕落为投机取巧、官僚政客的一时结合呢？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伯渠同志是完全站在革命的正确立场上。

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伯渠同志就是中国首先接受马列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从1918年开始，李

大钊同志就不断给伯渠同志通信，研讨马列主义。到1921年，伯渠同志就参加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由于伯渠同志和孙中山的密切关系，在推动孙中山的思想进步和促成国共合作方面，他起了很大的作用。1921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马麟到桂林和孙中山会晤，就是由李大钊同志写信给伯渠同志从中介绍的。其后凡是孙中山和苏联代表的接谈，都有伯渠同志参与其间。正因为这种关系，所以在1924年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伯渠同志被选为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并担任国民党中央的农民部长。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前夕，我到北京又遇见了伯渠同志。从此以后，由于政治观点和奋斗目标的完全一致，我们之间的战斗友谊就更为深厚了。

当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革命运动高涨、广东省港罢工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时候，我们又在广州见面了。那时的广州充满革命朝气，到处欣欣向荣。我因要急于回四川工作，不能不和伯渠同志分手，但我们的心里都充满无限的热情和希望。

1926年初，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又和伯渠同志在一起工作。本来在这次大会上，我党和国民党左派占着绝对的优势，但由于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我们把领导权白白地放弃了。后来我和伯渠同志谈论及此，总觉非常痛心！这次大会之后，我又匆匆回川工作。不久之后就发生了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和5月15日的“党务整理案”，蒋介石用阴谋诡计篡夺了革命的领导权。

“党务整理案”以后，伯渠同志不能在国民党中央工作了，于是转到第六军去主持政治工作。本来，伯渠同志过去就主张党

要掌握军队，并曾提出过要扩编第六军。现在，他来到第六军，就锐意加以整顿，把弱小的第六军变为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在北伐战争中，第六军曾立下不少的战功，特别是1927年3月攻克南京之役，更使它的威名大震。帝国主义害怕中国革命胜利，它为了诱迫蒋介石投降，就在北伐军攻克南京的当晚，用大炮制造了著名的南京事件。蒋介石凭着帝国主义的援助，屠杀上海工人，成立了南京反革命政府。他为了讨好帝国主义，竟反诬共产党人林祖涵为“宁案要犯”，和各帝国主义一起对伯渠同志实行通缉。

1926年的9月，我又到了广州。何香凝极其伤感地向我谈起蒋介石的专横和不法。我们于是召开了国民党的执监联席会议，通过了提高党权、反对独裁、发展工农运动、二五减租等决议。在这个会议上，我和伯渠等同志对蒋介石的党羽张静江、叶楚傖辈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1927年武汉政府时期，我和伯渠同志的关系更为密切。在这年3月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我们一齐展开了反蒋斗争。会上，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他当选为军委秘书长。我们几乎天天见面，随时用电话磋商。南京攻克后，武汉政府看到蒋介石逆迹更张，决定派伯渠同志到南京去截获蒋介石归案法办。但狡猾的蒋介石从南昌赶赴上海时，并未在南京登岸，这一罪大恶极的叛贼竟未落入人民法网，实在是很大的遗憾！

4月初，武汉政府曾决定派第四军东下去援助南京的二、六两军和刚刚得到解放的上海工人，伯渠同志对此异常兴奋，但机会主义者害怕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因此临时取消了原来的决定。接着，汪精卫和陈独秀于4月5日在上海发表汪陈宣言后，一同到了汉口，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很快地就

被他们断送了。

7月14日的晚上，风声已经很紧了。我深夜还在伯渠同志家里。一会儿，彭泽民来给我们报告了汪精卫当晚召开分共会议的情况，我们知道反革命的浪潮袭来了，决定分别离开汉口。随后，我们都到南昌参加了“八一”起义，我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长，伯渠同志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

南昌起义由于没有去和湘赣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因而于溽暑远征中在潮汕遭到失败。记得在流沙开会决定非军事上必要人员分散活动以后，我即和伯渠同志分别。当时虽遭失败，我们却并不灰心，我们互相鼓励，决定继续斗争，坚持革命到底。伯渠同志是同贺龙同志、刘伯承同志一路到香港的，但我到香港去看他们的时候，却没有见到伯渠同志，因为他是“国际犯”，到香港后立即避居日本，准备经日本再到苏联。我于1927年末与伯承等同志到了莫斯科。

1928年夏，伯渠同志也到了莫斯科，异国重逢，我们是多么感慨而又兴奋啊！随后，我们一同入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研究院，从此我们同吃同住，开始了有趣的学习生活。在研究院的时候，我们两人合写了一篇有关中国土地问题的论文，目的是要驳斥托洛茨基派拉基卡尔说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没有封建主义的胡说。我们每天一齐到列宁图书馆去看书，然后反复讨论，执笔为文。次年2月，为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又入这个学校的特别班学习。这时何叔衡、徐特立等同志也来了，我们几个“老学生”聚在一起，实在难得。在学校，我们不但学到了马列主义的伟大理论，而且参加了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派的实际斗争。我们一直同学到1930年毕业的时候。这段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现在想

起来仍然是津津有味的。

学校毕业后，伯渠同志和我又相继都到海参威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教书。这时，为了在华工中扫除文盲，我们以瞿秋白等人研究的成果作基础，和一些苏联语言学家一起制订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在1931—1932年，我们曾两次召开新文字代表大会，对原方案加以不断的改进。这一方案，对华工的扫盲和普及教育工作，确曾起过良好的作用。伯渠同志为这一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劳动。

伯渠同志于1932年回国。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伯渠同志素来就善于理财，所以他能在财经中发挥卓越的才能。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招致了第五次反围攻的失败，红军不得不开始长征。在长征途中伯渠同志又担负了总供给部长的重任。我虽然没有参加长征，但我对创造人类奇迹的长征英雄特别是象伯渠同志这样的老英雄实在衷心地敬佩！

西安事变以后，伯渠同志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自1937年起，他又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这时他不断往返于西安和延安之间，工作十分忙碌。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利用了过去的国民党的关系特别是和程潜的关系，扩大了党的影响和力量，保护了不少的干部。

1938年我们又在武汉见面了！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又和当年捉拿我们的敌人合作。但是，我们的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已经成熟了。在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的活动中，我们不但要同汪精卫投降派作斗争，而且要同蒋介石顽固派作斗争。伯渠同志在这些斗争中善于正确地运用战略和策略，同时他还向党揭发了右倾投降主义分子的错误。

我1939年回到延安后，和伯渠同志见面的机会又多了。1940年，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由伯渠同志领衔发起了新文字协会。此后，伯渠同志在他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内大力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一时边区的新文字报刊，新文字学校，风起云涌，收到很大的成绩。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后，我们又在一起学习。伯渠同志在整风运动中所表现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非常令人感动。经过整风以后，我们全党更加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和伟大。

当国民党战场1944年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的时候，全国人民更加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这时，伯渠同志在国民参政会的讲坛上，代表党提出了立即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从此联合政府便成为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动内战。当我由重庆撤返延安时，正碰上伯渠等同志在那里动员边区人民迎击胡宗南匪帮的进攻。以后伯渠同志一直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在一起，坚持着艰苦的对敌斗争，直到胜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了一面光辉灿烂的五星红旗。这时伯渠同志荣任中央人民政府的秘书长，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旁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伯渠同志由于积劳成疾，身体渐渐衰弱了，但他仍力疾从公，发奋工作。他曾不断地到广东、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视察，对当地工作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指示。1956年他曾一度病危，后来身体又逐渐好转，今年春天，他还去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大家都为他的

康复而庆幸。后来，他又病了，但并不严重。

我5月初到山西视察以前还看见他很健康。我到山西万荣一带，看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景象。我想回来告诉他，他一定十分高兴，很可能因此而减轻他的宿疾。谁知在回京的途中——郑州，竟听到他逝世的消息！

我五十余年的战友逝世了！但是，他给后辈青年留下一个足资学习的共产党员的榜样。我相信青年同志们定能学习伯渠同志的精神，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精神，继承他的遗志，把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早日在中国实现。

(1960年5月)

南泥湾休养追记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日益暴露。武汉失守后，蒋介石退到峨眉山，采取了消极抗日和积极反共的政策，阴谋消灭中国人民革命力量。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筑了五道封锁线，西起宁夏，东至黄河，绵延一千余里。国民党用来包围边区的部队，经常有七八十万之众。与此同时，蒋介石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械弹粮饷的供给，甚至连外国红十字会捐赠给我们的物资，他也加以扣留。为了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蒋介石竟假“防敌”、“缉私”之美名，设立种种队伍和机关，密布在边区周围的冲要地区。例如1940年以后，国民党组织的所谓“经济游击队”十个大队，国民党政府财政部设在陕甘宁绥区的所谓“货运稽查处”及其分支机构，所谓“运输统制品监察处”及其分支机构，军委会所属的所谓“特检处”以及“航空检查所”等等，名目繁多，难以胜数，但实际上都是用来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的。蒋介石想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不仅禁止军需物资和交通运输、医药卫生器材进入边区，就是棉、粮、油、布以及其他一切日用物品进入边区，也一律遭到禁止。

在国民党团团围困和层层封锁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军民的经济生活曾经发生严重的困难。特别是1940年和1941年，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①

但是，共产党人是不会被人家饿死的，也不会一天停止战斗。毛泽东同志在一次生产动员会上曾经诙谐地说道：“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②于是他向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全体军民发出了伟大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热烈地响应了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积极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这次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健儿用他们的战斗精神，作出了光荣的榜样。特别是边区留守部队，他们实行了屯田政策，生产成绩更大。在屯田运动中，又以王震将军率领下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屯田最为著名。

南泥湾在延安东南一百余里，是延安县金盆区的一个乡，西界鄜（县）、甘（泉）境内洛水与延水的分水岭，北靠临镇川与延水的分水岭，东与金盆湾地区接壤，南迄固临境内黑蛇川与临镇川的分水岭，纵横各八十里，平面达六千四百方里，地区非常广阔。它的中心地区由三道河川构成：南盘龙川自西而东，九龙川自南而北，汇合后称南阳府川，东北流至金盆湾，而后注入临镇川。沿川有肥沃土地一万五千余亩，整个地区，可耕土地达一百余万亩，是一块很适合于垦荒屯田的地方。

1941年春，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一部来到了南泥湾，他

①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二版，八百九十三至八百九十四页。

② 转引自《星火燎原》第六集，四十一至四十二页。

们在朱德总司令和王震旅长的亲自指挥下，立即以战斗姿态，开展垦荒屯田的运动。在英勇的战士们面前，荆棘被斩除了，狼群被赶跑了，荒山被征服了。废弃多年的土地，肥力强大，长出了茁壮的庄稼，用良好的收成来报答人们的辛勤劳动。1941年开荒一万四千余亩，除损耗外，收正粮八百余石，杂粮一百三十余石，蔬菜三十余万斤，还有其他许多经济作物的产品。1942年又开荒二万五千余亩，生产规模更大了。同时还兴办了工厂，开辟了市场。以前杳无人烟的荒野之区，如今竟成了美丽的陕北好江南了。

1942年7月10日，朱德同志约我游南泥湾，同行徐特立、谢觉哉、续范亭诸同志，都是老人，但兴致都很高，和同行的年青人一样朝气蓬勃。这天天气炎热，车行较久，人们觉得口渴，渐有烦躁之感。车子在慢慢地向南驶去，但见森林茂密，古木参天，一阵阵清风吹来，使人格外感到清爽。总司令在他的纪游诗中有这样几句：

行行卅里铺，炎热颇烦躁。
远望树森森，清风生林表。
白浪满青山，绿叶栖黄鸟。
登临万花岭，一览群山小。

这是多么美妙的景致！多么广阔的胸怀！若非身历其境，是无法领会其中意味的。比如“白浪满青山”，那白浪指的是山上的桦树叶，它表面是绿色，背面是白色，被风吹翻动，远远望去，就如同白浪一般。诗是好诗，景也的确是好景呵！

慢慢地走近南泥湾，又是一番景色。半山上一排排的窑洞，是新辟的市场；平川里引水灌田，种上了南方的水稻；恰如总司

令诗中所写：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这天，我们在陶宝峪休息，总司令的诗把当时的情景记述得异常真切：

小憩陶宝峪，清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散步咏晚凉，明月挂树杪。

续范亭是一个性情豪迈的人，很爱作诗，他当时诗兴大发，写了一首《来南泥湾途中》的七言古体诗：

延安纪念七月七，万众同心悲愤结。
初旬已过初伏起，多病之躯正苦热。
南阳胜地好休息，朱公邀我出南郭。
同车三老徐吴谢，男女同志二三十。
三十里铺左转弯，回环公路入沟涧。
汽笛一声马力足，呜呜直上万花山。
万花山上最高巅，南望宜洛西保安。
千山重重日正午，同志采来野杏酸。
口渴既解稍盘桓，万花山中鸟声欢。
下坡复驰三十里，黄杨树下荫草堂。
饥渴幸达目的地，东道欣逢叶季壮。
时值盛夏草木长，晚餐已毕乘晚凉。

有似池鱼入大海，左右逢源空气香。

是的，几天前在延安举行“七七”纪念会的时候，人们对蒋介石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政策都非常愤慨，现在来到这风景清幽的南泥湾，顿觉心旷神怡，舒畅多了。我和续范亭同志由于健康情况较差，便留下在南泥湾休养，其余的同志都先后回了延安。

在南泥湾，我们除看到遍地是庄稼、到处是牛羊的部队屯田外，还参观了他们创设的带有试验性质的农场。在农场的土地上，培育着各色各样的谷物和菜蔬；苗圃里种植着种类繁多的果秧和树苗；至于禽舍和畜圈里，饲养着的尽是一些品种优秀的家禽和牲畜。他们把科学试验和农业生产密切地结合起来了，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方向，值得大大地提倡。

我们的屯垦部队在南泥湾还办了许多工厂，有木工厂、农具厂、肥皂厂、纺织厂、被服厂、布鞋厂、皮革厂、皮鞋厂等等。但最有趣的要算那里的造纸厂了。它利用当地举目皆是的马兰作材料，造出了漂亮的纸张，解决了当时边区最感缺乏的纸张问题。续范亭同志参观了这所工厂以后，曾经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驰车未赴金盆湾，十里先访造纸厂。
厂前流水清且澈，厂屋宏大厂基广。
马兰遍地多材料，自力更生出奇想。
生产劳动真神圣，建设还推共产党。

8月1日，南泥湾的中心南阳府市场举行开幕大会，我去参加了。周围各地军民，都纷纷赶来集会，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万分。朱总司令也亲临参加，并且登台讲话。他讲到边区和敌后军民，正在实行毛主席的号召，努力生产，克服困难，一定能积蓄

反攻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时掌声如雷,“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回旋于山谷中,经久不息。我带着无限兴奋的心情,回去把盛况告诉了续范亭同志。他那天因病未去,开始感到遗憾,但听罢却兴奋异常,不能自己,立即提笔写诗,一挥而就。我记得这首诗的开头两句便是:

南阳八一新市开,各处军民结队来。

真是开门见山,一下就道出了军民赴会的欢乐心情,读了令人感到痛快。这首诗的最后两句也写得很好:

会罢归来迎晚照,山头犹卧白云堆。

多么潇洒的气派,多么深厚的韵味!但不知怎么,我觉得这两句诗里面,似乎把他的无限遗憾之情也包括进去了,不及开头两句那样明快。

看到南阳府新市场那样的繁盛,很自然地便会想到它的过去。这些日子,我住在南泥湾,对它过去的历史情况已经作了初步的考察。抚今追昔,人们总是容易发生感慨的。我这时的心情,也是感慨万端。

原来南泥湾地区,特别是它的中心南阳府,由于土地肥美,一百年前,还是个人烟稠密、相当繁盛的地方。为什么叫南阳府?这名称确实有些奇怪。据续范亭同志解释:“南阳”可能是“南延”一语之转。“阳”、“延”同声,这种说法是有些道理的。但为什么叫“府”呢?我认为这说明了它过去是比较热闹的,绝不是荒凉的区域。它之所以变得荒凉,完全是后来的事情。

从1862年到1873年(清朝同治元年到同治十二年),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的回族人民,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影响

下,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反对清朝政府对回族人民的疯狂屠杀和黑暗统治。这次起义,时间很长,地区很广,斗争也很复杂。开始,西北太平军一部和捻军一部于1862年相继进入陕西,于是陕西、甘肃和青海的回民乘机发动起义。这三股反清武装客观上互相配合,使清朝反动军队穷于应付。当时进攻起义军的刽子手、清朝政府的钦差大臣胜保,就是因为打了败仗,坐困潼关,而被清朝政府“拿讯”和“赐死”的。接着,从1863年至1865年,由于起义军成分复杂,一些混迹在起义军队里面的上层分子,在清军的威胁利诱下,陆续投降了敌人,使起义军遭受到很大的挫折。只有甘肃境内,起义军还很活跃。但是,清朝政府的暴虐政策,不仅激起回族人民继续反抗;而且也逼使它一部分队伍哗变;同时,西北许多被搜括干净,以至无以为生的“饥民”,也相率暴动;至1866年,起义军声威复振,活动范围遍及陕、甘、青各地。1867年,当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清朝政府调其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专门对付西北的捻回起义军。左宗棠是绞杀太平天国革命的著名的汉奸刽子手之一,为人凶残狡诈,他带着大军来到西北,使捻回起义军受到严重的威胁。左宗棠采取了“先捻后回”、“不令捻回合势”的恶毒方针,而捻回起义军由于本身条件的局限性,又未能自觉地合力对敌,因此终被左宗棠各个击破。捻军首先被击败,由陕西退至山西,再退至河北,至1868年最后失败。捻军东去后,回民起义军仍然奋力斗争,取得许多胜利,1870年曾迫使左宗棠坐困平凉,受到清朝皇帝的“严旨斥责”。但是势孤力薄的回民起义军,终究敌不过清军的全力进攻,至1873年,陕西、甘肃、青海的回民起义军,都先后被左宗棠罪恶的血手所扑灭。

在起义过程中和起义失败后,西北回族人民曾遭到残酷的

屠杀。就是左宗棠也不得不这样供认：“陕甘频年兵燹，孑遗仅存，往往百数十里人烟断绝。”南泥湾就是百数十里人烟断绝的地区之一，但这不能笼统地归之于兵燹，这乃是刽子手左宗棠最得意的“剿回”业绩的一桩罪证。从此，南泥湾的沃土上荆棘丛生，狐鼠遍地，以后更长成茂密的森林，变为狼群和鸷鸟的世界。从清朝同治皇帝以至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七八十年来，这里是愈来愈荒僻，除了间有强梁出没之外，杳无人迹，昔日繁盛之区，如今变得这样荒凉，多么可惜啊！

但是，八路军屯田部队来到这里以后，曾几何时，情况就完全改变了。我住在这里，要是不去了解一下过去的历史情况，面对着青山绿水，香稻良田，再到市场上看看那繁荣的景象，怎能相信不久之前，这里还是满目荒凉和一片恐怖的世界呢？这真是古人所说的“沧桑之变”。但这不是发生在东海边，而是发生在西北高原上。不是桑田变沧海、沧海变桑田，而是桑田变荒山、荒山变桑田。而且这种变化不是天然的，而是人工的。而且从今以后，人民作了主人，这里的桑田，只会一天天地更加美好，绝不会再有沧海之变了。

眼看着这么巨大的“沧桑之变”，我怎能不发生感慨？但是我的感慨，和历来的骚人墨客不一样。他们总是向后看，以为今不如昔，从而颂古非今，对现实感到无限的悲哀。而我们共产党人，总是向前看，努力从事今天的战斗，向往未来的光明，我们的感慨，只不过是过去的诅咒而已。而且，我们愈是诅咒过去，就愈加珍惜今天和追求明天，我们的干劲就愈大，因此，我们的感慨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

这种种的感想，触动了我的诗情。既然总司令带头写出了好诗，续范亭和其余诸同志都各有佳作，我似乎也不能不写一

首。但我素来拙于作诗，尤其不善于用诗来抒情和状物，又有些难于下笔。不过，我自小爱读诗，更爱读杜甫的诗，最喜欢他那些记实和叙事的诗作。因此，我特仿杜诗《北征》的体裁，写了一首《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的五言古诗：

三十一年夏，七月有七日；
抗战满五年，寇焰犹未息。
敌后苦坚持，艰难出奇策；
斗争本长期，破贼不须急。
国际新环境，民主结同盟；
时间于我利，全盘韬略精；
今年平德寇，明年歼日兵；
胜利在不远，努力接光明。
军书虽傍午，建国须督促；
举世称朱毛，撑持我大局；
整风健思想，经济求自足；
大敌正当前，团结互忠告。
将军有深谋，战略要兼收；
屯垦复生聚，建国多荇筹。
我闻南泥湾，土地皆肥沃；
风景称绝佳，森林更茂密。
七七纪念后，朱公约我游；
观察一年绩，任务完成否？
汽车出延市，风驰达岭北。
公路新筑成，迤迳登山脊。
四望众山低，殷绿连天碧。

盛夏草木长，大地无空隙。
南有九龙泉，西有万花山；
中心南阳府，东北金盆湾。
良田千万顷，层峦四面环；
青山与绿水，美丽似江南。
纵横百余里，“剿回”成荒地。
七八十年来，一向少人至。
旷野雉兔走，深林虎豹肆。
如此好山河，焉能久弃置？
公率健儿来，荒地次第开。
非徒益军饷，也在育英才。
经营勤计划，佳产试培栽。
川谷多开闢，沟洫导纡回。
平原种嘉禾，斜坡播黄麦。
牛羊遍乡野，鸡犬满家室。
窑洞列山腰，市廛新设立。
农场多新种，工厂好成绩。
四方众来归，群策复群力。
工农各得所，士兵勤学习。
空气常清新，疗养可勿药。
人人称乐土，家家皆足食。
事本在人为，经纶权小试；
他年复国土，都成安乐地。

我的这首诗，不仅辞句未工，而且近乎拖沓，但把当时的事实记下来了，所以我一直把它保存下来。1958年初，《红旗飘

飘》编辑部来信向我索诗稿，我便将它拿去发表。我发表这首诗的目的，不是让青年们来欣赏我的诗句，而是要他们学习“我党同志在艰难困苦中所创造的优良作风”，为此，我还特地附了一封信在后面，说明我的意思。在抄写这首诗的时候，我的一位服务员张同志发觉其中“‘回乱’成荒地”一句不妥。他说：“回乱”虽然打了引号，但说“回乱”成荒地，仍把荒地的责任放到回民身上了，还是不好。我非常赞赏他的意见。于是大家斟酌了一番，才把“‘回乱’成荒地”改成了“‘剿回’成荒地”。虽然只改动一个字，但意思却大不相同了。古人有所谓一字之师，我看张同志就是我一字之师。可见一个人必须随时随地向别人学习，而且活到老、学到老，才能不断取得进步，才能避免发生错误和及时纠正错误。

从1942年7月到10月，我在南泥湾休养了三个月，身体果然好了一些。我离开的时候，正是收获季节。那年南泥湾的收成很好，除损耗外，收细粮六百二十五石，蔬菜一百余万斤，还有其他经济作物产品很多。同时家畜饲养也更加发展，屯田部队平均每五个人有一口猪，而运输队的骡马已经达到六百多匹了。

1943年，屯田部队的生产成绩更大，平均每人耕地十余亩，粮油菜蔬达到全部自给，经常费的自给也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人民群众高兴地称赞说：“他们替咱们减轻了负担，又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真是好军队！”

1943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奖励了领导国民经济建设和国营经济事业成绩卓著的单位和个人。团体奖以三五九旅居首，个人奖以王震旅长为第一名。从此，南泥湾更加名播全国，成为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成为解放区军民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的具体象征。

我住在南泥湾的时间并不长，而离开南泥湾的时间又很久了，但是南泥湾在我头脑中的印象，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薄，恰恰相反，它是愈久而愈鲜明，愈久而愈加显示出它的光辉。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南泥湾景色的美吗？不错，南泥湾的景色是令人难忘的。但是，以我们祖国幅员之广，名山大川之多，哪里没有美丽的风景？但这些地方给我留下的印象，都不及南泥湾那样的深刻。我想，能在我头脑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主要的是南泥湾的精神。南泥湾精神就是发愤图强的精神，自力更生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怕困难的精神，一句话，南泥湾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我们正是凭着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才打败了国内外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现在，当我们要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时候，我们更需要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更需要南泥湾精神。

为了让青年们学习南泥湾精神，需要向他们介绍一些南泥湾的情况；因此，虽然事隔多年，我还是要把我当时的亲身见闻，追记下来。

(1964年)

关于《新华日报》的回忆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一种人民报纸。它是我党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的产物。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起，到1947年2月28日在重庆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停刊止，历时九年多，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始终不渝地坚持着正义的斗争，胜利地完成了党所赋予它的光荣使命。

因为《新华日报》是人民的喉舌，所以它的命运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一样，经常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压制和迫害。但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报馆全体工作人员的英勇斗争和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它在抗日战争时期，高举着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旗帜；在解放战争时期，高举着和平民主和独立解放的旗帜；向渴望真理的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宣传了党的纲领和政策，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破坏抗战、发动内战和出卖民族、残害人民的罪恶活动，推动了我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它在我党的报刊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45年12月，我随周恩来同志前往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不久，党为了更好地领导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决定成立四

川省委会，命我任书记。从此，我和《新华日报》的关系更为直接而密切了。

大家知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便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想用反革命的内战来消灭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为了争取时间，它玩弄了反革命的两手。经过国共谈判和“双十协定”，又经过政协会议和军事调处，到1946年6月，蒋介石在完成了他的内战部署之后，就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对于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我党用革命的两手和他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新华日报》成了我党手中一件有力的武器。当全面内战还未爆发以前，《新华日报》着重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和抨击他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例如1946年1月，当政协会议还在进行的时候，重庆各界人士在沧白堂举行政协代表报告会，国民党特务曾多次到会场捣乱，造成了所谓沧白堂事件；当2月政协闭会后，重庆各界人民在较场口召开庆祝大会，国民党特务更大施暴行，当场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多人，制造了较场口事件。对国民党特务的这些无耻罪行，《新华日报》作了详细的报道，给以无情的抨击。2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大城市导演了一出反苏游行的丑剧，并在重庆捣毁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主同盟的机关报——《民主报》。在敌人的暴力面前，《新华日报》毫不退缩，它一方面对反动派的罪恶活动坚决抗争，一方面对被欺骗的青年大力争取，结果使反动派的阴谋遭到破产；而那些一时被骗的青年，也都慢慢地觉悟过来。伪中央大学曾经参加重庆反苏游行的三十五个学生，事后致函《新华日报》说：“上一次当，学一次乖，阴谋家的嘴脸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另一群学生也给《新华日报》来信说：“我们深信我们的同学们，会因为这次游行而更加觉醒。他们更会密切地关

心时局，认真研究现实，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对于这次暴行，他们是无罪的，他们将会以更大的热情和你们站在一起，来对抗这些反动分子层出不穷的阴谋。”

全面内战开始以后，全国人民都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上面。这时，《新华日报》对解放战争胜利消息的宣传特别注意。例如：1946年7月，解放军在苏中七战七捷，消灭蒋军五万多人；1947年1月，解放军在鲁南枣庄、峄县地区消灭蒋军五万多人；2月，又在鲁中莱芜地区消灭蒋军六万多人。所有这些胜利消息，《新华日报》都设法广为传播，或发号外；或登消息；或者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就登一个启事；办法极灵活，效果也很大。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从这里得到莫大的鼓舞。尤其是把蒋军被俘军官名单在报上公布，并号召其家属和他们通信，更使国民党反动派感到丧气。

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是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它对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起了很好的配合作用。《新华日报》对它的报道极为重视。1946年12月，在北平发生了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暴行，由此引起了全国规模的抗暴运动。在重庆，抗暴运动至1947年2月春节期间达到了高潮。《新华日报》详尽地报道了这一运动，对运动的发展起了指导的作用。

《新华日报》对国民党统治区一切黑暗的现象，无不尽情地加以暴露；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则代他们发出沉痛的呼声。诸如贪官污吏的作弊、特务党棍的横行以及土豪恶霸和保甲长的种种不法行径，都不时被《新华日报》揭露出来。至于征兵征粮和其它各种横征暴敛中的许多丑事奇闻，以及人民为反对这些苛政而进行的各种斗争，《新华日报》也都竭力加以刊载。与此同时，《新华日报》还把解放区的各项建设和人民的幸福生

活，尽可能详细地介绍出来，使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看了，益加对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感到愤慨。

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的觉悟和满足读者学习理论的要求，我们的报馆还出版和发行了一批书籍。如我们自己编辑的《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就曾经广泛的发行。

由于《新华日报》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所以它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并和人民建立了血肉般的联系。有一位读者来信说：“我们虽然未曾见面，但我敢相信，我们中间已在无形中建立起一种不朽的友谊——远超过任何一种，因为我们是在同一目标之下努力着。”远在滇西的一位读者来信说：“为着中国民主的前途，斗争到底。我虽然远在这迤岭滇西，但我们的心的互相联系着的。血腥的统治只能封锁我们的行动言论，而不能封锁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人的心。”我们的报纸，不仅是革命宣传者，而且还起了革命组织者的作用。

《新华日报》象一把尖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上，因此，敌人天天都想拔掉它。还在1946年4月，敌人就借口《新华日报》登了《驳蒋介石》一文，说什么“侮辱了元首”，大肆叫嚷要封闭我们的报馆。后来又想出一个办法，捏造了一些团体，在柳州、开封等地法院控告我们。柳州法院把这一控诉案转到重庆，重庆法院便想借此打击我们。但在我们严词驳斥和律师界朋友的帮助下，重庆法院不得不批出：“查我国法律无侮辱元首之条文。如系毁谤，须本人起诉”。蒋介石怎么好来起诉呢？这个案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全面内战爆发后，反动派对《新华日报》更加痛恨。他们大叫“世界上那有这样的怪事，在打仗的时候，竟允许敌人在自己的区域发宣言、发战报，进行宣传？”想以此作为迫害我们的借

口。接着，他们又制造谣言，说我们要暴动呀，藏有军火呀，并借此派重兵在报馆周围安据点、筑工事，甚至设置机关枪阵地，如临大敌一般。与武力威胁同时，敌人对《新华日报》的稿件更加紧了控制。新华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线的胜利消息不准登，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反饥饿的消息不准登，如此等等。我们有时也作些不损原意的改动，更多的时候根本不理睬，该登的还是照样登。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为了混淆视听，国民党特务机关特地办了许多小报，其中有一个《新华时报》，专与我们唱对台戏，天天谩骂、捣乱。但是，敌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没有损害《新华日报》的声誉，反而更加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缩小《新华日报》的影响，还加紧限制它的发行。为了反抗国民党邮政机关经常扣压和没收我们的报纸，我们早就招收和培养了一批工农出身的报童，把报纸直接送给市内和远郊乡村的订户，并在街上销售。他们虽然经常遭到特务的毒打和特务机关的拘押，但总是早出晚归，不畏艰险、不怕威胁、不受利诱，既坚贞、又机智地去完成光荣的使命。他们那种对工作负责、为读者服务的精神，真是令人钦佩。报馆内部的工作人员和工人同志们，也在编辑、采访和印刷、出版工作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外出时，也常被特务“盯梢”，并有失踪的危险。但他们毫不畏惧，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岗位，英勇顽强地和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为了扩大《新华日报》的影响和争取更广泛的群众支持，我们在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成立九周年的时候，特地举行了纪念会和宴会，举办了展览会和游艺晚会。我们原来邀请的人数很少，但来的人很多，竟达五百多人。来宾中有各民主党派团体代表，有各报馆同业，有工程师和教授，有戏剧家、小说家和

诗人,有地方名流士绅,也有工人、学生、妇女和儿童,一时少长咸集,盛况空前。他们和我们一起共度报庆,感情极为融洽。在我们收到并在报纸上登出的许多题词中,既有我党中央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也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沈钧儒、邓初民等人的。他们的题词给了我们很大的鞭策和鼓舞。我当时也曾题词:“千万人民的正义呼声,胜过独裁者的百万雄兵。”我相信人民的报纸确实有这样的威力。为我们举行九周年报庆,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恼怒,大叫什么“究竟重庆是谁管?真是无法无天了!”是的,我们就是无法无天,我们既不承认国民党的法,也不承认国民党的天,我们只承认人民的法和人民的天,而且我们坚信:重庆迟早也要实行人民的法,变成人民的天。

随着时局的发展,蒋介石更加肆无忌惮,倒行逆施。1946年11月,反动的伪“国大”在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和唾骂声中召开。此后,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如《中央日报》、《扫荡报》等,更加紧了对我们的诽谤,直到公开称我们为“共匪”。我们已经预感到报纸有被封闭、人员有被驱逐甚至被消灭的危险了。但我们大家坚定沉着,决心斗争到底,除非有党中央的命令,誓不离开自己的岗位。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我们早已作了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此以前,我们已经疏散了一批同志,并对留下的同志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为了坚定同志们的信心,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我给同志们讲过许多次的课。除了讲时局、讲革命前途和我党斗争历史以及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外,我还讲了历史上许多英雄人物以及我党许多先烈英勇斗争、慷慨就义的故事,同志们听了很受感动。经过党的政治思想教育,省委和报馆的同志们,都立志象在战场上一样,准备流血,准备牺牲,并且准备了被捕以后的斗争计划,大家都信心百倍地迎

接最残酷的斗争。

果然不出所料，1947年2月28日早晨三时许，国民党军警一连多人，突然包围了我们的住处——曾家岩23号。接着破门而入，进行搜查和抢劫，并拘禁了所有工作人员，对我则专派军警住在房内加以监视。我领导同志们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时我估计到乡下红岩的《新华日报》馆也一定同时被包围、抢劫和拘禁。我对同志们的斗争精神是放心的，但对同志们的安全却十分挂念。我用电话联系，电线已被切断；派人联系，又已失去自由。第二天伪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到我处，我除向他抗议外，要求与报社负责人见面。直到3月2日，报社负责同志才在宪兵特务的监视下，前来向我汇报。他们刚要说话，一个特务就气势汹汹地说：“只许讲四十五分钟！”我严厉地质问他：“为什么？我们不是囚犯，难道连讲话的自由都没有了吗？我准备讲三个钟头……。”那个特务也就不敢作声了。从报社负责同志的汇报中我才知道：伪重庆警备司令部命令《新华日报》在2月27日夜12时前停止一切活动，同时以两团兵力包围了报馆，并实行戒严。他们当夜就想进城向我汇报，但刚出大门就被宪兵特务扣留了。

我报馆的同志接到伪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后，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然后便埋藏了收发报机，烧毁了秘密文件，并计划如果敌人实行武装袭击，就拣起凡是当作武器的东西，坚决地自卫抵抗。说也奇怪，敌人夜间包围了报馆，却一直到拂晓才敢进门。原来他们根据谍报人员的“真实情报”，说我们报馆内藏有许多武器，有机枪、手榴弹和驳壳枪，并且修筑了防御工事，怕我们抵抗，才不敢冒进。真是活见鬼，我们的确有枪，也有手榴弹，但都不是真的，只不过是同志们作体操用的

一些木制品罢了。据说为这件事，伪警备司令部还把谍报人员臭骂了一顿。

敌人闯进报馆办公室和宿舍以后，把所有人员统统集中看管起来，并以“机枪点名”、“活埋”、“关集中营”等相威胁；威胁不成，又转而利诱，说什么愿回家者可发路费和安家费。同志们的回答是：“收起你们那一套吧！我们是不会上当的！”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同志们意志坚定，镇静如常，仍然照旧学习、做操、表演秧歌舞，高声歌唱。同志们这种临危不惧的精神，不仅感动了报馆周围的群众，有些国民党士兵也受了感动，有的甚至感动得流泪。

我听过报社负责同志的汇报后，对同志们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表示满意。随后我说：“国民党这次暴行，是它要最后关死和谈之门，决心内战到底。我们要保持共产党员的人格，不怕牺牲。我们三百八十个人要团结得象钢铁一样，不怕任何压力。我们牺牲一个人，会有一万个人来代替……。”当我们的谈话结束，报社负责同志临走时，我又再一次要他们回去转告同志们：“要团结得象钢铁一样”。他们大声回答：“我们一定不怕！”是的，他们不仅没有怕，而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的人格和尊严。他们不愧为党的好儿女！

由于我们的坚决斗争，又由于我们的报纸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国民党不敢承认以武力驱逐我们。孙元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共人员撤退，中共党报当然无人办理了。还说什么要“护送”我们回延安。这时，我感到没有自己的报纸，无法揭露事实真象，真是痛苦，我更加感到报纸的重要性。

3月1日，收到董必武同志来电话，将有飞机把我们送回延安。经过一番斗争和交涉，我们在重庆的全部人员，终于在3月

8日和9日，先后胜利返回延安。接着同志们又奔赴人民解放战争的前线，踏上了新的战斗途程。

当我们被迫离开重庆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一个信念：“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果然，相隔只有两年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就取得胜利，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西南，而《新华日报》又在解放了的重庆复刊，在人民的天下和党的阳光下，开始执行它新的历史使命。

(1962年)

美蒋和平阴谋的破产

还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帝国主义即加紧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妄图在战后代替日本的地位，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蒋介石依靠了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不积极准备力量，以反攻日寇，收复国土；却处心积虑地在那里布置阴谋，准备内战，坐待胜利到来之时，好从峨眉山上杀下来，一举把共产党、解放军消灭，以恢复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动统治。对于蒋介石的反动阴谋，中国共产党早已洞若观火。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即曾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在苏联红军的坚强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被迫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经过八年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中国人民，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该是多么的兴奋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却一面下令解放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许解放军进行反攻、收复失地；一面又令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以待蒋党去“接收”。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行蒋日合作与蒋伪合流，其目的不但要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而且还想进一步从根本上把中国共产党

和它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加以消灭。

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在抗战胜利的时候，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解放区已经拥有一亿以上的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一百万人，并有民兵二百多万；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一百数十万党员的大党，而且政治上已经成熟，它完全能领导全国人民，越过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针对着蒋介石国民党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毛泽东同志于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们一方面要力争和平，反对内战；一方面又要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作充分的准备。就是说，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方针，而这时国内人民和国际舆论又都反对蒋介石进行内战，同时蒋介石也觉得他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还需要一些时间，以便把更大量的军队运到内战前线去，因此他决定要玩弄一次和平阴谋。于是，这个靠内战起家、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居然装扮成和平妖怪，竟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一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和平”。这分明是要的鬼把戏，应不应该理它呢？毛泽东同志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恰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因此，毛泽东同志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决定飞往重

庆。听说毛主席要去重庆，延安的广大军民都非常担心。因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鸿门宴”之类的故事，而蒋介石对待李济深、胡汉民等人的流氓手段^①，人们记忆犹新，人们为毛主席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认为有强大的人民力量特别是解放区的力量作后盾，蒋介石是难于重演南京汤山的旧戏的。就在毛泽东同志快要起身的时候，戴老（范文澜同志的爱人）还赶来对我说：“请告诉毛主席，我们劝他千万别去呀！”在临上飞机的一刻，我转告了范老夫妇的意见，毛泽东同志笑了一笑，说道：“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就这样，毛泽东同志于8月28日下午，由周恩来、王若飞等同志伴随，在千万人民的欢呼声中，到达了重庆。

毛泽东同志的降临，使重庆整个山城为之沸腾，使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都充满了希望。无数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热烈地欢迎毛主席，把毛主席称为中国人民的救星。许多人为此感动得流泪。柳亚子兴奋地写出了他新的诗章^②。善良的人们是如此渴望和平，他们哪里知道蒋介石的葫芦里装的完全是“和平”的假药。

毛泽东同志的到达重庆，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由于他事前对谈判毫无准备，所以我们的代表一去，就把他弄得手忙脚乱，在政治上完全陷于被动。蒋介石虽然派了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为代表来和我党的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志进行会

^① 1929年蒋桂军阀战争前夕，蒋介石扣押李济深于南京之汤山。1931年因所谓“约法”问题的争执，胡汉民亦在汤山遭蒋软禁。

^② 柳亚子的诗写道：“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谈，但他们对谈判并无诚意，只不过成天地虚与委蛇，一切的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他们只是消极地应付而已。而且，就在毛泽东同志飞抵重庆的第二天（8月29日），蒋介石就密令各战区印发他在1933年所编写的罪恶手册——“剿匪手本”。9月17日，蒋介石又密令送发这些手本（密令和手本均被我缴获）。同时，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对我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地区的进攻，也在9月间就开始了。

经过四十多天严肃的谈判斗争，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形势，不得不在表面上接受我党提出的和平团结的方针，不得不虚伪地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平等合法地位、严禁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民主的地方自治、改革和裁减全国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等主张。所有这些，都写在国共两党代表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面。这有什么好处呢？毛泽东同志说：“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为了争取和平，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间人士的同情，以击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污蔑，我党在谈判中也作了一些必要的让步。我们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八个解放区；同意按比例缩编我们的军队，如果国民党真的肯把它的军队缩编为一百二十个师的话，那末我们可以把解放军缩编为二十个师，只占全国军队的七分之一。但是，国民党的目的是要根本消灭解放区和解放军，因此关于解放区政权和军队的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协议。重庆谈判的经验再次证明，政权和军队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因而成

为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焦点。谁如果忘记了这一条，谁就要犯严重的错误。

由上可见，我党在谈判中虽然作了一些让步，但这些让步都是有原则的，并无损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我党则不惧任何威胁，始终坚定不移，毫不退让。而且，在谈判期间，我们丝毫没有放松警惕，我们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作了必要的准备。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我们决定要把南方的一些部队调往北方，这样既可巩固北方的解放区；又可使这些部队在内战一旦发生后，不致孤悬敌后，被人吃掉；同时对谈判也有好处。这个意见在征得毛泽东同志的同意后实行了。这时，我们在解放区尤其是新解放区正放手发动群众，由反奸反霸而减租清算，群众运动在轰轰烈烈地开展，有的地方，农民甚至自发地起来解决土地问题。这样，自日本投降后，解放区不但迅速地扩大了，而且从根本上巩固起来了。正因为我们一方面参加和谈，一方面又准备自卫，我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双十协定”虽然签订了，但蒋介石丝毫不打算遵守。“双十协定”于10月12日公布，13日蒋介石就对其部下颁发了“剿匪”密令，命令他的将领，要遵照他所订的所谓“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对解放区“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这就是说，他已下令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但是，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在解放区军民英勇的反击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1945年10月中旬，进攻我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国民党军三万余人被我军全部歼灭，连其指挥官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许多高级将领皆被我军俘虏。这就是著名的上党战役。10月底，我军在规模更大的平汉战役中，在邯郸地区消灭了沿平汉线进犯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七万余人，其高

级将领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八军军长高树勋于战场举行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等人则被迫放下武器。

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也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高涨。1945年11月19日，重庆各界成立了反对内战联合会。25日，昆明举行了盛大的反内战集会，由于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横暴干涉，激起了昆明数万学生的总罢课。至12月1日，便发生了举世轰动的“一二·一”惨案。接着，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为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中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坚决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改换其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法。1945年11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调回其臭名昭著的驻华大使赫尔利，另派马歇尔以特使名义来华“调停”中国内战。很显然，美帝国主义妄图亲自出马，指挥着蒋介石国民党来共同串演一出“和平”的活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12月于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上，美国才同意了苏联一再坚持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重申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由于上述三方面的原因，即解放区军民自卫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运动的高涨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特别是由于第一方面的原因，蒋介石才被迫同意召开“双十协定”中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

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和我，共七人。这时董必武同志已在重庆。（叶剑英同志后来参加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由秦邦宪同志代替他为政协代表。）我们在周恩来同志的率领下，于12月16

日飞赴重庆。重庆，这个我曾经生活和斗争过多年的故乡城市，却一直呻吟在黑暗的反动统治之下，如今我又从革命的圣地延安归来，我到达重庆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慨。

我们到重庆后，即向国民党提出：必须在政协开会之前，实行无条件停战。国民党在当时军事政治都处于不利的情况下，被迫同意了我们的主张。1946年1月10日，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同时下达了停战的命令，并规定这一命令于13日起生效。但是，蒋介石在停战令公布之前，却先向他的军队发出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密令，这就清楚地证明了蒋介石绝不肯真心停止内战，只不过是利用停战来作为其进行内战的烟幕罢了。

与发布停战令的同时，政治协商会议也于1月10日开幕。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代表共三十八人，其中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主同盟九人、青年党五人、无党派人士九人。它的成分极为复杂，大致说来，可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左派即革命派，以共产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主张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右派即反动派，以国民党为代表，它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坚持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中间派主要地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幻想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旧民主主义，民主同盟基本上属于中间派。这时的青年党已公开脱离民主同盟，成了国民党的附庸；民社党虽然表面上还留在民盟里面，实际上也属于右派的势力。在无党派人士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而以中间派居多数。我们的方针是争取团结中间派以便和反动派进行斗争。

这次会议前后共历时二十二天，开了十次全体会议和许多次分组会议。（分组会有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

会和宪法草案等五个组，我参加的是宪法草案组。)无论在全体会议上和分组会议里，都充满了斗争。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军队问题和政权问题，即所谓军队国家化和国家民主化的问题。

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仆从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说什么必须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企图以“民主”作钓饵，来勾去人民的军队。针对着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党指出：要想实行军队国家化，必须首先实行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即是说要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变为民主的国家，要把蒋介石私人军阀的军队变为人民的军队。在这两条原则的尖锐斗争中，有些中间派人士居然想走“第三条道路”，他们幻想国共双方都交出军队，由他们来代表“国家”加以接收。但是，天地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他们的幻想终于落了空。

关于国家民主化的问题，争论也是一样的激烈。国民党既不愿在当时把它的独裁政府改组为民主联合政府，只希望以扩大几个政府委员之类的办法来搪塞全国人民的压力；也不愿在以后实行真正的民主与宪政，只想在旧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和所谓“五五宪草”的基础上，作点换汤不换药的改变；不仅如此，它甚至妄图在“统一国家主权”的名义下，把解放区一口吞掉。针对着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我党一方面坚持要实行地方自治，各省民选省长，自制省宪，以此来保障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则要求把国民党反动政府改组为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并且要在它的领导之下，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以此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个问题上，中间派人士注意的中心是政府委员的分配以及什么总统制、内阁制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争的是旧民主主义和个人的地位，并不是新民主主

义和人民的利益。

经过一场尖锐的斗争，政治协商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项决议案。这些决议虽然离我党的要求还很远，但却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政协会议的召开和政协决议的公布，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欢欣鼓舞，不少的人都以为中国从此即将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其实蒋介石只不过是利用政协来进行和平欺骗，以配合他这时正在那里进行的全国规模的内战准备。

对于蒋介石的一切，我党从来不抱任何幻想。蒋介石曾在政协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了所谓给人民自由权利、各党派平等合法、推行地方自治和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在要求国民党释放我们被捕同志的时候，我们曾反复考虑，是开出一大堆的名单好呢，还是只提出个别的同志？我们估计到国民党的反动性，认为把某些同志提出来，不仅不能使他们得救，甚至反而会引起国民党对这些同志的注意，增加他们的危险。因此，我们最后只提出了廖承志和叶挺两位同志。此外，我们还提出要释放张学良将军。果然不出所料，国民党虽然惧于全国的舆论和我党的力量，不得不把廖承志同志和叶挺同志放了出来，而对其他同志则一个也不放。甚至连张学良将军（虽然当时各界人士都提出了释放张学良的要求），它也不肯释放。所谓释放政治犯，原来是一个骗局。

还在政协会议开会期间，国民党特务就开始了的对政协的破坏活动，沧白堂事件^①和搜查民盟代表黄炎培住宅的事件都是

^① 政治协商会议进行期间，重庆各界人士每晚在沧白堂集会，听取政协代表报告开会情况，国民党特务曾多次捣乱会场，人们称为沧白堂事件。

在这时发生的。而当政协会议闭幕后，2月10日，重庆各界人民正兴高采烈地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的大会时，国民党特务却大打出手，在会场上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余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较场口事件。接着，22日国民党反动派又无耻地在重庆制造反苏游行，组织特务流氓捣毁了我《新华日报》营业部，并把我们的工作人员杨黎原等同志打得遍体鳞伤。与此同时，民盟机关报——《民主报》的营业部也遭到特务们的捣毁。类似的挑衅事件，一时曾遍及国民党统治区。所有这些，都证明国民党已蓄意撕毁政协决议。果然，在3月上半月召开的国民党的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就公开声明，对政协决议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就是说要从根本上加以修改和撕毁。3月下旬至4月初，国民党又召开了它御用的国民参政会的四届二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又长又臭的演说，大弹其反动透顶的法西斯的法统论之老调，表示要坚决撕毁政协决议和3月27日刚订立的东北停战协议。至此，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了。

蒋介石这一套阴谋诡计，都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导演下进行的。美帝国主义一面用各种方法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特别是用海军把大量的国民党军运到了内战前线；一面却装作“和事佬”来进行“调处”。马歇尔一开始就只主张在关内停战，不主张关外也停战，他和蒋介石一样，妄图让国民党军占领东北后，再集中力量到关内来消灭我们。当时设立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它派出的执行小组，虽然是由美、蒋和我们三方面组成的，但美国人总是站在蒋介石方面，拿“调处”来为蒋介石的军事服务。哪里对国民党的军事不利，执行小组就被派到那里去，以阻止我军的前进，和挽救国民党军的失败；而当国民党军发动进攻时，

执行部却任意不理，或借故拖延，不去调处，以便让国民党军放手进攻，取得某些军事上的便宜。美帝国主义的这套把戏，一时确曾欺骗了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所谓中间人士，但到后来，它的马脚就逐渐露出来了。

对于美、蒋的阴谋，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和它们进行谈判，一方面又不断揭露它们的阴谋。例如对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演说，我们《解放日报》就发表了著名的社论——“驳蒋介石”，彻底地揭穿了他恶毒的阴谋，狠狠地打击了他疯狂的气焰，把他驳得体无完肤。但是，更重要的，还在于壮大我们解放区的力量。这时，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我们已放手让农民去解决土地问题，为此，我党中央曾于5月4日发布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指示”。在群众发动的基础上，解放军的实力得到很大的发展和巩固。

我们虽然主要地依靠解放区的力量，但同时绝不放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由于国民党政府要“还都”南京，我们的代表团也必须迁移，我党决定把四川省委公开出来，以便进行统战工作和对国民党作斗争。4月30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最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省委会，介绍我和王维舟同志是省委的正副书记。周恩来和董老等同志离开重庆后，没有他们的直接领导，我们更感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了，但是，我们省委的全体同志都很有信心，愿意兢兢业业地去完成党所交付的光荣任务。

省委一经公开，我和王维舟同志即四处活动，争取在事实上得到合法的地位。5月19日，冯玉祥在重庆北碚召开了一个张自忠殉国的纪念会，我们故意用省委的名义送了一副挽联，写道：“已使日寇灭亡，忠魂可慰；再令生灵涂炭，民命何堪？”由于

这副挽联被放在灵堂中最显著的地方，而各报纸又纷纷加以报道，因此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打电报问国民党中央：“为什么允许他们公开？”国民党中央令其重庆行营查复。这时，行营主任张群不在，国民党重庆市长代行营主任张笃伦跑来找我，他说：“你们公开，我是知道的，但手续不周到……你看该如何电复中央呢？”他言词中有责难之意。我于是立即向他指出：“第一，蒋介石在政协开幕时答应的四项诺言中，有各党派平等合法的一条，我们的公开是有根据的；第二，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的政党，我们在这里有办事处，有报馆，有党员就应有党的组织；……我们的理由是很充足的。”张笃伦无法，只好说：“我就这样回复中央吧。”经过这一番压迫无效之后，事实上，我党的公开，国民党官方已被迫承认了。

但是，这时的情况已十分紧张。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已侵占我东北的四平街、长春和永吉。而且它对我中原解放军的大举进攻，也如箭在弦上，即将开始。我们办事处的门前屋后，这时也是军警林立，岗哨如麻。而且国民党的报纸天天造谣：或说王维舟同志已到川北搞武装，或说我们要在重庆搞暴动，企图以此为借口来搞我们。我们沉着地应付了这种局面，我对张笃伦说：“请你们注意，我们是不会在这里搞暴动的，但他们（指特务）如果要搞我们，那末，对地方上是很不利的。”重庆国民党各机关为此曾开会讨论，有人主张搞我们，张笃伦考虑到自己的利害，说道：“没有中央的命令，不能搞。”就这样，我们暂时地度过了这场风险。

为了便于应付更为困难的环境，经过审慎的研究，我们决定王维舟同志撤走，同时还疏散一大部分同志。王维舟同志在重庆，他们害怕；王维舟同志要走，他们又故意为难，不给飞机票；

国民党反动派就是这样的毫无道理。为此，我去找张群，张群是国民党反动派政学系的首脑之一，我很早就认识他，他为人极其圆滑。我一提出要求，他立即答应第二天送来飞机票。张群的说话很有意思，他说：“王是搞军事的，他不走，大家不放心。你倒不要紧。”张群在无意中说出了真心话。啊！原来反动派害怕的就是武装斗争。好，让我们在战场上狠狠地教训他们吧。

到6月间，时局更加恶化了。美帝国主义在这时提出了所谓“军事援华法案”。国民党反动派则向我们提出五项荒谬的要求，这五项要求，就是要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下列各地：一、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二、胶济线全线；三、承德和承德以南的地区；四、东北的大部分；五、1946年6月7日以后解放区人民武装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强迫我们屈服。而且在谈判过程中，蒋介石竟提议把国共谈判的最后决定权交给马歇尔。对于这些狂妄的要求和无耻的建议，我党表示坚决的拒绝。6月22日，毛主席发表了反对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声明。美、蒋看到它们的威胁手段和欺诈伎俩都无从得售，于是蒋介石摘下面具，于6月26日大举围攻我中原解放军，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内战；而马歇尔也宣告他的“调停”失败，让蒋介石放手来打我们，露出了他的帝国主义者的原形。7月12日，国民党军五十万人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的八百里战线上对我苏皖解放区展开进攻。至此，全面内战爆发了。

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加紧干涉中国内政和蒋介石的扩大内战，全国人民异常愤慨。6月23日，上海工人、学生及其他各界人民十万余人对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并推出马叙伦等十人为代表赴南京请愿。马叙伦等人行抵下关车站时，遭到

了特务匪徒们的殴辱，多人受伤，造成了“下关惨案”。这时，我们在重庆也发动了一个反内战的签名运动，这一运动，极其广泛，包括各界著名人士在内，参加签名者达三千余人。实业界、银行界的签名也很踊跃。宗教界也卷入了运动，佛教会为此做了三天道场，回教、天主教、基督教也都做了和平祈祷。

于是，蒋介石加紧了他对民主运动的镇压。7月11日和15日，民盟领袖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先后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消息传来，人们不胜悲愤。一时重庆的政治空气极为紧张，有些民主人士感到恐怖。为了打击国民党的反动气焰、稳住我们在重庆的革命阵脚，我们决定筹备一个盛大的追悼会，以鼓舞士气，振奋人心。但是，由谁来发起呢？如果由我们发起，参加的人很难广泛。就是民主人士发起，也有许多人不敢参加。正在踌躇之际，恰好张群到重庆来了。由于国民党内部的重重矛盾，张对特务系统有所不满，因此蒋介石要他去昆明查讯李闻案件，他却拖延不去。而且这时重庆的国民党部和三青团之间正闹内讧，它们对外的力量并不集中。我们正好利用这种情况来开展工作，于是决定拉张群来领衔筹备追悼会。经过邓初民、史良和鲜特生到张群那里去反复劝说，张为了装点面子，借此捞点政治资本，同意了领衔发启并作大会主席。这样，参加的人就多了。28日，盛大的追悼会按计划举行。人们看见有张群、胡子昂等人参加，而且由张群主席，顿时自由了一些。会上，张群、邓初民、史良等人和我都讲了话。胡子昂在讲话中三呼要和平，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而且，由于讲演的人们又一再提及陶行知日前（25日）在上海因愤激而死的消息，使全场的情绪更加悲愤。随后，我们又开陶行知的追悼会。这样，就把重庆的革命空气提高了。

由于我军采取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我军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所以在战争初期，国民党军还能以极其惨重的代价（例如头三个月它即损失了二十五个旅的兵力），暂时换得侵占我解放区一些城市和地方的表面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却使蒋介石的头脑发昏，他竟不顾我党的严重警告，于10月初猛力进攻我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张家口。11日，我军自张家口撤出，疯狂达于极点的蒋介石于当日下午即下令召集违背政协决议的独裁的伪国民大会。其实，侵占张家口已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顶点，这一“胜利”正是它失败的开始，从此以后，它的攻势即逐渐下降，而且我军很快即将它的所谓全面进攻粉碎了。

为了召开伪国大，国民党不惜用高官厚禄和大量金钱来对中间人士进行收买。于是，那些醉心于利禄的官僚政客和无耻文人，一个个都脱下了“中间”的伪装，现出了反动的原形。而且也确有一些中间人士，在国民党的利诱特别是在它的威胁之下发生过动摇。青年党就不用说了，那批逐臭的狮子狗^①为了争着当国民党政府的部长和委员，真是丑态毕露，出尽洋相，因而受到全国人民的唾骂。民社党这时也暴露了它的封建官僚和洋奴买办的本性，张君勱彻底地自我出卖了，被人呼为“张君卖”。而所谓社会贤达的王云五、傅斯年、胡霖等人，也跳入了国民党的火坑。至于美帝国主义所豢养的胡适之流，则早已做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②。这时，罗隆基、范朴斋等“中间人士”也大肆喧嚷，说什么中间派必须对双方都骂，不宜左袒。范朴斋这人很讨

^① 青年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出版的机关刊物叫《醒狮》，所以人们把它的党徒称为狮子狗。

^② 胡适为了表明自己的反动决心，曾说：“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拚命向前。”

厌，成天在张澜那里挑拨我党和民盟的关系。但是，由于全国人民都一致反对伪国大，把它视同猪仔国会，因此，民主同盟和绝大多数怀有正义的中间人士，都接受了我党的劝告，终于和人民站在一起，拒绝去出席伪国大。民盟主席张澜是我的旧友，他自8月18日在成都举行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上被特务分子殴打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益增不满。10月初，他来到重庆，住在“民主之家”。（即鲜特生的住所“解园”，当时为民主人士经常聚会之处，被称为“民主之家”。）从此我们经常见面，关系十分密切，而这时范朴斋又到上海去了，他更容易接受我们的意见。伪国大开会前夕，无党派人士邵从恩来到重庆，想去南京。他对我说，他到南京去不是出席伪国大，而是要“说服”蒋介石恢复谈判。我劝他别去，他正犹豫，张澜故意说：“要去我们同路。”就这样，我们把他留住了。

11月15日，在举世咒骂声中，蒋介石悍然宣布伪国大开幕。参加伪国大的尽是狐群狗党和无耻之徒，连美帝国主义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也不得不说“听蒋主席报告的都是反动分子”。就是这批反动的猪仔，居然通过了一部遗臭万年的伪宪法。12月28日，我党郑重地声明：蒋记国大和它制订的蒋记宪法均属非法与无效。同时，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全国许多人民团体都先后声明绝不承认伪宪法。于是，国民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扮演出来的伪国大，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嘲笑，而他所装模作样地通过的伪宪法，在全国人民眼里也一文不值。蒋介石本来想利用伪国大来孤立我们，但现在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孤立起来了。

蒋介石一面加紧反对人民，一面又加紧进行卖国。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前所未有的卖国条约——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一条约较之袁世凯、段祺瑞以至汪精卫所订的卖国条约，均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的驻美大使、著名的卖国外交家顾维钧曾经无耻地声明：“按照中美商约，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根据中美商约以及其后的一系列协定，美帝国主义已经从蒋介石手中把中国的许多根本主权席卷而去。美帝国主义既然这样毫无忌惮地干涉中国的内政和侵略中国的主权，那末，它的伪善面具很自然地就要被揭穿，一个强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一定要兴起的。果然，到12月下旬，圣诞节前夕，由于美军在北平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暴行，终于引起了从北平开始的包括各地城市的全国规模的“抗暴运动。”从此，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又走向新的高潮。蒋介石不仅在前方碰到了英勇无比的解放区军民的坚强战线，而且在他的后方，又出现了一条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的强大战线，蒋介石已逐渐陷入全民的包围中，再也无法逃脱其死亡的命运。

面对着中国人民强大的反美运动，美帝国主义感到它的一切阴谋诡计已再难得逞，于是，马歇尔在政协会议周年前夕，即1947年的1月7日，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回了美国。他虽然在离华之前，还发表了一通颠倒黑白的声明，但已经觉悟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是花言巧语所能欺骗的了。一年间的变化是多么巨大啊！

反对美军暴行的运动，在重庆搞得特别激烈。当北平美军强奸暴行的消息传到重庆的时候，重庆的学生无不切齿痛恨。他们满怀愤怒，立即行动起来。这时正值国民党的党徒们在庆祝伪宪的颁布，他们沉浸在狂欢中。因此，1947年1月6日，我们顺利地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一万五千余人的游行示威。由

于这次运动的声势浩大，国民党不敢轻易实行镇压，所以运动延续的时间很长，一直到旧历元宵节，还举行了一次反对美军暴行的宣传周。在宣传活动中，学生们巧妙地利用了“车车灯”这种民间形式，把美蒋勾结的丑态表演的维妙维肖，淋漓尽致，老百姓看了都感到非常痛快，而特务们则感到非常窘迫。于是他们恼羞成怒，在2月5日和8日，派出了大批军警，公然袭击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的宣传队，以致造成两次严重的血案。

反动派的镇压，不但不能使学生们屈服，反而激起了学生们以及各界人民更大的愤怒。无数工人、店员、教师和农民络绎不绝地去慰问受伤学生，并发动募捐来援助学生的“抗暴运动”。广大人民的支援更加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11日，重庆学生又发动总罢课，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恐怖罪行。此后他们的运动仍继续发展，从未终止。

当“抗暴运动”正在高潮的时候，国民党的重庆市警备司令孙元良跑来找我。他的口气表示他知道运动是我们鼓动起来的，希望我们帮助他们去制止学生运动。我说：“学生们的‘抗暴运动’，出于爱国至诚，绝非哪个人鼓动起来的。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谁也不该去制止，而且，制止也是不行的。”同时我严正地指出：“特务打人，实在无理，你们只有依法惩办特务，才能平息学生们的愤怒。”孙元良见无结果，只得怏怏而去。第二天，张笃伦又来了，他一见我就说，学生们逼得他受不了了。他还说我们报馆有人参加到学生里面，并指责我们的报纸登载鼓动学生的消息和言论太多了。他最后并威胁着说：“这样下去，迟早要搞出乱子来的。”我严肃地回答了他，把他打发了回去。这时我已感到，对我们的严重的迫害即将到来。从他们两人的谈话中，我估计他们的迫害很可能首先针对着学生运动和《新华日报》。

当时的学生运动仍在蓬勃地发展，国民党反动派对此非常头痛。眼看2月22日就要来到，估计到他们会利用“二·二二”反苏游行的周年纪念来搞我们，于是我们有意把反美运动扩大和延长，以抵制他们卑劣的行径。这样就使他们终于未敢在2月22日作反革命的发动。

至于《新华日报》，更是他们的眼中钉，他们无时不想把它搞掉。还在1946年4月，当我们在《新华日报》上转载了“驳蒋介石”一文的时候，他们就曾经企图下手，但终因整个形势对他们不利，使他们未能如愿。为此，他们后来还捏造了一些团体，到柳州法院去告我们，说我们侮辱了“国家元首”，想借此来打击我们和封闭我们的报馆。柳州法院把这一案件转到了重庆，我们法律界的朋友们即来帮忙，他们充分利用了合法斗争的条件，结果使重庆法院这样批示：查我国法律无侮辱元首之条文，如系毁谤，须本人起诉。蒋介石怎样到重庆来和我们打官司呢？反动派的诡计于此又完全落空。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蒋介石由于军事、政治上的一连串的失败，已经和我们撕破了脸皮，不再有所顾忌了，看来他是一定要拔掉这个眼中钉的，我们必须沉着地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这时，全国的形势对蒋介石更为不利。蒋介石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遭到严重的失败，特别是在山东失败得更惨。1947年1月中旬，我军一举在鲁南峄县、枣庄地区歼灭它五万二千余人，并活捉其整编师长马励武和周毓英。为了取得喘息时间，准备重新进攻，蒋介石经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我们要求允许他派张治中到延安进行“和平谈判”。这一新的骗术立即为我党彻底揭穿。接着，1月底至2月中，我军又打败了陈诚在徐州亲自指挥的所谓鲁南之役，歼敌四十二集团军第一、二师全部，

并生擒郝鹏举。至2月19日—23日，我军又在鲁中莱芜地区获得辉煌胜利，将敌军七个整旅六万余人一举歼灭，其“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和第七十三军军长韩浚皆被我生俘。至此，蒋介石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基本上被粉碎了。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着要改变他的军事进攻方针，把他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将其两个进攻的矛头指向山东和陕北。既然进攻陕北，势必要最后关闭和谈之门。因此他决定驱逐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切机关和人员。为了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我们早已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还在1946年的冬天，我看到环境一天天的险恶，就深深地感到必须对我们的干部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特别是要加强革命气节的教育。为此，我特地把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文章和党中央的若干文件，编印成一本名为《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际》的小册子，以供同志们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我还为大家作了许多次讲演，把从古到今著名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向大家讲述。这些讲演，也曾是一些进步分子和民主人士中举行。当我讲到那些英雄烈士慷慨就义的时候，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而我自己的情绪也特别激昂，有时不禁声泪俱下。那时我和大家的精神简直已融成一体，彼此都受到深刻的感动。我从人们坚毅的神情里得到这样的信念：只要我自己能以身作则，临危不惧，我们的同志也一定都经得起任何严重的考验。

1947年2月下旬的头几天，重庆有些民主人士从司徒雷登发表的声明中，知道了国民党要我们撤退的消息。他们有点恐慌，跑来问我们是否撤退。我说：“我们是国民党政府请来的，除非它有明文要我们撤退，和我党中央来了命令，我们是绝不会走的。司徒雷登是外国人，他管不了我们国内的事，更无权过问我

们党内的事。”过了两天，《大公报》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南京有我们撤退的消息，我同样地回答了他。因此，《大公报》登的不是我们要撤退的消息，而是我的不撤退的谈话。这时，恰好传来了莱芜大捷的消息，我们的报纸特地用大字把它登出来。人们看了这个消息，都异常兴奋。我于是对民主人士说：“国民党的垮台是注定了的，它即使把我们逼走，对它也无济于事。”

由于事前已经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所以国民党来包围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并不感到突然。2月27日深夜，国民党反动军警百余人，突然包围了我们的联络处——曾家岩二十三号（就是以前恩来、董老两同志住的五十号办事处）。一阵猛烈的打门声，把我们的同志从睡梦中惊醒。一时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极端无礼地冲进了我们的大门，他们翻箱倒柜，到处搜查，形同盗匪。把我们的同志都强迫集中于楼下客厅之后，他们又蜂涌上楼，闯入我的卧室。我穿衣急起，质问何事？他们声称：“为‘保护’你们的安全，要你们撤退。”我问他们有无公事？他们的一位杨处长说有。我接过一看，知是孙元良来函要我们于3月5日前撤退。我当即声明：“我党驻京、沪、渝的联络处，是你们政府允许设立的，非有你们政府的明文和我党中央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坚守我们的岗位，不能撤退。”旁边一便衣特务插嘴说：“你们破坏和谈，称兵作乱，与人民为敌，使人民不能安定……。”我一听十分气愤，严厉地反问他：“谁与人民为敌？谁破坏和谈？谁在积极打内战？谁使人民生活不安？你看，我们的对面，就是你们的兵工厂，数月以来，日日夜夜在赶造军火，请问这是干什么的？你们到处征兵征粮，急于星火，把一切交通工具，全作军运，一切都是战争状态，谁要打内战还不明白吗？”他见我声色俱厉，就表现十分狼狈。于是那位杨处长上前来说：“请先生把公

文看完，如果油印的不清楚，这里还有一份笔写的，上面还有司令愿备车并派人护送回延安等事，请先生不要着急！”我这时最担心的是怕他们危害我们的同志，因此特对他说：“你们半夜三更来此胡闹，简直无理已极，你们绝对不能捕走我们一个同志！我要去找孙司令、萧参谋长、张市长谈谈，一切谈后再说。”这时他们才对我说明，同志们已经集中在楼下客厅里。我于是赶紧下楼去和同志们见面。大家一见我就指着那批军警，控诉他们乱抢金钱手表和衣物等等的暴行，一时人声沸腾，群情激愤。我见同志们毫无惧色，便对大家说道：“孙元良司令有公事来，要我们撤退。但是，我们非有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明文，和我党中央的命令，是誓不撤走的。我们要坚持我们共产党人的立场，保持我们革命者的气节。至于军警们不先给公文即破门而入，并且肆意搜查，是完全不对的。我要去见孙司令、张市长，一切等我回来再说，现在我就去打电话。”但是，电话早被他们切断了，打不通。他们见我很生气，便来说道：“吴先生年老了，请上楼休息吧！天明后，孙司令就会来的。”我说：“你们如果让我的同志们都回房休息，我就上楼去休息，否则我要和我的同志们在一起。”他们说：“他们在此地也可以休息，还是请老先生休息去吧！”这时同志们都来劝我，我估计同志们的安全暂时不会有问题，才回到楼上房里去。这时，我们的联络处已经变成了一个临时的集中营，数十名军警和许多便衣特务来来去去，四处逡巡。在这样严重的关头，我的肩上又担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我必须想出正确的对策，以维护党的荣誉和保障同志们的安全。我反复地考虑了当时的整个形势和眼前的具体情况，想到：既然我军在不断地取得胜利，全国的民主运动又日益高涨，有了这样坚强的后盾，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国民党会不会象在皖南事变时对待叶挺同志和

新四军那样来对待我们？一般地说它不敢那样，但也不是绝对地不可能。它会不会把我们全部安全地送回延安？它绝不情愿，但要取决于我们的斗争。最大的可能是：表面上说把我们送回，而又尽可能地来分化瓦解我们。因此我们的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坚决斗争！至于我自己的安全，由于年纪大，又是政协委员，条件要比同志们好得多，我必须挺身而出，领导同志们一起战斗。有没有危险呢？当然也会有的。但早年参加革命，即已不顾一切，现在偌大年纪，尚有何可惜……想着、想着，有时眼前忽然浮现出邹容烈士^①的形象，有时又出现杨闇公同志^②的形象。这些形象虽然一刹那就逝去了，但是我的斗争决心却更加坚定起来。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便到了天亮。

第二天(28日)10时左右，孙元良来了。他毫无表情地把他的公文复述了一遍。我也把我们的态度告诉了他，并且严正地向他说：“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岗位，不怕任何压力。我现在是已近七十岁的人了，从同盟会辛亥革命以至现在，一切革命运动我都参加过。自参加革命以来，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常想得一适当的死所，此地或者就是了。人谁不死？只要死得有价值，死一个人可以激励起千万个人来。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有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的。我要为革命党人共产党员保持最高尚的人格。现在和谈虽停顿，但门尚未关死，你们此等行动，将最后关死和谈之门。你们知道这种关系吗？”我越说越激昂，他虽毫不感兴趣，但也只好听着。我要他撤退监视的军警，他说：“为慎重‘保护’起见，不得不如此。”我要求去见行营参谋长肖毅肃和重庆市长张笃伦，他说他可以去和他们商量。我又问他《新华日

^① 邹容。重庆人，1903年因在日本中国使馆反对官僚事件后被迫逃上海，发表有名的《革命军》，被帝国主义者投入监狱，死于狱中，时年仅二十一岁。

^② 杨闇公。我党的先烈，在1927年的“三·三一”惨案后牺牲于重庆。

报》报馆的情形，他说情形“很好”，请我放心。是的，对于同志们的斗争精神，我是放心的；但是，在这般豺狼横行的地方，对同志们安全，我怎么能放心呢？我于是提出要和《新华日报》社的负责同志见面。孙元良无法，回答说可以转告。孙走后，我即拟电致张群（他仍是蒋介石的重庆行营主任，当时在南京），抗议 28 日的军警暴行，说明我们的坚决态度，并要他电告重庆警备司令部立即撤退监视人员，让《新华日报》继续营业。此后，我即利用时间，向同志们讲革命故事，以激励大家斗争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讲先烈们可歌可泣的事迹，更加感动人心。不仅我们的同志都凝神谛听，有感奋而泣下者；连那些监视我们的国民党士兵（他们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出身），也都慢慢地围拢来听，有的人也似乎颇受感动。

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兴奋，并且没有休息，我身体有些不适。他们想给我找医生看病，我拒绝了，但要求我们自己找医生。我觉得这样靠得住些。3 月 1 日下午，平常即很同情我们的薛大夫来了。他看完病之后，故意大声地说：“血压高，要绝对的安静！安静！”我便趁此把监视我的人赶出了我的房门。午后 6 时许，肖毅肃和张笃伦来了一趟，肖对军警的无礼行为，竟佯装不知。接着，到晚上，重庆美国副领事布德持董老来电说：“美国飞机将于 5 日及 6 日各来一架，各载五十人飞回延安。”我说：“两架飞机怎么能载得下？必须至少添四架，我一定要同大家一起回去，否则我决不走！”我最担心他们采取“分割”我们的办法，以便在途中尤其是在西安谋害我们的同志，因此坚决要求要肖毅肃代电张群，必须多准备四架飞机，他答应了。那些监视我的军警特务，特别是那些当官的，见美国人来表面上对我都很客气，因此以后对我们也客气多了。这种没有骨头的奴才习气，实在

令人可笑而又可恼。

和联络处一样,2月27晚,我们在乡下的《新华日报》馆和在城内的营业部、宿舍,也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包围和搜查。这三处的同志们都被他们拘禁在乡下的报馆里。但是,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雄壮的歌声响彻云霄,使周围的群众听了也感到激愤。3月2日,《新华日报》的负责同志在宪兵和特务的监视下来向我汇报情况。他们刚说话,一个特务即气势汹汹地说:“只许讲四十五分钟!”我立刻火起,严厉地问他道:“为什么?我们不是囚犯,难道连讲话的自由都没有了吗?我准备讲三个钟头,要趁我还没有死,把话讲完。”那个特务就此不敢作声了。他们报告完毕之后,我对他们说:“国民党这次暴行,是它要最后关死和谈之门,决心内战到底。我们要保持共产党员的人格,不怕牺牲。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那时,除重庆外,成都、昆明尚有《新华日报》分销处)的三百八十人要团结得象钢铁一样,不怕任何压力。我们牺牲一个人,会有一万个人来代替……。”我越讲越兴奋,特务们想来制止,我于是更加上劲,讲个不停。同志们怕我又累了,劝我不必讲了。临别时,我又要他们回去告诉报馆的同志们,要团结得象钢铁一样。他们大声地回答:“我们一定不怕!”态度异常悲愤。所有在场的同志都很激动。

从此以后,我又有意地向那些监视我们的军警、特别是对其中的青年做些工作。我继续给他们谈话、讲故事,并送些书给他们。慢慢地,他们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的一个连长也曾来要求我题字,我便顺手给他写了一句“为革命而奋斗”。谁知他见此作何感想?

3月8日,孙元良和一位什么连长同我坐在一辆小汽车里,

一左一右,把我“护送”到了飞机场。但到机场一看,却只有两架飞机。我非常生气,坚决不走。这时孙元良很着急,反复说保证第二天一定还来三架飞机。经了解:那三架飞机没来,确系临时气候原因,次日一定可到。而同志们经分析后,也觉得情况属实,劝我不必担心,可以先走一天。这样,我才上了飞机。要回延安,我心里是多么高兴啊!但对重庆,却又有些恋恋不舍。它是我的故乡,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怎能任它老被反动统治者去蹂躏践踏呢?重庆,我是一定要回来的,而且我相信,当我回来的时候,你的面目一定要焕然一新。

第二天,其余的同志也都胜利地回到了延安。

与我们的撤退差不多同时,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机关和人员也都撤退了。

接着,蒋介石不顾一切后果,令胡宗南所部国民党军进攻延安。3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三中全会上宣称要作战到底,把和谈之门彻底关闭。19日,国民党军侵占延安,吞下了一颗致命的炸弹。果然,不久之后,我军即粉碎了国民党军的所谓重点进攻,并即转入进攻,终于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最后消灭。

解放战争初期的这段经历,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底,永不能忘。这段历史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对反动派绝不可存不切实际的幻想;必须用革命的两手来回击反革命的两手;必须坚定地依靠人民,同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现在趁大家都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时候,我特地把个人的这一点切身经历和体会写出来,证明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的无比正确。写得恰当与否,还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1960年)

附 录

吴玉章七十年谱

(1878——1948)

1878 12月30日(即旧历戊寅年十二月初七日)生于四川荣县双石乡。名永珊,号玉章。长兄永杼,号匡时;仲兄永锷,号紫光;均先后留日,加入同盟会。

1884 六岁。开始读书。时太平天国事迹,仍留传民间,帝国主义侵略日急,中国藩篱尽失。常闻客来谈时务,对后来之接近政治颇有影响。

1892 十四岁。随仲兄去成都入尊经书院。五月同赴嘉定应试。旋以母丧返家,乃同仲兄家居读书。好历史,深喜岳飞《满江红》、文天祥《正气歌》等忠义慷慨之作。尤慕明末烈士黄淳耀、史可法之为人。

1895 十七岁。甲午中日战争失败,消息传来,甚为悲愤,与仲兄以救国救民相勉励。

1896 十八岁。与游女士丙莲结婚。

1897 十九岁。甲午战败后,满清之腐败无能完全暴露,而帝国主义纷纷要求租借地,划定势力范围,有瓜分中国之势。国事日急,变法维新学说渐流行。得读《盛世危言》、《时务报》、《蒙学报》、《蜀学报》等,乃接受维新思想。

1898 二十岁。戊戌变法。在乡间积极宣传维新思想,政变失败后仍坚信不移。女春兰生。

1900 二十二岁。义和团运动发生,四川有余栋臣起义。

被毁教堂文物流入乡间，带来许多新事物，乃乘机宣传维新思想。并团结本地青年，深受敬爱，后多有赴日留学，成为革命党人者。儿震寰生。八国联军陷北京，光绪与那拉氏奔西安。

1901 廿三岁。 满清政府与八国订立丧权辱国之辛丑条约。富有票领袖唐才常在武汉起义未成、被杀。

1902 廿四岁。 梁启超《新民丛报》与《新小说报》发行，严复译《天演论》出版，读之甚为兴奋。

1903 廿五岁。 与仲兄去日本东京留学。与日本成城中学校长冈本则录商洽，开办为中国留学生专设之中学班，并入该班肄业。与四川留日同学发表《劝游学书》，四川留日学生因以大增，其中有许多均成为革命干部。同年3月，参加留日学生要求沙俄撤兵之拒俄学生会，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邹容《革命军》出版，读之极为感动。时日本东京为中国革命中心之一，革命排满书报到处流行，读《民约论》及欧洲各国革命史等，乃不满于康梁维新之改良主义学说，而接受革命排满与天赋人权之旧民主主义思想。

1904 廿六岁。 满清废科举、兴学校，各省派速成师范生留日，留日中国学生因以大增。日俄战争，日获胜利。

1905 廿七岁。 与孙中山先生及革命同志组同盟会，是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理论有组织之革命政党，领导和推动了当时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参加反对日政府的“取缔规则”大风潮，团结留日学生。生活艰苦，学费膳费均无法缴纳，但克己济人，使同学等深为感动。接受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更具体化。

1906 廿八岁。 成城中学毕业，考入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中国国内在帝国主义与满清政府之残酷剥削与压迫下，

经济恐慌，农村破产，人民生活日益恶化，反抗苛捐杂税之群众运动普遍发生。革命党人在醴(陵)萍(乡)起义失败。

1907 廿九岁。潮(州)惠(州)及钦(州)廉(州)起义，镇(睦)南关、成都、广安、泸州、叙府起义均失败。是年留日革命党人多有灰心失望者，乃与李肇甫等努力团结留日学生。并休学赴东京办《四川杂志》，鼓吹革命。

1908 三十岁。《四川杂志》被日本政府查封，并被判徒刑半年，以系学生，缓期执行，乃赴冈山复学。河口起义失败。徐锡麟刺杀恩铭。一部份革命党人开始采取暗杀政策。深感于争取广大群众参加革命之必要，乃与孙武等联合各省哥老会、三合会、孝友会组成共进会。该会后在四川保路同志会及武昌起义之新军中，均起极大作用。

1909 三十一岁。仍在冈山读书，并从事革命活动。黄复生、喻云纪、汪精卫等谋刺摄政王，为之组织及筹备。

1910 三十二岁。去京营救入狱之黄、汪，未能如愿。转去香港与黄兴、喻云纪等策划广州起义，旋返日购买军火。

1911 三十三岁。参加广州旧历三月二十九日之起义，失败后逃日本。6月，四川铁路风潮扩大，由同盟会派回四川工作。8月返荣县，助龙鸣剑、王子湘率民军进攻成都及秦皇寺失败后，9月民军返荣县，即宣布独立。复克威远县，攻自流井，相持不下。适清廷派端方率新军入川镇压，乃潜赴内江，约新军中革命同志举事，及闻新军如约于11月25日在资州杀端方反正，遂于26日在内江起义。11月22日重庆光复，成立蜀军政府；8日，成都成立四川军政府；乃成蓉渝对立之局。12月2日赴渝，坚持制裁破坏分子，使蜀军政府得以巩固。旋被派为四川代表赴南京。

1912 三十四岁。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被选为临

时大总统，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 1月中旬抵京，任总统府秘书。南北和议成后，6月被派回川，调停成渝合并事。并慰问全川父老。又成立四川留法俭学分会，派大批青年赴法留学。8月返南京。革命军虽获胜利，但其领导分子为求表面之统一计，与封建势力妥协，南北和议既成，袁世凯取得政权，封建军阀乃能维持其统治，帝国主义又可利用之为统治中国之工具，于是辛亥革命乃流产。同盟会瓦解，一部分上层分子与旧势力妥协，组成国民党，革命性质尽失。

1913 三十五岁。 袁世凯阴谋攫取革命果实，暗杀宋教仁，擅借外债。 积极主张国民党四督通电指责袁氏非法，以先发制人，因黄兴反对未果。及至袁免四督令下，二次革命发动过迟，乃归于失败。

二次革命失败后，仍在沪奔走革命，为袁世凯所通缉。11月去法国。目击辛亥革命流产，中国人民又沦于帝国主义压迫与封建军阀专制统治之下。激愤之余，乃接近无政府思想，但又深觉其无组织，只是一种幻想。

1914 三十六岁。 1月抵法国。后入巴黎法科大学，研究政治经济。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5 三十七岁。 在法与蔡元培、李石曾，法人欧乐教授、议员穆德等人，成立华法教育会，以联合中西文化，并办理勤工俭学会，担任会计职务。勤工俭学会前后送留法学生数千人，并培植不少革命干部，周恩来、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毅等同志，均由此留学法国。袁世凯签定丧权辱国之二十一条，复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改共和为帝制。12月，云南起义讨袁。

1916 三十八岁。 时正盛传英将借款予袁氏。1月，去伦敦晤英社会党议员，请向英国会提议不借款予袁世凯，借款乃

未成功。6月袁死。蔡元培被任为北京大学校长。同行返国，赴昆明与唐继尧筹商发展华法教育会事。

1917 三十九岁。在北京办理勤工俭学会预备学校。为批准法国招收华工条约与外交部官僚作斗争。段祺瑞压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国会议员南迁，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7月，张勋入京，复辟失败，段祺瑞重握政权。年末，熊克武统一四川，加入护法军政府。被派为四川省代表去粤。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1918 四十岁。十月革命胜利消息传来，进步知识分子欣喜若狂，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播。从此接受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3月，孙中山先生被迫去沪，杨永泰、莫荣新等拥岑春煊为领袖，改组护法军政府为七总裁制。

1919 四十一岁。五四运动发生，社会主义思想散布更广。读到《过激派》（即《布尔塞维克》）等书，更具体地认识了彻底消灭国内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压迫，消灭阶级剥削与改造中国社会之唯一道路。革命活动更趋积极，来往沪粤之间，从事协助《救国报》、《劳动者》等刊物之工作。（前者为留日学生所办，反对二十一条之刊物；后者为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办。）南北和议失败。10月返川，调停川军与滇黔军之争。

1920 四十二岁。调停失败，川军与滇黔军开战。12月至渝，筹备全川自治联合会，发表宣言，提出“不作工不得食”等十二大纲领，深得进步人士赞同。

1921 四十三岁。4月1日在渝召开全川自治联合会成立大会，声势甚盛。为避免军阀利用计，议决以制定省宪权交省议会后，立即结束。更深感需要有彻底革命理论与铁的纪律的政党。后被省议会选举为省宪起草委员。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

统。7月，中国共产党在沪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恽代英到四川秘密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 四十四岁。任成都高等师范校长。恽代英被监禁于泸州，设法救出，并约往高师任教。

1923 四十五岁。因四川被封锁，消息隔绝，不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与杨闇公等在成都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办《赤心评论》，组织工会、农会。滇桂军败陈炯明，孙中山返粤组织大本营，广州成为革命根据地。1月1日发表国民党宣言，计划改组。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与国民党合作，以组成革命统一战线。

1924 四十六岁。1月，被迫辞高师校长职。继续在成都从事革命活动。五一节开劳动大会，为驻军所镇压，险遭逮捕，乃与刘伯承离川，经贵州、湖南、上海而去北京。1月，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后，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以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为斗争对象。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三大政策，是为新三民主义之开始，国共合作曾使革命运动飞速发展，造成北伐的胜利。

1925 四十七岁。2月到北京，得晤赵世炎，知道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乃坚决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孙中山逝世于北京，曾举行盛大的追悼，掀起了革命浪潮。5月，五卅运动发生，大革命开始。8月，返川办国民党，以过去全川自治联合会代表为基础，建立四川省国民党组织。并在渝办中法学校。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统一。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日益积极，8月，刺杀左派领袖廖仲凯，企图破坏统一战线。11月，出任国民党四川省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大会秘书长，积极筹备大会。

1926 四十八岁。 1月,国民党二全大会开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大会决定继续执行三大政策,并予右派分裂分子以打击。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右派反共活动更趋激烈。2月,由粤返川,劝黔军杨其昌、王天培等部反正,编为国民革命第九及第十军。5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在蒋介石操纵之下,通过《党务整理案》,实行党内独裁,阴谋反共。7月,复到广州,与何香凝、顾孟余等召开国民党执监联席会议,通过二五减租及实行党内民主等决议。7月出师北伐,10月占领武汉。决定将国民政府迁武汉,明年元旦到齐。12月,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与政府委员之联席会议,以国民党中央资格参加,主持军政大计。12月,革命军收复宜昌,情势混乱,奉派去宜处理。

1927 四十九岁。 国民党右派据南昌。以武汉为工农运动中心,拒不迁都,乃演成南昌与武汉之对立。武汉政府乃组成五人行动委员会,受任为五委员之一,坚决与反动派斗争。决定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3月7日全会开会,曾作出提高党权等决议。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

上海工人三次起义胜利,南京克复。3月31日,重庆发生惨案,杨闇公、漆树芬、陈达三等及学生数十人惨死。四·一二政变发生,国民党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分子。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武汉政府自4月中汪精卫回任后,即以他为代表之上层分子,阴谋妥协,7月14日夜秘密举行反共会议。乃于次日去九江与徐特立、林祖涵、刘伯承等,组织国民党中央办事处。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转战赣、粤、闽,及至潮汕失败后,乃经香港、上海出国赴苏。12月广州起义失败,大革命乃告终。中国重沦于分裂内战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

1928 五十岁。先在苏联克里姆海滨养病。8月，入中国问题研究院，研究土地农民问题。中共开六大。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成立红四军，展开苏维埃运动。

1929 五十一岁。2月，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改为中国劳动共产主义大学)特别班学习。

1930 五十二岁。毕业后，10月到海参威，任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教员。与托派斗争。

1931 五十三岁(在海参威)。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三省。在华侨工人中推进反日运动。召开新文字代表大会，制订中国字拉丁化方案。

1932 五十四岁。担任苏联科学研究院远东分院中国部主任。著《中国文字的流源及其改革的方案》与《中国新文字的新文法》。一·二八事变发生。在苏联远东工人中掀起反日大运动，动员华侨工人参加东北义勇军，并接济义勇军，援助他们退入苏境(如王德林部)。

1933 五十五岁。任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的主任。

1935 五十七岁。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红军于1934年击破国民党五次“围剿”后，北上抗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0月到达陕北。日本帝国主义自“九·一八”以来，得寸进尺，占我热河、察东，覬觐华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抗日。10月，被派赴法国办《救国时报》，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在全国，特别在华侨中起极大作用。一二·九运动发生，救亡运动普遍开展。

1936 五十八岁。返莫斯科，任东方大学中国部教员。编教材，写成《中国史教程》。西安双十二事变发生，中共坚持和

平解决,内战因此终止。

1937 五十九岁。 七七事变爆发,中共发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十大纲领。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被派往欧洲作抗日宣传工作。

1938 六十岁。 在伦敦与陶行知等参加世界反侵略大会为援助中国抗战而召开之世界和平会议。4月回国,旋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共六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10月赴渝。

1939 六十一岁。 在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中作争取实行民主宪政的斗争。11月返延,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延安分会,任常务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 六十二岁。 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被选为会长。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并办新文字学校,推行新文字。年底,患病休养。

1941 六十三岁。 延安大学成立,任校长。办新文字报,扩大新文字运动。6月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2 六十四岁。 整风运动开始。

1943 六十五岁。 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学院与原延安大学合并为延安大学,任校长。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

1945 六十七岁。 4月中共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续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希特勒德国被击败。8月,日本投降。12月任中共出席政协会议代表赴渝。

1946 六十八岁。 兼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0月夫人游女士逝世,享年七十岁。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下,进攻解放区。6月底蒋匪军进攻我中原解放军,发动全国内战。

先后占我沈阳、承德、张家口等重要城市。

1947~六十九岁。 被迫由蒋区重庆撤离，与蒋匪帮坚决斗争，使匪帮屈服，安全撤回延安。3月蒋匪侵占延安。到晋绥参加土改。7月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解放长江以北中原广大地区。伪国大召开，蒋介石当选伪总统，丑态百出。

1948 七十岁。 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6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改为华北大学，任校长。人民解放军秋季攻势收复锦州、长春、沈阳、承德，东北全境解放。我大军进攻徐州、淮海大捷，徐州敌弃城而逃，仍被我歼灭。东北我大军入关，平津被我围困。人民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

1948年华北大学为纪念吴玉章校长七十寿辰而作

后 记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祝贺吴老六十寿辰时对吴老生平作出的评价。

“吴老的一生，就是一部非常丰富的革命史。”这是历史学家范文澜同志看了吴老的《辛亥革命回忆录》后对吴老的赞誉。

我于1948年随吴老到华北大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吴老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和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在这三个地方，我先后给他当过助手。从1953年起，我开始在人民大学讲授革命史，同时也开始帮吴老写回忆录。因为当时吴老和我的工作都很忙，所以回忆录写作的进度不快。1960年林老（伯渠）逝世，吴老悲痛之余，决心加紧写回忆录，因此1961、1962两年写得多一些。可惜1963年以后，吴老的记忆力衰退了，回忆录的写作无形终止。

吴老是一个革命家，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社会主义革命，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面，一直革命到最后一息。吴老又是一个教育家，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为革命培养了无数的人才。吴老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革命长者和革命老人，他的道德、学问和文章，早已为举世所景

仰，足以作青年的楷模。帮吴老写回忆录，使我从各方面受到教育，但恨我笔下无文，无法把吴老一生丰富的经历、崇高的品德和献身的精神，充分地表达出来。不过，在从事这项工作的時候，我是抱着严肃认真、虚心学习的态度，力求忠实地把吴老的讲述，结合着历史的记载和必要的调查材料，整理成篇，然后请吴老过目、修改、定稿、发表。因此，吴老的回忆录是可信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不但和他同辈或年纪相差不多的人，读了觉得亲切、有益；就是现在乃至将来的青年，也很值得一读，既可以从中学学习丰富的革命历史知识，更可以从中学学习一个革命者如何处世为人，一辈子做好事。

今年是吴老一百周年诞辰，我从吴老的回忆录中，选出了记述革命史实较多的十篇文章，大致按历史顺序，编为一册，特地向青年同志们推荐。

在帮吴老写回忆录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胡华、戴逸等同志、吴老的秘书王宗伯等同志，都出过不少的力。回忆录中某些精采之处，多半出自他们的手笔。

为了纪念吴老百年诞辰，我把十二年前悼念吴老的一首七言律诗，改易首联，写在这里，以志不忘：

好事一生做到终，
百年冥诞忆吴翁^①。
峨山仰止尧天外，
江水长流禹域中。

^① 吴老纪念辛亥革命的诗中，有“七十二贤成烈士，至今凭吊有吴翁”之句。记的是，1911年同盟会在准备广州起义时，四川籍党人曾用吴老的名义，在广州河南莲塘街租房组织起义机关，对外称“吴老翁公馆”。

雨暴风狂飞“海燕”^①，
天寒岁暮挺“岩松”^②。
七旬革命九旬寿，
留取丹心万代红。

吴玉章同志为革命立的德、立的功、立的言，昭如日月星辰，
永垂不朽！

李 新

一九七八年于北京

① 吴老最称赞高尔基的《海燕》。

② 指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苍松。

封面
目录
正文